

CSSCI 来源期刊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AMI 综合评价(A刊)核心期刊

学 子 报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JOURNAL OF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担当

基于系统思维的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与教育评价改革

组织公平感何以影响大学教师组织公民行为？

2021.07

(总第 283 期)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征稿函

◆常设栏目：教育政策与制度研究、学术纵横、教育基本理论、思想政治教育、教师教育与发展、职业教育探索、考察调研报告、国际视野等。根据教育改革和发展的需求，适当调整增设新栏目。“学员论坛”栏目主要刊发高校管理者的办学治校研究和学术思考。2021年重点建设“专题研究”栏目。

◆选题要点：

- ※习近平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研究
- ※中国特色高等教育发展理论体系研究
- ※新发展阶段高质量教育体系研究
- ※中共百年教育发展的理论与实践研究
- ※新发展格局下的教育治理现代化研究
- ※新时代我国教育评价改革研究
- ※教育发展与乡村振兴研究
- ※新发展阶段高等教育结构优化研究
- ※“十四五”时期高等教育区域化发展研究
- ※人工智能时代教育变革研究
- ※“四新”（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建设研究
- ※“三个一流”（一流专业、一流课程、一流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建设研究
- ※“四史”教育与思政育人研究
- ※高校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研究
- ※学习型社会与终身教育研究
- ※职业教育类型化发展研究

◆投稿须知：来稿要论点新颖、论据充分可靠、论证严密、语言精练流畅。篇幅以8000字左右为宜，关于重大理论问题的论文篇幅可在1万字左右。题名限20字以内。摘要需准确提炼论文主要观点（300~400字），关键词3~5个。题目、摘要、关键词均需英文翻译。

投稿请按照学报已发表文章格式编辑，电子邮件投稿请按照：单位+姓名+文章题目方式命名。请勿一稿多投。

本刊所发文章均不代表编辑部的观点，作者文责自负。稿件以电子版为主。自投稿一个月内未接到本刊任何通知，作者可自行处理。

对于采用稿件本刊有编辑删改权，不同意删改者请在稿件上特别注明；对于刊发的文章本刊享有网络传播权。如有异议，请投稿时注明。未声明者，本刊视为同意。

投稿方式

编辑部电话：010-69248888转3122

投稿电子邮箱：xuebao@naea.edu.cn

在线投稿：<http://gjxz.cbpt.cnki.net/EditorEN/index.aspx?t=1&mid=gjxz>

可通过学院官网<http://www.naea.edu.cn>首页，点击“学院概况”后，选“主办期刊”进入。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月刊)

2021年第7期(总第283期)

目 录

编辑委员会

主任 侯慧君

副主任 韩旭 于京天

编委 (按音序排列)

陈丽萍 陈晓宇 陈子季

丁月牙 葛道凯 郭垒

韩震 胡敏强 胡锐军

黄晓玫 李曼丽 刘亚荣

刘元春 卢晓中 马怀德

孟繁华 沈壮海 石中英

王炳林 邬大光 邢晖

许杰 许玉乾 杨晓慧

游旭群 于建福 于鲁文

袁振国 张婕 张卫国

周玉 周作宇 朱庆葆

主 编 侯慧君

常务副主编 吕文妙

副 主 编 高 政

编 辑 吴 虑 吴潇剑

刘 红

美术编辑 张进美

录入排版 梁京京

本期执行编辑 刘 红

教育 学 人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担当

任少波 3

专 题 研 究

基于系统思维的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与教育评价改革
——兼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系统思维

卢晓中 9

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体制观：体系建设探微

俞国良 17

党的百年教育研究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以来对劳动教育的探索

刘向兵 张清宇 28

教育基本原理

劳动教育如何融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施永川 38

目 录

创造性智慧赋能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内涵与维度 詹青龙 46

教育政策与制度研究

政策受众视角下教育政策精准性提升的路径分析 曲正伟 55

组织公平感何以影响大学教师组织公民行为？
——组织信任的中介作用 迟景明 何志程 陈晓光 64

新青年论坛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李秀坤 尹西明 76

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产生的原因及其启示 李文平 84

致作者：作者文责自负；来稿如在一个月未接到联系，请另投他刊；本刊不收取版面费、审读费等任何名目费用；本刊对刊登的文章享有网络传播权，如有异议，请在来稿中注明，未声明者，本刊视为同意。感谢您对本刊工作的理解与支持！

编辑部 010-69248888 转 3122
投稿邮箱 xuebao@naea.edu.cn
在线投稿 <http://gjxz.cbpt.cnki.net/EditorEN/index.aspx?t=1&mid=gjxz>

主 管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 办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出版发行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教育管理杂志社
发行范围 国内外发行
地 址 北京市大兴区青源北路8号
邮 编 102617
网 址 www.naea.edu.cn
传 真 010-69260513
广告发行 010-69241029
010-69226801
印 刷 北京华联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21年7月15日

征稿函
石家庄铁道大学

封二
封三、封底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时代担当

任少波

(浙江大学, 浙江 杭州 310058)

中图分类号: C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7-0003-06

2021年5月9日, 习近平总书记在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中强调, “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 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 需要深入理解中华文明, 从历史和现实、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角度深入阐释如何更好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 体现了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高度重视和殷切期待。当代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应当认清新发展阶段的历史使命, 在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过程中更加担当有为。

一、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面临自主建构的机遇与挑战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承担着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根本任务。在我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发展阶段,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肩负着新的历史使命和时代担当, 迫切需要通过体系变革加快自主性建构, 形成中国特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

1. 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轨迹与时代方位

从历史的视角看, 中西方的知识分类体系差异很大, 并由此形成截然不同的学术传统。西方的学科体系是纵向层次结构, 将宗教、政

治与科学(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艺术完全分开; 而中国传统的学术体系是横向综合结构, 体现系统论、天人相应等思维模式。从现代学术角度看, 中国传统学术基本是文史哲不分, 之后随着中国传统学术门类的分化, 由“通人之学”逐步转向“专门之学”, 才发展成为近代意义上的人文与社会科学。清末民初时期, 中国的知识系统受到西方分科观念和学术体系的严重冲击, 开始引入西方学科和学术体系。在此大变局下, 学术界纷纷向西方学术看齐, 就此开启了知识系统的全面转型, 而中体西用、西学中源等都是当时文化转型中的代表性观点和思想。

在近代中国, 大学是学科和学术制度的核心载体。从1906年废除科举, 建立现代学堂并开启长达20年的学制改革, 中国大学制度终于迈上现代化的发展轨道。近现代学制与大学的变革, 直接推动着学科制度的变迁。随着学制改革的启动, 教育体系的变迁也带动了中国的学术体系、学科体系的历史性转型, 长期以来的“四部之学”开始实质性地向“七科之学”转变。自此, “分科治学”成为常态, 而现代学科制度在中国也日趋成型并逐步完善。

新中国成立后, 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有过一段全方位学习苏联模式、否定西方模式的历程,

收稿日期: 2021-07-12

作者简介: 任少波, 男, 教授, 浙江大学党委书记, 主要从事经济学、高等教育管理研究。

并在“文革”动乱中一度中断，但最终走上了兼容并包、开放自信的自主发展道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逐步构建并完善定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经历了长足的发展，为促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服务党和国家建设、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等作出了重要贡献，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也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了独特的中国学术魅力。

与此同时，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也面临着发展中的问题和挑战，主要集中在：一是原创能力不足，高水平原创思想和文化成果供给不足，全球议题设置和具有国际影响的重大理论和话语创新匮乏；二是实践互动不够，简单照搬西方理论无法真正解释中国丰富的实践和指导中国现代化发展，立足高校引领立德树人和塑造时代精神的原创性成果也偏少；三是学术生态有待优化，现行学科制度和学术分类体系不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学术评价的“指挥棒”不利于激发创新创造活力，良好自治的学术共同体尚未形成。长期以来，一些学科对西方概念、理论、逻辑和知识体系有路径依赖，缺乏能够为国际接受和理解的知识体系来阐发我们自己的历史文化与政治经济。知识体系的自主建构缺失使得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空间显得逼仄狭小，尽管强调要“走出去”，但理论落后于实践。

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伴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加速转型发展，党和国家对哲学社会科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期待其在理论引领、话语传播、智力支撑等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亟须加快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自主性、引领性建构，建立起具有时代特征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能够反映中国国情和历史深度，进而指导中国现实发展，并和西方知识体系进行平等对话。

2. 当代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迎来新机遇

当代中国正面对历史上最广泛深刻的社会变革，以及最气势恢宏的实践创新。中共中央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决策部署，对当前高校提升哲学社会科学整体水

平提出了更高要求，也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

第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巩固提升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提供新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应运而生，其指引哲学社会科学发展的思想，充分体现了党中央站在巩固马克思主义指导地位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共同思想基础的高度，对高校改革发展提出了战略要求。在党中央高度重视和坚强领导下，党的思想理论建设不断推进，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在新时代的繁荣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和坚强政治保证。

第二，迈向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实现亟须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提供理论与文化新动力。我国已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顺利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正在向第二个百年目标迈进，进入又一个新的伟大征程。在“两个大局”交织激荡的时代背景下，世界进入动荡变革期，发展的外部环境日益复杂。我国更加坚定自立自强和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创新作为“第一动力”的地位和作用更加明显，同时哲学社会科学作为综合国力特别是文化软实力重要组成部分的地位和作用也更加突出。我国不断推进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发展，不断扩大对外开放，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利益关系、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人民群众对高质量思想和文化的需要更加迫切也更加多样，这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拓展了空间、注入了活力。在启航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征途中，完成第二个百年目标任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新的繁荣发展，在实践中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不断丰富其实践特色、理论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

第三，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国际话语权提供新舞台。在当今世界舞台上，中国的形象基本上仍是“他塑”而非“自塑”，经常处于“有理说不出、说了传不开”的尴尬境地，议题的主动设置和引领能力偏弱，

对外话语权及影响力有待提升。目前,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在学术命题、学术观点、学术话语、学术思想上的能力、水平同我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还不太相称。面对当前世界和中国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深刻变革,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没有给出一系列充分、有力、前瞻和广为接受的分析概念、价值命题和逻辑框架。面对全球各种思想和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我国如何提高国际话语权、增强文化软实力、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迫切需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地发挥作用。

3. 自主构建中国特色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体系面临新挑战

从当前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现状看,与新时代对哲学社会科学的使命与责任相比,其自主建构基础不强,仍然面临困难和挑战。

第一,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理论创新落后于新时代的伟大实践,急需发挥引领经济社会发展功能。随着我国进入新时代,经济社会各个领域都迎来了新一轮的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同时,我国仍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面对国际国内新形势和新冠肺炎疫情等不确定因素,迫切需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挥思想引领和智库主力军作用。然而,目前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还是较多地延续西方国家的理论和方法,在理论创新、实践创造上面临时代急需变革的挑战,发现真问题、解决真问题的能力仍然较弱。我国正经历着需要思想、创造思想的伟大时代,但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促进理论诞生,助力生产发展的能力整体上落后于经济社会的变革实践与创新的需求。

第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水平和影响力提升滞后于我国国际地位的提升,急需增强文化传承与创新能力。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和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华民族在五千年文明历史中孕育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领导人民通过革命、建设、改革不断创造出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都需要哲学社会科学阐释其中丰富的内涵和深刻的机理。随着我国经济和科技实力的快速提升,我国的国际地位不断上升,而与此

同时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整体研究实力和影响力提升却相对滞后,无法满足党中央治国理政和参与全球治理的需要。

第三,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面临新的挑战,急需担当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伴随“两个大局”交织演进,以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对我国进行遏制打压,同时也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大对我国的围堵,给大学生群体思想带来了消极影响,甚至有少数学生不同程度地存在价值取向扭曲、社会责任感缺乏、艰苦奋斗精神淡化、心理素质欠佳等问题,对高校育人能力提出了更加严峻的挑战。以大学生为代表的青年肩负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责任和使命,不仅要掌握强国的本领和技能,更要树立坚定的理想信念,这就需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挥育人优势,着力履行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使命。

二、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要通过自主建构担当新时代的使命

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期。在世界格局深刻变化的背景下,面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需求,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需要自觉承担新的历史使命。

1. 在民族复兴中更加坚定“四个自信”,继续巩固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当今世界和中国正在发生全方位的变革,但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还不具备前瞻性的理论诠释能力和引领能力,在议题设置、理论引领、话语创新、国际对话等方面还处于相对弱势地位。面对全球各种思想文化和价值观、话语权相互交融交锋的复杂形势,我国亟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加快理论建构,从而进一步增强软实力,提高国际影响力和话语权。在此背景下,当前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者既要成为“四个自信”的筑基者,也要大力促进“四个自信”成为大众文化的坚实基础。

面对社会思潮纷纭激荡、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的新形势,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应

主动担当新的历史使命，继续巩固和深入发展21世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切实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相融合，进一步聚焦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方位服务党的全面领导和党中央治国理政。

2. 在全球化进程中强化铸魂育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力培养时代新人

高校哲学社会科学根本任务是铸魂育人，这也是高校在哲学社会科学“五路大军”中特色优势的重要体现。高校应切实担负起铸魂育人的历史使命，聚焦培育时代新人、武装人民的核心目标，进一步提升民众的道德水平、文化认同和理论素养，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在当前的全球化进程中，包括国家在内的各种实体、组织变得越来越相互依存，同时也充斥着反全球化力量的阻抗与增生，新冠肺炎疫情则使全球化产生更大的不确定性。新一轮的全球化发展需要重建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内核的新型全球治理体系，以有效应对全球化和反全球化的激烈交锋，以及全球治理范式变革带来的全面挑战。面对不同价值观、不同思想文化、不同发展模式的冲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从根本上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的重大问题，引导学生自觉投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奋斗。

3. 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全面推出中国立场中国方案中国理论

当今世界伴随着国际秩序和国际体系深度调整，大国博弈呈现出愈加复杂多变的态势。新兴经济体的群体性崛起，深刻影响了全球经济格局和经济可持续发展，特别是中国的快速崛起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不断攀升。全球治理、贸易规则、文明冲突、气候变化等全球性议题，决定了建立一种全球合作框架的重要性。当前的全球经济治理体系正在发生深刻变化，由西方国家主导的格局将逐步转向新兴经济体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共同治理，基于人类命

运共同体的共治模式将取得优势地位，并可能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新治理架构。

面对大变局带来的各种挑战，当代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的任务，就是要从理论上对诸多百年未有的内生逻辑作出深刻回答，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价值内涵和制度优势，并针对如何应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作出系统性、战略性的规划研究，为全世界的国家和民族发展提供中国方案、中国智慧、中国理论。

4. 积极参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创造新世界秩序提供建构性思想理论

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伟大构想，已经成为破解全球性治理难题的中国方案，这是中国创新发展21世纪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大原创性贡献。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传统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克服少数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治理困境、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新秩序，提出了更具建设性、更有吸引力的系统解决方案。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从更加长远的未来情景出发深入思考人类共存与发展的模式，提出解决人类所面临全球问题的新方案，这显然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认知局限，具有重大理论和实践价值。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首倡国，中国应当主动对此进行深入阐释和科学论证。我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要善于利用话语领先优势积极布局研究，力争在新世界秩序、全球正义、全球治理等领域打造一批高水平原创研究成果，为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增进文化理解认同提供丰富的理论支撑，同时让世界更好认识中国、了解中国，为构建更美好的新世界秩序贡献中国力量。

三、自主构建中国特色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体系的路径思考

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给《文史哲》编辑部全体编辑人员的回信精神，更好地坚持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需要通过扎根中国、铸魂育人、范式迭代、文明互鉴

等路径,促进中国特色高校哲学社会科学体系自主构建。

1. 扎根中国的自主构建

一是发展 21 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将马克思主义融入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文化传播等各个领域,实现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二是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和创新创造。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进一步继承、弘扬和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厘清中华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剖析中华文化组成的各个部分,找到联系中华文化各部分的肯綮枢纽,汲取其中的思想精华并做到推陈出新。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传统文化经典文献研究和整理出版,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全方位融入人才培养各环节,以中华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及道德精髓滋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快推进现代转型和创新创造,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服务于新时代的文化建设需求。

三是促进高校学术研究面向中国本土实践。塑造实践导向的观念体系,推动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始终坚持面向中国本土实践,与中国实践相结合设置研究命题和概念。加强调查研究,重视经验材料的作用,获取第一手资料,推动理论研究为实践发展发挥重要的指导作用。坚持人民至上,勇于回答时代课题,着眼群众需要的解疑释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心坎里。顺应时代潮流,聚焦时代问题,洞悉时代精神,凝聚时代共识,引领人民前进。坚持立德树人,树立高远的理想追求和深沉的家国情怀,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四是加强高校新型智库建设与咨政建言。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智库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加强高校智库建设,以服务党委政府决策为第一要务,以政策决策咨询为主攻方向,紧密对接党和国家需求,提升智库研究水

平,发挥智库咨政建言、理论创新、舆论引导、社会服务、对外交流等重要功能,打造党和政府“信得过、用得上”的新型智库。

2. 铸魂育人的主动担当

一是加强高品质思想文化的源头供给。融通古今中外,利用好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等三个方面的学术资源。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马克思主义最新成果加强学理化阐释和学术化表达,在马克思主义立场原理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的指导下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体系。创新性转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动传统价值理念、传统治国之道、传统文明体系的创新性转化,赋予革命文化新的时代内涵,促进中国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增强中国的文化软实力。批判吸收国外哲学社会科学的思想资源,同时保持坚定的文化立场,坚守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性和独立性,自觉抵制文化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的侵蚀,发展具有民族性、开放精神、百家之长的新型现代中国文化。

二是推动教材体系的学术化和开放化建设。建设高质量的教材体系,推动教材的学术化发展,创造更多有价值的原创性学术成果,将学术成果及时融入教材。立足新时代要求,系统总结中国经验,提炼具有中国风格的新概念新表述,推动中国特色教材体系建设。加强政治指导,确保每一部教材都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价值取向,确保教材体系全面贯彻党的领导和治国理政要求。

三是发挥哲学社会科学育人功能。发挥思想引领功能,帮助学生树立科学思想,努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发挥精神塑造功能,不断丰富学生的精神世界,培养学生良好的精神品质,为其全面发展提供必要的精神动力支撑。发挥行为规范功能,推动学生将理论成果转化在外在行为,用实践检验思想政治教育的成效。发挥人文关怀功能,促进学生综合能力素质的全面发展,引领学生健康成长。

四是构建“三学一体”综合发展体系。以

学生成长为中心，深化教育教学改革，推进思政教育的现代化转型，将思想教育和价值引领融于知识传授过程，助推学生健康成长。以学术为基础，推进教学与科研的深度融合，自觉把马克思主义及党的理论创新成果充分体现在学生培养的各个环节，把学术成果转化为人培养新引擎。以学科为支撑，打造学术创新和学生培养的平台，坚持以人为核心推进学科建设，确保学科资源和成果对人才培养的溢出。

3. 范式创新的战略迭代

一是遵循育人育才导向促进范式迭代。坚持以育人育才为中心构建新时代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战略，加大力度推动哲学社会科学范式设计转型，促进“以解决现实问题为导向”向“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纵深发展。

二是推动新型交叉学科建设。加强学科交叉融合的顶层设计和系统谋划，促进“理-工-文-艺”多学科交叉和跨界整合，为跨学科专业定制知识图谱和能力图谱，构建包含建立元认知、训练跨学科元能力、掌握当代文明通识及跨学科领域知识、具备跨学科专业领域技能四个层次的交叉学科教育体系。面向国家战略急需和国际前沿领域，以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牵引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汇聚研究，凝练培育新的学科方向。

三是完成大数据时代的旨趣转换。适应大数据时代的思维转变和方法变革，推动大数据与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融合，运用先进的大数据处理和智能化方法，研究互联网空间和数字孪生世界的重大学术问题，发展“数字+”哲学社会科学新领域。借助大数据所掌握的“全”信息，有效打破学科研究获取信息的数量和覆

盖面有限及研究方法单一的状况，为学科发展创造出更坚实的基础和更开阔的空间。构建大数据时代学术成果的多元化传播体系，提高学术成果传播的效率和趣味性。

4. 文明互鉴的动能激发

一是深化文明交流与互鉴。多措并举将文明交流互鉴落到实处，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充分挖掘中华文明中蕴藏的丰富智慧，弘扬博大精深、灿烂悠久的中华文明，推动中华文明与其他文明的共同发展。深化新时代文明交流互鉴，倡导不同文明平等包容、和谐共处，探索多元文明长期共存理想模式，让世界的文明花园更加多姿多彩。

二是不断提升文化软实力。坚定文化自信，向全世界主动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弘扬时代精神的当代中国文化创新成果。坚持与时俱进，把握国际传播领域移动化、社交化、可视化趋势，加快构建全媒体传播新格局，努力以国外受众听得懂、听得进、听得明白且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中华文明，为推动中外文明交流互鉴创造条件。

三是构建全球战略伙伴合作网络。积极探索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国际交流和教育合作的新形式、新方法，与国外高水平大学和科研机构开展深度合作，构建全球战略伙伴合作网络，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学术交流等领域开展实质性合作。推进高水平大学的国际化进程，坚持以引进优质教育资源为导向，以培养国际化人才为核心，提高中外合作办学的质量和水平。

(责任编辑 吴 虑)

基于系统思维的 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与教育评价改革

——兼论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系统思维

卢晓中

(华南师范大学, 广东 广州 510898)

摘要: 高质量教育体系, 除了指教育体系各个子体系及其诸方面的高质量外, 更强调和突出整个教育体系的高质量。一个高质量的教育体系, 必定是系统性受到高度重视、差异性得到应有尊重、个性得到极大张扬的总体样态。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系统思维体现在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相一致, 教学与科研相融合, 创新思维与社会实践相统一, 科学与人文相结合, 自主、选择、多元相并举。教育评价既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一种引领和保障, 起着极其重要的牵引作用, 同时它也是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不可缺少的关键一环。教育评价的牵引作用主要是通过自身的价值性、系统性和科学性来实现的。

关键词: 高质量; 教育体系; 系统性; 拔尖创新人才; 教育评价

中图分类号: G649.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7-0009-08

专题研究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我国“十四五”期间“坚持系统观念”的发展原则和“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教育发展目标。2021年3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强调“要围绕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以教育评价改革为牵引, 统筹推进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改革”。对此, 我们至少可以做以下两点理解: 一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与坚持系统观念是内在关联的, 二是教育评价改革可以牵引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基于以上两点理解, 在对高质量教育体系寻求正确

认识的基础上, 着重探讨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系统思维, 并对如何发挥教育评价改革的牵引作用做一探讨。

一、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系统性

高质量教育体系, 除了指教育体系各个子体系及其诸方面的高质量外, 更强调和突出整个教育体系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各个子体系及其诸方面的高质量, 无疑是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前提和基础。没有教育各子体系及其诸方面的高质量, 就不可能有整个教育体系的高质量。

收稿日期: 2021-06-12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粤港澳大湾区教育一体化发展的问题与制度创新研究”(AGA200016)

作者简介: 卢晓中, 男, 教授, 华南师范大学粤港澳大湾区教育发展高等研究院院长,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学术委员, 主要从事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理论研究。

但教育各个子体系及其诸方面的高质量，并不意味着整个教育体系便自然而然的高质量。因为只限于局部的教育某子体系或教育某方面的高质量，可能会因其质量目标与标准相对狭隘与功利，且缺乏整体的衔接与协调，以致按此质量标准建设而获得的所谓的“高质量”，将其放置在整个教育体系中常常并不能有力支撑建设高质量的教育体系，甚至有时还可能阻碍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构建。这在教育实践中并不鲜见。比如在应试教育的导向和驱动下，基础教育各学段往往是以下一学段的升学率为质量目标与标准，而较少关注学生更长远未来和可持续发展，因此也就会时常出现学生赢得高考但未赢得人生的现象。这一情形下的基础教育体系必难以为高质量的高等教育体系奠定扎实基础和提供强有力支撑，自然也就谈不上整个教育体系的高质量发展。再比如德育和智育在高等教育系统中往往分属两个相对独立的系统，从教师到课程都是分开而设，有专门的德育教师（常常由学院分管学生工作的副书记和政治辅导员兼任），也有专门的思政类课程。而学科课程则没有明确学生思政目标和任务，“教书育人”是真命题还是假命题至今仍为高等教育理论和实践界广泛讨论的一个话题；而现实中的确也存在“只教书不育人”的现象，学生价值观的培养跟专业、学科知识的学习相分离，高校学生思政成效难尽如人意在相当程度上也缘于此。为了解决教书与育人“两张皮”问题，当前高校正在大力推行课程思政，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根本任务落实到各类课程，强调思想政治理论课与其他学科专业课程协同育德，实现知识传授、价值塑造和能力培养的高度统一，形成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但如何使对学生的育德与学科专业学习有机衔接而不是生硬植入，则需要解决好学校思政课程与其他课程思政之间的衔接与协调问题，也需要处理好学校思政课程与各种活动之间的横向贯通问题。至于从教育内外部关系的角度来审视如何建立健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机制则是当前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的一个重点，同时也是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的一个难点。凡此种种，

都涉及教育体系与各个子体系及其诸方面之间的质量关系问题，教育体系中的这些质量关系问题处理或解决不好，这样的教育体系就算不上高质量。

由此可见，整个教育体系的高质量有赖于各个高质量的教育子体系及其诸方面的有机衔接、相互协调，形成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接力与合力，这便是教育体系的系统性。通常来说，自然界的体系遵循自然的法则和规律，而人类社会的体系则要复杂得多。影响这个体系的因素除人性的自然发展之外，还有人类社会对自身认识的发展和主观建构。但不论何种体系，系统性无疑是体系的根本属性，也是体系之所以成其为体系的根本理由。体系的这一根本属性具有三个本质特征：整体关联性、持续发展性和差异互洽性。如果具体到人类社会的某个社会体系的实际而言，由于其为一种主观建构，因而并不能保证该社会体系一定具有系统性这一根本属性，这也就是我们经常见到的一种现象，即“事情本应如此，而事实未必如此”。实际上，这种现象反映了已然与未然、价值判断与事实判断的关系，也是“休谟剃刀”命题所关注的问题。对于教育体系来说，也正因如此，教育体系的系统性才仍然是我们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努力方向，也是其核心和关键所在。从教育体系的系统性三个本质特征来看，其整体关联性强调的是通过教育各子体系及其诸方面的关联形成教育体系的整体发展；持续发展性着眼的是教育长远发展目标和人的可持续发展，通过教育各子体系及其诸方面有机衔接、相互协调，提升和增强教育体系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的能力；差异互洽性则是关注教育各个子系统及其诸方面的不同与个性特征，通过有机衔接、相互协调、高度内洽，促使教育体系的内部功能整合和整体优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并不排斥教育各个子体系及其诸方面的差异性和个性特征，恰恰更强调承认和尊重教育体系中的这种差异性和个性特征。实际上，正是这种差异性和个性特征，不仅使教育呈现不可或缺的多质化，有利于学生个性

发展,而且也更凸显了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必须性,其构建成效才能得到极大彰显。忽视这种差异性和个性特征,一味追求教育“大一统”的所谓“系统性”,注定不是一个良性的现代教育体系,更遑论高质量的教育体系,这也是违背教育规律的一种表现。总之,一个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必定是系统性受到高度重视、差异性得到应有尊重、个性得到极大张扬的总体样态。

作为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核心和关键,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系统性可从多维度或多方面来认识,这些维度或方面既表征了当前深化我国教育领域综合改革亟须攻坚克难的重点和难点,也是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方向和突破口。当前,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应从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出发,把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系统性作为寻求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的基本依据和主要路向。

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系统思维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我们对高等教育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对科学知识和卓越人才的渴求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尤为迫切。2021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清华大学考察时又强调,“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我们要建设的世界一流大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流大学,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就是要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他特别指出,“中国教育是能够培养出大师来的。我们要有这个自信,开拓视野、兼收并蓄,扎扎实实把中国教育办好”。

近年来,遭遇的“中兴事件”“华为事件”等由“卡脖子”技术带来的困扰,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彻底解除“最后一公里”中的重要一环即疫苗、检测技术的研发竞争,归根结底都是科技的竞争,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教育竞争。而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上也出现类似情况,如2020年,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在华招生

“撤场”;2020年5月,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签署了“10043号总统令”,其中提到“暂定和限制”包括目前或曾经受雇于实施或支持军民融合战略的机构学习,在实施或支持军民融合战略的机构学习或做研究的相关人员寻求通过F或J签证进入美国学习或进行美国研究的任何中国公民的非移民入境美国;2021年6月,500多名中国理工科研究生申请赴美签证时被美方拒签。根据美国学术机构统计,大约每年有3000至5000名理工科中国研究生以及目前在美访学的大批理工科学者赴美签证受到影响;^[1]还有一些华裔科学家在美受到打压。这对我们如何立足国内更好地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提出了新需求。为此,继2009年启动“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试验计划”(简称“珠峰计划”)后,2019年,《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加强创新人才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教育部的“六卓越一拔尖”计划2.0提出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卓越医生教育培养计划2.0、卓越农林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卓越教师培养计划2.0、卓越法治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卓越新闻传播人才教育培养计划2.0、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计划2.0。如果说人的成长对教育而言是一个接力和合力的系统化过程,那么对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而言,这种系统化过程更为必须,教育体系的系统性更为凸显。对于如何从系统思维出发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可从以下方面来认识。

1. 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相一致

如所周知,从纵向的教育体系而言,百年树人的教育,其长效性和持续性的本质特性决定了教育衔接的重要性。也就是说,人的成长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因此,作为培养人成长的教育无疑应是一个相互衔接的整体,每一个教育阶段都必须相互衔接、瞻前顾后,而不是一种各行其是的分割型样态。这有赖于学校教育各阶段教育相互关联、相互协调,尤其是相互协同的共同努力。

对于系统化过程“更为必须”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来说,教育体系的系统性决定了首先应当把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作为教育体系的一个

整体目标,需要教育各个学段的协同完成。这也就要求教育各个学段克服过去那种过于狭隘和功利化目标取向,更着眼于学生长远的发展,特别是学生创新素质的养成。实际上,“钱学森之问”主要论及的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不仅是问教育的某个阶段如高等教育(人们常常认为是在问大学),更是问整个中国教育体系。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起点在发现和选拔,然后教育的各个阶段进行系统化地协同培养,这就要求从纵向教育体系上建立协同育人机制,尤其需要加强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关联。长期以来,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联系仅仅是高考,高中阶段主要是围绕高考升学率而展开教育活动。但高考“指挥棒”导向并不是着重于拔尖创新人才,更不是专门着眼于拔尖创新人才(事实也是如此),这就势必会影响到拔尖创新人才的选拔和培养。因此,在当前高考招生制度改革中,拔尖创新人才在早期、前期的选拔和培养过程中就应受到高度重视,特别是要建立和健全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和培养的“绿色通道”,而且这种“绿色通道”必须是系统化的。2020年启动的“强基计划”(基础学科招生改革试点,主要是为了选拔培养有志于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且综合素质优秀或基础学科拔尖的学生),实际上就是着眼于拔尖创新人才前期选拔与培养的“绿色通道”。从这一计划试行一年的情况来看,各试行高校的反映总体上还是积极的,但还需要不断完善,尤其是这一“绿色通道”亟待逐步向前后延伸(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完整阶段),贯穿教育的全过程,并且选拔与培养需要协同和一致起来。比如在高等教育阶段,建立和健全本硕博贯通式培养模式,包括健全博士研究生“申请—考核”招生选拔机制,扩大直博生招生比例,探索在“高精尖缺”领域招收优秀本科毕业生直接攻读博士学位的办法;加强“本硕博”贯通培养,实行培养方案一体化设计,如近日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成立未来空天技术学院,着眼于培养一批引领未来空天科技发展,具有想象力、洞察力、执行力、领导力等核心素质,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未来空天系统大师,探索拔尖创新人才培

养的“北航范式”,该范式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实施八年制“本硕博”贯通、定制化学研一体。^[2]值得提及的是,跨校的“本硕博”贯通式培养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一个重要方式,而其中尤为关键的是如何确保培养方案、培养模式的一体化,这有赖于加强顶层政策设计、制度安排和管理协调,建立起跨校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共同体。

此外,需要加强高等教育与基础教育的多方面联系,增进彼此了解,使教育链与拔尖创新人才的成长链有机衔接,这将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选拔和培养的针对性和有效性。近年来,一些著名大学也注意加强和中学的联系与衔接,如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大学—中学”圆桌论坛“知识的阶梯与教育的差异”,清华大学定期举办的“全国高中校长高峰论坛”等。

2. 教学与科研相融合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一个很重要方面就是大学如何以高水平的科研支撑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19世纪初叶发端于德国的教学与科研相统一,曾使德国大学成为现代大学的楷模,并推动世界学术中心转移到德国。但毋庸讳言,在我国,教学与科研相分离的状况常常是困扰大学的一个实际问题,直至今日仍然如此。解决教学与科研“两张皮”状况,一直是高等教育改革攻坚克难的方向,各种改革措施出台不断,总体取向上是以激励教学、重视人才培养为主导。但激励教学、重视人才培养一定不能以弱化高校科研为代价,而应将教师的科研资源有效地转化为教学资源,真正成为创新人才尤其是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力。这是由高校人才培养和科研的特点所决定的,是高等教育的一个基本规律。从高校把科研引入教学过程使教学与科研相结合,到教学与科研相融合:科研即教学,教学即科研,这有助于高校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这就需要建立促使教学与科研深度融合的评价机制进行牵引,比如设立科研评价的“教学因子”,即对一个高校教师的科研业绩评价,除了要看其承担科研课题的能力、论著发表的水平、科研获奖的情况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该教师的科研成果

转化为人才培养资源的转化度。再比如建立学科建设成效评价的人才培养指数。近年来,在教育部的学科评估、“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和各类高层次人才评选中人才培养情况受到愈来愈多的重视,实际上也体现了教育评价的牵引作用。

3. 创新思维与社会实践相统一

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提出在人才培养上要坚持文化知识学习与思想品德修养的统一、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的统一、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的统一。2011年,胡锦涛同志在清华大学百年校庆大会上对青年大学生提出把文化知识学习与思想品德修养紧密结合起来、创新思维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全面发展与个性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其中,把“理论学习与社会实践相结合”改为“创新思维与社会实践紧密结合起来”,这一改动体现了学生培养着眼点上的新认识和新发展。它既表明了人的创新思维的重要,同时又揭示了培养学生创新思维的路径,即通过社会实践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比如在设计教学过程的实践性环节时,要着眼于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这让我们对过去仅仅把高校实践性环节视为学生将理论知识运用于实践的应用能力及学生的动手能力的定位有了新的认识和新的提升。

作为高校人才培养的实践性环节,产教融合和科教融合是大学培养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的重要途径,也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关键一环。如果将高校分类发展具体到人才培养,产教融合和科教融合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实际上体现了一种分类,即产教融合是应用型的技术创新,科教融合是研究型的科学创新。应从高校的人才培养、科学研究、为社会服务三大职能看待创新型、复合型、应用型人才,尤其是通过产教融合培养应用型的拔尖创新人才,通过科教融合培养研究型的拔尖创新型人才。而产教融合、科教融合深化,就需要加强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效衔接,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与产业需求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3]

当前,涉及高校人才培养的实践性环节众多,比如大学里的“双创”教育、“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创造性劳动教育等多样化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实践活动、实践环节,都有一个共同的旨趣,即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同时也着眼于发现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由于这些实践活动、实践环节往往归口到不同的学校职能部门来设计、组织和实施,而各职能部门所瞄准或对标的目的或是要实现的价值常常比较多样,如何更好地促使这些实践活动和实践环节的价值整合、功能互补和实践对接,是一个非常必要且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

4. 科学与人文相结合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2015年公开出版的《反思教育:向“全球共同利益”的理念转变?》报告书中提出未来教育的思想基础是人文主义。该报告书主张教育须“超越狭隘的功利主义和经济主义,将人类生存的多个方面融合起来,采取开放的灵活的全方位的学习方法,为所有人提供发挥自身潜能的机会,以实现可持续的未来,过上有尊严的生活”^[4]。过去我们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时往往把科学与人文割裂开来,更多地关注学生的科学素养而忽视人文素养。但良好的人文素养是拔尖创新人才成长必不可少的因素。翻开世界科学发展史,我们不难发现,众多的科学大师不仅具有很高的科学素养,还拥有良好的人文素养,包括哲学素养、道德素养、艺术素养、心理素养、文学素养。人文素养与科学素养的有机结合成就了他们伟大的科学事业。拥有良好的人文素养,不仅有利于拔尖创新人才创新灵感的发生,而且有助于他们对科学的人文价值认同和追求,这种人文价值认同和追求在科技高度发达的当今社会,对成就拔尖创新人才伟大的科学事业又显得尤其重要。重视人文,还承载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正如《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所提出的,教育要使生“学会生存生活”。这里将生存与生活既分开又联系,一个重要意蕴就在于学校教育不仅仅是为了解决学生谋生就业创业的问题,更要让他们懂得生活和正确理解幸福生活的真正意义。

这对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同样是不可或缺的。

5. 自主、选择、多元相并举

作为特殊人才的拔尖创新人才需要特殊的培养,包括建立专门的培养机构、特殊的培养机制等。例如,美国的荣誉教育就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一种教育理念,也是一种非常规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可运用于不同层类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如社区学院教育、文理学院和大学本科教育层次都有相应的荣誉教育。我国许多大学也建立了形式多样的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教学组织或模式,如北京大学的“元培学院”、清华大学的“钱学森力学班”、南京大学的“匡亚明学院”,等等。不管哪个国家或何种教学组织、模式,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上都有一些共同的取向和做法,如在学生选拔、课程体系及评价制度等方面体现出自主、选择、多元相并举的取向,包括构建综合评价选拔制度,注重考察学生的家庭环境、成长经历、个人兴趣、课外活动等非智力因素,尤其要强化对学生个人兴趣与动机的评价,构建丰富多样的课程体系,提升学生自主择课的空间和能力。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方案的课程学分要求可以适当地低于非拔尖创新人才的课程学分总量,以便他们有更多时间完成难度更大、要求更高的课程,追求真正感兴趣的学术领域。同时,通过建立一定的激励机制,吸引各学科教师向拔尖创新人才提供课程计划,促使课程类型不断丰富,课程内容得到及时更新,确保学生有课可选,并从中真正获益。开设什么课程应注重以生为本,也就是说,开设的课程不单是依据教师的学术专长,还要充分考虑学生的需求,尤其是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学生需要,建立机制鼓励教师为此专门准备课程计划。此外,为了让学生及时了解课程开设等方面的信息,学校将每学年度开设的课程目录提前半个或一个学期上网,并提供专门的学术咨询服务,帮助学生选择可以满足个人兴趣和课业要求的课程,提升学生的选课能力;构建多元化、发展性的学业考核评价制度,注意改变以考试为主的结果性评价方式,更多关注学生学习行为的过程性评价,并以此形成鼓励创新的学习共同体文

化和氛围。

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如何综合施策的问题,也需要用一种系统思维从培养目标和培养过程的角度去思考,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与融合,不仅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的需要,也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需要,因为学生创新素质培养不仅是智育问题,与其他诸育同样关系密切。例如,创新的一个重要性格特征便是责任,通过德育使学生增强社会责任的担当意识和民族复兴、国家强大的使命感,从而激发学生锐意创新、报效国家和社会,这对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尤其是形成动力机制无疑是十分重要的。至于作为学生人文素养培育的美育陶冶和以创造性劳动为特征的劳育活动,都有助于学生创新素质的养成。这里还需要澄清人的全面发展与拔尖创新人才培养的关系,在许多人看来,拔尖创新人才一定是孤傲、偏执的,不是全面发展的人。不可否认,一些拔尖创新人才确有如是现象,但并不必然,不应成为这类人才的身份标识与固定人设。我们同样能见到并感受到许多有着良好个性的科学大家。今天,我们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应当着眼于人的全面发展,同时又鼓励人的良好个性发展,并包容和接纳人的各种性格特征,这也是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现代意义和追求。

三、教育评价改革的牵引作用

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以下简称《总体方案》)提出教育评价事关教育发展方向,有什么样的评价指挥棒,就有什么样的办学导向。教育评价改革与育人方式、办学模式、管理体制、保障机制等诸多重要的改革方面的关联密切,事关教育发展和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的方向。因此,教育评价既是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一种引领和保障,起着极其重要的牵引作用;同时,它又是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不可或缺的关键一环。

当前,要发挥好教育评价改革在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中的牵引作用,并成为其关键一环,

就必须用系统思维来推进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提出的“系统推进教育评价改革”，“增强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以及坚持科学的“三观”即教育发展观、人才成长观和选人用人观，都体现了推进教育评价改革的系统思维。比如，虽然“管办评”分离政策导向的着眼点和初衷是作为推动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抓手和实现目标。但政府管、学校办、社会评这一“管办评”分离政策取向，有意无意地使“评”外在于教育、外在于学校，致使大学内部评价在不同程度上“被弱化、被异化、被外化”^[9]。特别是由于外部评价尤其是社会评价的“锦标赛”偏好，使教育“管办评”分离中的评价实际上存在着重选拔与排名意义而轻成长与发展价值的问题。因此，教育部领导特别提出要构建政府、教育机构、社会三者新型关系，建立“管办评”相对分离又有机统一的制度。^[10]教育评价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彰显其系统性的牵引作用，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教育评价自身的系统性，包括大中小学评价目标与指标及各学段评价目标与指标的有机衔接和一体化，德智体美劳诸育评价的内洽性，党政履职教育工作评价、学校评价、教师评价、学生评价、选人用人评价的协同性等。

教育评价是在一定教育价值观的指导下，依据确立的教育目标，通过使用一定的技术和方法，对所实施的各种教育活动、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进行科学判定的过程。^[11]因此，教育评价对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的牵引作用关键在于选择怎样的评价标准与指标，这与教育发展观、人才成长观、选人用人观“三观”高度关联，而“三观”所体现的教育价值观也是确立评价标准与指标的基本依据。当前，要发挥教育评价改革对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的牵引作用，亟待确立正确的教育价值观、扭转不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问题。比如把立德树人作为教育发展的根本任务并在教育评价制度中充分体现和落实；发展素质教育，把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作为培养人的根本目的，做到“五育”并举与融合；把师德师风作为评价教师的第一标准，突出质量导向，重点评价学术贡献、社会贡献以

及支撑人才培养情况，引导教师潜心育人等。

发挥教育评价对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的牵引作用还在于如何提升和增强教育评价的科学性问题，包括探索科学的评价方式、评价技术、评价方法，以及提升评价主体的专业化水平。正如《总体方案》所指出的，教育评价要“坚持科学有效，改进结果评价，强化过程评价，探索增值评价，健全综合评价，充分利用信息技术，提高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专业性、客观性”，“加强教师教育评价能力建设，支持有条件的高校设立教育评价、教育测量等相关学科专业，培养教育评价专门人才”^[12]。

提升和增强教育评价的科学性需针对不同的评价对象选择不同的评价方式，如对于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教育评价，会涉及发现和选拔评价、学业考核评价等。如前所述，构建综合评价选拔制度，注重考察学生的家庭环境、成长经历、个人兴趣、课外活动等非智力因素，尤其要强化对学生个人兴趣与动机的评价；构建多元化、发展性的学业考核评价制度，注意改变以考试为主的结果性评价方式，而更多关注学生学习行为的过程性评价等。

教育评价的科学化，最为重要的一点就是尊重教育内在规律，把握教育事实特征。近年来，教育评价越来越呈现出一种量化倾向，并常常被认为是一种科学化追求。不可否认，适当的量化有助于增强教育评价的精准性，减少模糊性，对于提升教育评价的科学性和管理的科学化是有价值的。但是，如果对教育评价的量化强调到一个不恰当的程度，甚至走向一个极端，评必量化，就有可能违背教育内在规律，也脱离教育事实特征，从而使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都可能出现偏差和偏向，以致教育评价的科学性不仅得不到提升和增强，而且也不能使教育评价起到正确的牵引作用，甚至极有可能对高质量教育体系构建产生一种误导。周川教授在《量化评价的泛滥及其危害》一文中指出，当前“高校量化学术评价的泛滥，表现为数量过多、指标过高、变动太快、挂钩太滥；它混淆了内容与形式、质量与数量的关系，将学术研究导向庸俗的外部动机，使评价权力从同行

专家转移到管理者手里，强化了‘五唯’倾向，导致教师职业尊严和‘双重忠诚’下降。量化学术评价的泛滥是功利主义办学观念和行政化管理方式共同作用的结果”^[9]。

以上情形实际上涉及如何处理事实判断和价值判断的关系，如对“双一流”建设成效评价中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所谓事实判断，更多的是着眼于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的量化指标的达成，而价值判断则关注和强调大学的发展方向 and 终极价值。“双一流”建设必须建立起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内在联系，也就是说，事实判断中要有价值引导，而价值判断中则需以事实判断为依据。目前，过于量化的事实判断缺乏价值的引导，如对教师的业绩认定与评价往往侧重于简单的量化数字，并以此作出价值判断，从而产生了错误的价值导向。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把一名教授终身工作的质量还原为一个简单的数字是完全没有道理的。事实上，要对一种思想、一种理论或研究发现的质量进行量化看来是不可能的”^[10]。因此，“双一流”建设成效的评价须选择反映现代大学的现代价值的指标导向，尤其应注意选择与现代大学发展方向和规律相一致的指标导向。同时，“双一流”建设成效的评价要十分重视非量化指标性的一流建设，如大学精神、大学文化、现代大学制度等，从而以此牵引“双一流”建设大学不断完善内部治理结构，形成调动各方积极参与的长效建设机制。

总之，科学的教育评价应当是量化评价与质性评价的相结合、相统一和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相结合、相统一，并使得技术与方法在推动和提升教育评价科学化的过程中从外在的加持，转变为内在的赋能。唯有科学的教育评

价才能对高质量教育体系的构建真正起到正确的牵引作用。

参考文献：

- [1] 美国拒签中国 500 余名理工科研究生，中方回应来了 [EB/OL]. (2021-07-06) [2021-07-08]. http://henan.china.com.cn/news/2021-07/07/content_41609893.htm.
- [2] 雷嘉. 北航成立未来空天技术学院 [N]. 中国青年报, 2021-07-14 (A4).
- [3] 杜玉波. 适应新发展格局需要 推进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 [J]. 中国高教研究, 2020 (12): 1-4.
- [4] 顾明远. 对教育本质的新认识 [EB/OL]. (2016-01-05) [2020-03-13]. http://news.gmw.cn/2016-01/05/content_18358849.htm.
- [5] 卢晓中. 论大学办学自主权视域下的大学生评价 [J]. 江苏高教, 2021 (6): 9-14.
- [6] 翁铁慧. 加快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 [N]. 光明日报, 2020-11-16 (6).
- [7] 全国十二所重点师范大学联合. 教育基础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02: 265.
- [8] 中共中央 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J].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公报, 2020 (11): 2-7.
- [9] 周川. 量化评价的泛滥及其危害 [J]. 江苏高教, 2021 (5): 8-14.
- [10] 里茨尔. 社会的麦当劳化 [M]. 顾建光,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99: 110.

(责任编辑 刘红)

(下转第 37 页)

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体制观： 体系建设探微

俞国良

(中国人民大学, 北京 100872)

摘要: 新时代全面推进和深化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 必须树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体制观, 包括对价值体系、理论体系、发展体系、服务体系、实践体系和生态体系的正确认识和判断。具体而言, 价值体系是一组心理健康教育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价值判断和价值目标的集合体, 包含立德树人、以生为本、生命至上和责任为重等丰富的内涵和价值要素; 理论体系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思想指导下, 囊括中国特色、健康第一、健康中国和幸福中国等概念的理论支撑系统; 发展体系是一种兼顾纵向和横向发展的系统的渐进过程, 有效实现育心育德、全面发展、创新发展和特色发展的有机整合; 服务体系是遵循心理健康的发展特点和教育规律, 向师生员工提供各具特色, 各有侧重的心理健康与心理保健服务, 包括制度建设、机构建设、师资队伍和课程体系建设等内容; 实践体系则从个别咨询、团体咨询、危机干预和医教协同等实践途径入手, 落到实处、抓到痛处、收到成效; 生态体系重在建立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协同联动机制, 营造良好的学校、家庭和生态环境, 即生态课堂、生态校园、家校协同和社教一体, 真正实现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效果的最大化、最优化。

关键词: 高等学校; 心理健康教育; 心理健康教育体制观; 心理健康教育体系建设

中图分类号: G4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7-0017-11

无论任何时候, 高等学校都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自改革开放以来, 我国开启了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的快速转型, 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诸多领域密集的、普遍的、根本性的变革。这一转型不仅带来了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 也给人们的思想观念、心理状态、人格特征带来了巨大冲击, 更为重要的是由此我们跨入了新时代, 而高等学校的学生正处于这个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发展时期, 在变革中首当其冲。大学生是国家的栋梁、民族的希望, 大学阶段正是其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形成

发展的重要时期, 高等学校能否做好新时代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将决定这一特殊历史时期的大学生心理健康和高等教育内涵式发展的整体水平。毫无疑问, 新时代赋予了心理健康教育新内涵、新意义, 提出了新要求、新任务, 目前要进一步推进和深化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 必须树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体制观, 即对符合中国国情、富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及其外部相关制度体系的正确认识和判断, 包括心理健康教育的价值体系、理论体系、发展体系、服务体系、实践体系和

收稿日期: 2021-06-08

作者简介: 俞国良, 男, 教授, 中国人民大学心理研究所, 主要从事社会心理学、心理健康教育研究。

生态体系。

一、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价值体系建设

价值即客体对主体的意义，而价值体系则是价值的理论化、系统化。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价值体系是在新时代社会转型时期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社会意识特别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反映，为大学生一切社会活动、社会行为提供价值导向和价值依据。它是一组蕴含心理健康教育的价值观念、价值取向、价值判断、价值目标和价值追求的集合体，包含立德树人、以生为本、生命至上和责任为重等丰富内涵和价值要素。

1. 立德树人

学校是立德树人的地方。立德树人在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价值体系中位居首位。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将立德树人作为我国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战略的一项基本任务，而心理健康教育本来就是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题中之义。目前，立德树人的教育实践已经与我国社会主义发展阶段和基本国情遥相呼应，为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发挥了重要作用。其显著特征一是立德树人任务明确，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地位空前提高；二是德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政策海纳百川，通时合变。^[1] 至关重要，立德树人框架下的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坚持了正确的政治方向与价值导向。价值导向，从本质上来讲，是对社会上存在的多种多样的价值取向进行整合和消解的过程，^[2] 是引导大学生认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手段，它指明了立德树人“到哪里去”的问题，避免大学生在现代愈加多元的价值和道德取向中歧路亡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坚持不懈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广大师生做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坚定信仰者、积极传播者、模范践行者。”^[3] 这就要求高等学校必须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体现在心理健康教育全过程中，引导他们准确理解和把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深刻内涵和实践要求，

发挥其对立德树人的价值导向作用。

2. 以生为本

立德树人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育人为本、学生为本。全员育人、全过程育人、全方位育人，是打通立德树人“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手段。心理健康教育作为一种以人的发展为目的的教育实践活动，促进学生更好发展是其出发点和归宿。因为心理健康教育的主体是人，也只有人的积极主动参与，心理健康教育的效果才能最大化。它具有不同于学科专业教育的特点，特别强调潜移默化的影响，重视“润物细无声”的教育效果。要坚持面向全体学生，坚持正面教育，根据大学生身心发展特点和教育教学规律，聚焦他们的主要心理社会性发展任务，灵活运用心理辅导、心理咨询的理论知识和方法技能，培养他们的良好人格特质和积极心理品质，不断提高他们适应社会生活的能力；引导他们正确认识“义和利、群和己、成和败、得和失，培育自尊自信、理性平和、积极向上的健康心态，促进学生心理素质与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协调发展”^[4]。因此，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绝非是对大学生进行“宏大叙事”的灌输，也不是只强调他们的社会属性而完全忽视其自然属性，而是应该以入心为主，表里如一，知行统一，实践育人，即提供适合大学生发展需要的心理健康教育。只有真正从大学生实际出发，充分考虑他们的现实需要以及身心发展特点，遵循心理健康和教育规律，才能真正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3. 生命至上

生命至上意味着不仅要热爱生命、珍惜生命，更要彰显生命的价值。苏格拉底曾说，生命中最有价值的事，莫过于生命本身！生命是珍贵的，因为每个生命都是唯一的、无可替代的；生命是神圣的，因为生命的孕育要经历一个艰难的过程。生命能够顺利地降生到这个世界上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更不要说在成长过程中可能会遭遇各种风险、疾病、安全的挑战。生命又是独特的。正如世界上找不出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一样，世界上找不出两个完全相同的人。人的独特性不仅表现在先天的遗传素质

上,更表现在后天形成的不同个性、思维和精神上。生命是宝贵的、独特的,所以我们需要用心去珍爱,形成正确的生命意识,树立生命至上的价值理念。首先要接纳生命、关爱自我;还要对生命抱有积极的态度,更要珍惜生命;在热爱和珍惜生命的同时,也要尊重与呵护他人的生命。每个生命不只属于自己,每个人都要对生命负起责任,善待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在日常学习生活中确立坚定的生命信念,在社会交往中丰富本质力量的现实生命。无论遇到多大的挫折、失败,都不要厌恶甚至放弃生命。珍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是一个人的基本义务、神圣职责!

4. 责任为重

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人的生命与其他生命的本质区别在于人的心理生命和社会生命。前者指人具有自我意识,能够通过自己的各种心理活动,自觉地思考、调控、引导其生命价值;后者指人的生命存在是一种社会关系存在,它决定了生命的自由、尊严等价值取向,以及权利、义务和责任等价值要求。“世界因为我而有所不同”,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和价值在于对他人和社会作出贡献。拥有爱他人的能力,让生命在爱中得到滋养;从他人那里收获爱,让生命变得更有意义,都是生命价值的体现。当然,生命价值更体现在对社会的贡献上。每个人都从其生活的社会中获益,同时也需要承担一份社会责任,为国家、民族和社会作出一定贡献,这是个人生命价值的最高体现。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人,首先是对自己负责,特别是对自己的生命及其生命价值负责,然后是对社会、国家和民族负责,最后才是对他人、职业和家庭负责。大学生必须认识到自己的社会责任,并将其内化为自身的社会信念,最终外化为社会责任行动。毫无疑问,社会责任意识只有落实到行动上才能最终履行社会责任,因此,社会责任践行是社会责任感的归宿和落脚点。勇于担当社会责任,不仅关系到自身的生命、生存、生活和生涯,更关系到社会、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二、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体系建设

恩格斯指出,“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最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6]。理论思维是建构理论体系的基础,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理论体系就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把心理健康教育的相关概念、理论有机组织起来,进行逻辑化的概念推演与理论展开,并通过推理和论证形成一个层次分明、结构严谨的理论支持系统,为实践活动提供理论依据、支撑和遵循,包括中国特色、健康第一、健康中国和幸福中国等理论内核。

1. 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出现了许多新问题、新变化和新现象。高等学校如何立足于我国当下正在发生的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从心理健康教育角度回应、研究社会变革和社会变迁带来的当代大学生心理、精神层面的巨大变化,总结、提炼中国特色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新理念、新范畴、新表述,不仅能为大学生成长、成才助力,而且具有高度的本土独特性和全球启发性,这是构建中国特色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理论体系的题中应有之义。验证对比国内外研究成果,探索中国大学生心理发展中特有的和重要的心理现象,建立适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心理健康概念、理论与研究方法等,其基本途径是学习、选择、本土化。在此基础上,探索中国特色的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发展道路,即面向大学生、直面现实需要研究心理健康,加强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为新时代大学生的新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具体包括:以辩证唯物主义为指导思想;以中国古代心理健康思想为历史背景;以中华民族文化圈的影响为潜在变量;以中国人的心理与行为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揭示人类心理发展规律为基本任务;以社会现实为主要服务方向。它还要求我们选择中国人熟悉的概念、术语,寻找适合中国人的心理测量工具,发展解释

中国人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的模式理论，以此来建构符合中国特色的心理健康教育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从而走出一条既有中国特色又能与世界进行对话的学术发展之路。

2. 健康第一

健康是人类永恒的话题，健康的体魄和平衡的心态构成健康的个体。古今中外的哲贤圣者对此有着无数的训诫和智慧，且已达成共识。1948年4月7日生效的《世界卫生组织法》开章明义地指出“健康不仅为疾病或羸弱之消除，而系体格、精神与社会之完全健康状态”；1978年《阿拉木图宣言》中再次重申健康不仅是疾病与体虚的匿迹，而且是身心健康社会幸福的总体状态，是基本人权；1989年，世界卫生组织又一次深化了健康的概念，认为健康包括躯体健康、心理健康、社会适应良好和道德健康。确实，良好的健康状态可以提高生活质量，开发个体心理潜能，增强学习与发展能力，适应家庭和社会生活，支持可持久的人际生态和环境，并有助于个体安全、高效、快乐地融入社会。它既是一种发展资源，也是一项发展目的。为此，在2018年9月召开的全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健康第一”的健康教育理念，这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健康认识的创新，更是统揽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理论基石。

3. 健康中国

健康不仅关乎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期待，对社会的稳定和民族的可持续发展、国家的长治久安还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对此，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要加大心理健康问题基础性研究，做好心理健康知识和心理疾病科普工作，规范发展心理治疗、心理咨询等心理健康服务”^[7]。他进一步强调，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健康、心理健康的一系列重要论述，为在全社会构建健康教育理论体系和支持服务体系提供了根本遵循。为此，国家相关部门也陆续制定并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提高全民健康水平的政策与方案。特别是2021年4月，全国人大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

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其中，有三处关于心理健康的论述：在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中提出要“重视青少年身体素质和心理健康教育”；在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中提出要“重视精神卫生和心理健康”；在维护社会稳定和安全中提出要“健全社会心理服务体系和危机干预机制”。^[8]这是新时代我国健康教育事业发展的理论政策基础。因此，从社会健康促进的角度看，加强健康教育与服务是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必然要求。《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行动的意见》就明确提出要实施心理健康促进行动。

4. 幸福中国

幸福感（主观幸福感、心理幸福感和社会幸福感的总称）是衡量个体生活和适应状态的重要标准，也是国际上通行的衡量人民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9]当幸福中国作为我国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指标时，心理健康工作固然要承担起对各种心理问题进行咨询、治疗，以及进行教育补救的任务，但它更应该担负起引导人们更为健康、幸福生活的责任，为幸福中国服务。目前，全社会对幸福感的追求、对心理健康的关注度都在持续升温，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心理健康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人类快乐、幸福且体面、有尊严生活的基础。无论是通过自助、他助或互助，还是通过改变自我或改造环境，幸福已成为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追求。基于快乐论的主观幸福感是个体依据自己设定的标准对其生活质量所做的整体评价，认为幸福是一种快乐的体验，而维护心理健康，提高心理健康水平，就是让个体生活得幸福快乐；与主观幸福感不同，心理幸福感是建立在自我实现论基础之上的，它强调人的自我实现及人的本质的实现与显现，认为幸福发生在人们从事与深层价值最匹配的活动中，是人全身心的投入以完善自己的一种活动以此让自身的潜能得以充分发挥；相较于主观幸福感关注个体主观感受，心理幸福感关注个体在群体中互动与发展的客观体验，社会幸福感更关注个体的社会功能、社会价值和社会和谐，心理健康即可理解为社会适应良好的

幸福状态。可以说,对幸福感的不懈追求,是生命质的飞跃,也是对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目标的终极诠释。

三、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发展体系建设

“发展才是硬道理。”发展意味着事物由小到大、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的运动变化,心理健康教育作为新兴事物也是如此。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入大众视野,经由理论研究、政策设计与实践应用的推动获得蓬勃发展,目前我国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初具雏形的发展体系,就是其必然结果。在结构上由松散变为紧密、在实践上由各部门独立到多部门联动、在理念上由单一教育走向多元服务,这是一种兼顾纵向和横向发展的系统的渐进过程,有效实现了育心育德、全面发展、创新发展和特色发展的有机整合。

1. 育心育德

德育是一个有着丰富思想内涵的动态发展的概念体系,它与心理健康教育紧密联系,后者赋予德育全新的时代内涵。实际上,在我国高等学校教育实践中,心理健康教育很大程度上就是在德育的大框架下展开的。^[10]即强调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思想政治教育相统一,重视育心与育德相结合、育心为育德服务。但两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两者所附庸的对象、理论依据、工作原则不同,两者的内容和任务、教育途径和方法也不同。另一方面,二者的终极目标具有一致性,使学生在“德智体美劳”诸方面得到全面发展,不管是德育还是心理健康教育,都必须服务于这个目标;两者的教育内容具有部分重叠,在一些基本的文明习惯和道德规范上,如合作、理解、尊重、奉献等,德育与心理健康教育的关注点是一致的。最后,两者的服务对象具有同一性,其服务对象都是“大学生”,都需要充分考虑他们的主观能动性在发挥教育功能上所起到的决定性作用。一句话,两者相互联系、相互促进,且互惠共生、相倚互补。德育和思想政治教育对学生进行道

德观、价值观、人生观、世界观等方面的教育,为心理健康教育指明了方向,成为其背后强大的思想支撑;心理健康教育对学生个性、情感和意志品质等方面的培养,则赋予了德育新的时代内涵和教育范式。

2. 全面发展

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有利于提高学生的道德修养,培养良好品德(德育);有利于开发学生的智力和创造力,造就一代创新型人才(智育);有利于培养学生坚韧不拔的拼搏精神,增强身体素质(体育);有利于培养学生健全的人格,促进审美能力的提高与发展(美育);有利于形成良好的劳动习惯,增强生活与社会适应能力(劳动教育)。在全面发展教育中,心理健康教育具有乘数效应,它起着“酵母”式的促发和放大作用,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劳动教育一起,共同构成了一个既相互制约、相互渗透,又辩证统一的全面发展教育体系。其中,心理健康教育为学生形成良好的思想品德、发展智力、增强体质、塑造美感和提高劳动素养提供了良好的心理基础和前提条件。如果说“德智体美劳”是人类社会教育的趋向目标,那么,心理健康教育就是其具体内容和现实路径之一;如果说所有的教育归根到底都是身心健康教育,那么,心理健康教育就好比是人的一只手,“德智体美劳”是其点石成金的五根手指,而心理健康教育则是手掌,连接着五育中的每一个要素。尽管德智体美劳“五育”都有各自的教育目的、任务、内容、规律和方法,也都处于各尽其能、各司其职的状态,但心理健康教育在“五育”的统领下深度融合,与“五育”重拳齐发,这是新时代铸造大格局教育的一个重要举措,切实体现了学生由教育客体向教育主体的真正回归,以及人的全面发展对人本质的真正占有。

3. 创新发展

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创新发展,包括两层涵义:一是其本身的“创新发展”,二是其教育对象的“创新发展”。对于前者,要从心理健康概念的理解入手。心理健康,实际上是指个体各种心理机能的协调和完善,以及以最佳

组合发挥作用；而创造力或创新素质作为人类心理机能的最高表现形式，其发展水平是心理健康的重要标志；创造力培养是心理健康教育新的制高点。换言之，心理健康是个体创造力、创新素质发展和发挥的基础。要以心理健康教育为突破口，全面培养和提高大学生的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创新思维与创新人格、创新能力与实践能力。此外，还必须正确认识创造力和心理健康之间的关系。目前已有更多的证据表明，从事创造性学习和创造性活动，要以个人的心理正常或心理健康作为基本条件。心理健康是创造力成长的“土壤”，积极的心理健康品质可以为创造力的有效发挥提供前提与保障，而富有创造力的活动也会促进心理健康的发展。^[11]即心理健康与创造力两者的关系如车之两轮，两者互为因果、相辅相成。这充分表明了在我国社会心理服务框架下全面推进心理健康教育、实施心理健康服务的重要价值。加强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其根本目标就是促进大学生心理健康和个性全面发展，这是培养创造力、创新能力的前提条件，而把“创新人才培养”和“心理健康教育”有机地结合起来，在创新教育的理念指导下，积极有序地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培养心理健康、勇于创新的新一代大学生，则是新时代摆在教育工作者面前的重要任务与严峻挑战。

4. 特色发展

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特色发展，旨在对该项工作进行示范和引领，以有特色、高标准凸显标杆、样板和辐射效应。宏观层面的目标上，树立一批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先进典型，推动其他学校全面普及和深化心理健康教育；中观层面的目标上，明确学校在促进学生身心健康发展方面的义务和责任，科学规范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微观层面的目标上，保障本校心理健康教育以特色立足，上一个新台阶、获得新发展。根据中小学心理健康特色校建设的经验，其评估指标由组织领导、条件保障、教育教学、科学发展等构成。^[12]具体而言，“组织领导”作为一级指标，包括落实国家政策、纳入学校规划、健全工作机制、成立工作机构和完善规章制度等五个二级指标；“条件保障”

作为一级指标，包括配齐配好教师、加强培养培训、保障教师待遇、加强阵地建设和加大经费投入等五个二级指标；“教育教学”作为一级指标，包括保证课堂教学、注重学科渗透、加强文化建设、做足心理咨询和密切社会合作等五个二级指标；“科学发展”作为一级指标，包括开展科学研究、提高教育实效和杜绝不良行为等三个二级指标。需要指出的是，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效果最终会体现在学生身上，要特别强调“以生为本”，重视心理健康水平的提高，大学生的健康成长与发展成效才是根本。

四、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服务体系建设

什么是心理健康服务？它是以心理健康的理论、原理和方法为主导，来维护与促进人们心理健康的活动。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是全民心理健康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拥有以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为核心的工作队伍，遵循心理健康的特点和规律，向师生员工提供各具特色、各有侧重的心理健康与心理保健服务和围绕该项工作的各种人财物的投入、教育培训、管理以及相应的制度建设等组成的服务系统。^[13]它包括制度建设、机构建设、师资队伍和课程体系建设等。

1. 制度建设

制度建设是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根本。根据其性质与功能，可以划分为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和具体制度。^[14]具体而言，心理健康教育的根本制度是党和国家的教育方针，把立德树人、提高学生心理素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作为其根本任务；基本制度是指国家和政府颁布的相关心理健康教育政策、文件和规定，也可称之为心理健康教育的法规性制度；具体制度侧重于操作层面，包括心理咨询制度、朋辈心理辅导制度、心理健康课程教学制度、心理危机预防及干预制度、心理障碍和心理疾病筛查及转介制度、心理成长信息资料管理制度、心理咨询的伦理制度、心理咨询教师的资格准入制度、心理咨询队伍的培养及督导制度

等,即心理健康教育的岗位性制度。

2. 机构建设

机构建设是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服务体系建设的核心。学校应建立在主管书记或校长领导下,以学生管理干部和专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为核心,以辅导员、班主任和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为骨干,全体教职员工共同参与的全员、全程、全方位心理健康工作机制;辅导员、班主任、党团干部、科任教师、专兼职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分层负责、各司其职又协调配合的教育实践机制。就操作层面而言,成立以分管校领导为组长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领导小组,每学期至少开一次领导小组工作专会,对本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进行全面规划与指导;校长办公会或学校行政会议每学年要开展专题研究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组织规划、分期活动、定期检查、督促指导,并有明确的心理健康教育工作责任部门(学生处、学工部或心理健康教育指导中心等),专人专门负责心理健康教育的具体组织与实施,做到人员落实,岗位职责明确。

3. 师资队伍建设

高素质、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建设,是提升心理健康教育质量的关键,也是心理健康教育可持续发展的基础。目前,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师资队伍质量还有待提高,主要表现为低职称化、低专业化、低专职化等突出问题。有鉴于此,建立一支1:3000的专职心理健康教育师资队伍,以兼职教师为主逐步转变为以专职教师为主、专兼职相结合的模式;加强心理健康教育教师每年不少于40个学时的专业培训,使他们掌握心理健康教育的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并逐步形成持证上岗制度;同时,明确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的工作范围,规范其工作流程;还要明确专职心理教师的工作量,完善对心理健康教育专职教师的人事管理、考核办法、薪酬管理办法及晋升路径等。实现师资配置与发展一体化,职前、入职与职后培养一体化;强调以实证为基础的干预行为,重视教育效果的评估与反馈;建立跨地区、跨学校的数字化资源共享平台、专业能力训练平台以及教师发展联盟,打造区域间、校际心理健康

教育师资的协同创新发展模式,探索构建“WTPTP”(网络教学—教师指导—教授、行业专家引领—团队共进—入职与发展档案)等师资培养途径,不断提高其终身学习与发展能力。

4. 课程体系建设

高等学校心理健康课程体系是心理育人的重要载体。心理健康课程的宗旨就是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目标和全过程育人的基本要求,其主要任务是实现课程标准规范化,包括课程性质、课程理念与设计思路、课程目标、课程内容、学业质量和课程实施等,这是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实现心理健康课程内涵式发展的重要基础。教材是课程的核心载体,规范教材使用对课程教学的有效开展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是实现课程目标、完成课程任务、实施课堂教学的重要资源;教学内容作为课程建设的微观层面,对于扭转当前教学内容重复、错位、脱节等不良倾向,做好课堂教学内容规范化工作至关重要。此外,在教学实践中,要把握好心理健康课程建设的根本方向,明确心理健康课程发展的新趋势;推进心理健康课程的纵向衔接,注重优化心理健康课程管理体系,系统推动课程制度化建设;同时,还要重视心理健康课程评价改革,创建多元一体的综合课程评价体系,特别是统筹谋划心理健康课程教材体系,合理整合、利用其他学科资源,将心理健康课程与其他相关学科有机融合,创造性地开设相关综合课程、融合课程、精品课程等,充分发挥学科的心理健康教育功能,全面提升新时代心理健康教育质量。

五、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实践体系建设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大学生面对新时代即社会转型期滋生的诸多矛盾、冲突,他们在学习生活、成长成才和自我意识、情绪调控、人际关系、社会适应等方面容易出现各种各样的心理行为问题,急需疏导和调节。因此,加强理论应用、创新实践载体、采取务实措施、提高工作实效、高效推进高等学校心

理健康教育实践,需从个别咨询、团体咨询、危机干预和医教协同等实践途径入手,真正把该项工作落到实处、抓到痛处、收到实效。

1. 个别咨询

面对大学生越来越多的焦虑、抑郁、攻击、网络成瘾乃至自残、自杀等严重心理健康问题,个别咨询显得尤为重要。这是咨询者与来访者之间一对一进行的咨询活动,是心理咨询最常见的形式,包括门诊咨询、网络咨询、电话咨询等。其优势是咨询对象顾虑较少,可以毫无保留地倾吐内心的秘密,并能够在较深的心理、精神层面上提供个性化的服务。首先,良好咨询关系的建立是每一位咨询师要面对的问题。与到咨询室寻求帮助的学生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要求咨询师具备一定的个人素质,掌握一些特殊的谈话技巧和咨询技术。这是来访者积极改变现状、发挥潜力的动力,它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治疗作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没有任何一种咨询技术可以包治百病,每种咨询技术都有其使用范围与领域,咨询师要学会灵活运用不同技术、方法,以解决学生面临的心理行为问题为目标,“对症下药”才能“药到病除”。

2. 团体咨询

大学生常见的心理健康问题涉及学习成才、人际交往、恋爱婚姻、自我认知与人格发展、情绪调适与压力管理、社会与生活适应以及就业创业与生涯规划等方面,此时团体咨询能发挥“画龙点睛”的作用。它是一种在特定情境下(如课堂、课程)为团体成员提供共同心理援助与指导的一种咨询形式,即由咨询员或心理教师根据来访者问题的相似性,组成辅导小组,通过活动、讨论、训练、引导等专业技术,解决成员共有的心理问题或促进成员的共同发展。将团体咨询活动应用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可以很好地营造和谐的心理氛围,提供认识自我、发展自我的心理环境,可被广泛用于情绪管理、人际交往、职业规划、潜能开发等心理健康教育主题。毫无疑问,团体心理咨询为团体成员提供了一个有着信任、温暖、相互支持、相互帮助的良好气氛的场所,使成员可以以他人为镜,建立积极的自我认同,发展自我效能

感,同时也成为他人的社会支持力量。通常情况下,把团体心理咨询划分为团体创始阶段、团体转换阶段、团体工作阶段和团体结束阶段四个阶段。在整个团体咨询或课堂教学过程中,每个阶段是连续的,相互影响的。对大学生来说,因为他们有着团体生活的社会兴趣,面临着共同的成长课题及类似的心理困扰,所以在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使用团体心理咨询的技术,可以收到事半功倍的教育效果。

3. 危机干预

敬畏生命,必须积极预防和干预心理疾病、心理障碍引发的危机事件,如自杀、暴力冲突、精神分裂和意外事故等。危机干预就是提供即时的帮助,以使危机中的人恢复心身平衡。危机事件的发生有一个过程,如果能在危机发生之前加以识别,并进行有效干预的话,就可能杜绝危机事件的出现。因此,建立“学校主导、部门合作、社会参与”的危机干预工作机制和三级预防(初级预防、二级预防和三级预防)的实践机制尤为重要,力求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而对个人而言,开展针对性的心理干预措施,能够提升其对危机事件的预防和应对能力,规避风险、获得成长。一是提升情绪调节能力。通过对情绪调节策略设计适当性的干预、引导方案,建立和增强认知重评能力,进而提升应对危机的信心和技能。二是增强心理复原力。通过教育和引导培养洞察力及自我反思力,提升其评估情境的能力;通过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支持及训练,培养其坚韧的意志品质,提高其解决问题的技能。三是提高压力应对能力。通过学习有效应对策略的训练计划,来加强其压力应对技巧、提升压力应对能力,有助于预防大学生在风险中的心理危机发生。四是加强社会支持力度。在危机情境中,可通过政府、媒体、社区、学校、家庭等多个渠道为其提供社会支持,来提升其应对危机的力量和资源。对学校而言,建立一个纵向危机应对联动机制,确保在第一时间及时响应,提供支援和帮助,这是危机发生后有效应对的保障。

4. 医教协同

在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工作中,要重点

关注高风险学生的筛查与干预、心理障碍学生转介等工作，强化学校与医院合作，建立综合医院心理科或精神科、精神专科医院与学校危机干预合作协议；有条件的学校，要在校医院配备心理科或精神科医生，及时解决学生的就诊需求。通过医教结合、医教协同等方式，建立心理危机转介诊疗机制，畅通从学校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机构到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的心理危机转介绿色通道，及时转介疑似患有严重心理或精神疾病的学生到专业机构接受诊断和治疗。学校心理咨询机构要科学地把握工作的任务和内容，严格区分心理咨询中心与专业精神卫生机构所承担工作的性质、任务和目标。在心理咨询中，不断提升学生心理危机识别精准度、干预有效性、转介顺畅度。

六、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的生态体系建设

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一再强调，“良好的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健康的基础”^[15]。而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就是一项复杂的生态工程、系统工程，需要学校、家庭、社会诸方面共同配合、通力合作。根据布朗芬布伦纳的生态系统理论，环境是一组“嵌套结构”，从微观环境（如家庭）到宏观环境（如文化系统），无一不对个体发展产生重要影响。^[16]因此，要实现高等学校心理健康教育效果的最大化、最优化，就必须建立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协同联动机制，营造良好的学校、家庭和生态系统的生态环境，即生态课堂、生态校园、家校协同和社教一体。

1. 生态课堂

生态课堂以课程效率、教育效果为出发点和立足点，包括专门的心理健康教育课程和其他学科课程渗透。前者是集知识传授、心理活动体验与行为训练为一体的德育课程。学校应积极挖掘潜力、创造条件，开设以活动、体验为主的心理健康教育专门课程，可以采取多种教学形式，包括知识传授、专题讲座、同辈辅

导、团体辅导、心理训练、问题辨析、情境设计、角色扮演、心理情景剧等。教育部已明确规定：大学阶段要对新生开设2学分的心理健康教育公共必修课，倡导面向全体大学生开设心理健康教育类选修课程。^[17]不同专业的其他教职员工，特别是各学科专任教师要牢固树立心理健康教育意识和“健康第一”观念，将适合不同专业特点的心理健康教育内容，有机渗透到日常教育教学活动中。班主任、辅导员、党团工作者和学生管理工作要将心理健康教育与德育工作、班级工作、党团活动、校园文化活动等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利用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多种路径、多种途径开展心理健康教育。

2. 生态校园

生态校园的本质特征是富有生命活力，根本途径是校园文化建设。通过正向价值引导，以文化人、以文育人，即将心理健康教育贯穿于学校教育的全过程，贯穿于校园的各个个人群、各个角落。电子屏幕、广播电视、校园网、校刊校报、橱窗板报等宣传媒体，多渠道、多形式地正面宣传、普及心理健康和心理疾病知识。重视心理健康教育网络新媒体平台建设，开办主题网站、专题网站（网页），充分开发利用网上教育资源进行心理健康教育。以校园文化建设为抓手，营造积极、健康、高雅的校园环境氛围，陶冶学生高尚的情操；通过微电影、网络社区、朋辈互助、心理情景剧等形式，增强学生之间、同伴之间相互关怀与支持的意识。大力开展有益于提高学生心理健康的社会实践活动、研学游学活动、第二课堂活动、志愿者活动、音乐艺术鉴赏活动，提高学生的自觉参与、主动参与意识，强化学生学习心理健康知识的兴趣和动力，及时解决他们在学习、成长、生活和社会适应中产生的各种心理困扰和行为问题，达到自助与助人的目的。

3. 家校协同

学校教育离不开家庭的支持和铺垫，家庭教育离不开学校的引导和深化。家校协同就是在家庭与学校之间架起的一座桥梁，使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有机结合起来，优势互补，相互

促进。一方面, 家庭要积极配合、支持学校教育, 积极关注孩子健康成长的家庭环境, 引导创建夫妻关系和睦、亲子关系和谐的良好家庭氛围; 同时父母应该成为终身学习者, 随着孩子的成长不断地学习如何做个好父母, 建立温暖有爱的家庭氛围和支持环境, 引导孩子解决学习、生活中的困难和问题。另一方面, 学校要将关口前移, 对成长环境不佳或已出现心理问题行为的孩子, 要自觉提供指导帮助; 同时加强与家庭合作、互动, 帮助家长树立正确的教育观念, 加强亲子沟通, 提高家长对孩子心理健康问题的重视程度, 并掌握预防、识别、干预心理行为问题的基本方法和手段; 建立学校、家庭的联动机制, 成立家长学校, 加强对家长的心理辅导, 为家长提供促进学生心理发展的指导意见, 协助他们共同解决学生在发展过程中的问题, 形成心理健康教育合力, 共同促进学生的健康成长。

4. 社教一体

学校“小教育”, 社会大课堂。大学生作为一个社会人, 其生活空间不仅仅局限于学校, 更应走出校门, 跨入社会, 在社会实践活动中健全心智、完善人格。研究者一致认为, 快速变化的社会环境是影响大学生心理健康的重大风险性因素。因此, 高等学校应主动、积极有效地利用一切相关的社会教育资源开展心理健康教育。加强与政府机关、卫生机构、医疗机构、街道社区、科研院所、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公共教育机构以及青少年校外活动场所等的联系和合作, 组织开展各种有益于大学生身心健康的文体娱乐活动和心理素质拓展活动, 拓宽心理健康教育的范围、路径和方式方法。促成“学校教育”向“社会教育”的延伸, “小教育”与大课堂优势互补, 有效融合, 共同发力。社会也要支持高等学校开设心理健康教育方面的专业, 培养更多相关专业人才, 同时鼓励相关专业毕业生从事心理辅导、心理咨询行业, 组建全民心理健康教育联盟, 提高心理治疗效果, 并考虑逐步将心理咨询、心理治疗等纳入医保报销范围。国家和政府则需从政策上体现对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视, 各级行政管理

部门也要加强对心理健康教育的组织协调和领导, 教育工作者、卫生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更应牢固树立心理健康教育意识, 为大学生成长成才和幸福人生固本强基。

参考文献:

- [1] 俞国良, 李森, 我国“立德树人”教育政策历史进程的文本分析与启示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 (6): 217-222.
- [2] 陈章龙, 周莉. 价值观研究 [M]. 南京: 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227.
- [3] 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 开创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发展新局面 [N]. 人民日报, 2016-12-09 (1).
- [4] [17] 教育部网站.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印发《高等学校学生心理健康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 [EB/OL]. (2018-07-13) [2021-06-08].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2/moe_1407/s3020/201807/t20180713_342992.html.
- [5]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1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56.
- [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467.
- [7] [15] 新华网. 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战略地位 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EB/OL]. (2016-08-20) [2021-06-08].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8/20/c_1119425802.htm.
- [8] 中国政府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 [EB/OL]. (2021-03-12) [2021-06-08]. 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
- [9] 俞国良. 社会转型: 国民幸福感的震荡与变迁 [J]. 黑龙江社会科学, 2006 (2): 80-89.
- [10] 俞国良, 陈雨濛. 德育论对心理健康

问题的研究 [J]. 黑龙江高教研究, 2021 (4): 132-136.

[11] 俞国良, 张伟达. 创造力与心理健康: 关系的视角 [J]. 中国教育学刊, 2019 (8): 13-18.

[12] 教育部网站. 关于实施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特色学校争创计划的通知 [EB/OL]. (2014-03-18) [2021-06-08].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6/s3325/201403/t20140318_166186.html.

[13] 俞国良, 侯瑞鹤. 论学校心理健康服务及其体系建设 [J]. 教育研究, 2015 (8): 125-132.

[14] 俞国良, 赵军燕. 论学校心理辅导制度建设 [J]. 教育研究, 2013 (8): 90-96.

[16] 费尔德曼. 发展心理学: 人的毕生发展 [M]. 苏彦捷, 邹丹, 等译. 北京: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 2007: 9-11.

(责任编辑 刘 红)

The System Concept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 Probe into System Establishment

Yu Guoliang

Abstract: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and deepen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in the new era, we must set up the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system concept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the value system, the theory system, the development system, the service system, the practice system and the ecological system. Specifically, the value system is a set of value concepts, value orientation, value judgment and value goals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which contains rich connotations and value elements such as “cultivating people by virtue, taking life as the foundation, life as the supreme, and responsibility as the priority”. The theoretical system is a supporting system under the guidance of Xi Jinping’s theoretical thought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theoretical concepts of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ealth first, healthy China and happy China. The development system is a systematic and gradual process that gives consideration to both vertical and horizontal development. It effectively realizes the organic integration of moral education, all-round development, innovativ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 development. The service system is to follow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of mental health, to provide students and staff with different levels of mental health and mental health care services, including system construction, institution construction, teaching staff and curriculum system construction and so on. The practice system starts with different ways, such as individual consultation, group consultation, crisis intervention, and medical and educational collaboration, to put into practice, grasp the pain and get results. The emphasis of the ecological system is to establish the cooperative linkage mechanism of school, family and society, and to create a goo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of school, family and society, that is, the integration of ecological classroom, ecological campus, family-school cooperation and society-education integration, so as to maximize and optimize of the effect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Key words: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System concept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system construction

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以来 对劳动教育的探索

刘向兵 张清宇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 北京 100048)

摘要: 建党百年以来,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并迎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这伟大的奋斗历程中, 劳动教育始终与党的各项事业紧密相连, 党对劳动教育的探索也经历了从劳动觉醒到劳动报国, 从劳动报国到劳动富国, 再从劳动富国到劳动圆梦的重要阶段, 充分展现了劳动教育所具有的政治功能、经济功能和育人功能。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 需要全面把握劳动教育的政治性、时代性、融合性、协同性和规范性, 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劳动教育体系。

关键词: 中国共产党; 劳动; 劳动教育

中图分类号: G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7-0028-10

人民创造历史, 劳动开创未来。^[1] 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之日起, 就与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党的伟大事业也依靠广大人民群众辛勤劳动来实现。回顾党的百年历史, 中国共产党走过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 并迎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在这漫长的奋斗历程中, 劳动始终内在地存在于党的各项事业之中, 党对劳动教育的探索也经历了从劳动觉醒到劳动报国, 再到劳动富国、劳动圆梦几个重要阶段。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对劳动教育百年探索的历史脉络, 有助于明确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发展方向, 从而更好地汇聚

起全社会力量, 携手共建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质量劳动教育体系。

一、劳动觉醒: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对劳动教育的探索 (1921—1949年)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围绕民族独立、人民解放这一主题, 中国共产党将劳动教育作为革命斗争的重要手段, 以启发民众思想觉悟、唤醒革命意识; 通过劳动教育来发展生产, 以支援革命; 令普通劳动者都能享有教育, 以壮大革命力量。可见, 自建党之初起, 劳动教育就与党的事业有着天然的联系。

收稿日期: 2021-06-20

基金项目: 2020年北京市高等教育本科教学改革创新项目“高校劳动教育实践体系建构研究”(202012453003)

作者简介: 刘向兵, 男, 研究员,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党委书记, 主要从事劳动教育、思想政治教育、大学战略管理研究; 张清宇, 女, 讲师, 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劳动教育学院, 主要从事劳动教育、高等教育管理、教育政策与行政研究。

1. 将劳动教育作为革命斗争的重要手段，以唤醒革命意识

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党成立之后就将教育作为革命斗争的重要手段和武器，并尤为强调教育与劳动的结合，以唤醒民众意识，积极投身革命。李大钊在《庶民的胜利》中指出，今后的世界必将“变成劳工的世界”^[6]，并由此提出自己的教育主张——真正的工农劳苦大众的教育，力求为广大劳工争取受教育的权利。他指出，应根据工人生产和生活的现状，去争取劳工的受教育机会；同时，他还敏锐地认识到农民教育的重要性，号召有志青年到农村去，“利用乡间学校，开办农民补习班”^[7]，以提高农民文化和生产知识，启发农民阶级觉悟。

1921年，党的一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明确指出党应向工人灌输阶级斗争的精神，在一切产业部门成立工人学校，以提高工人觉悟。^[8]此后，党在各地纷纷创办了劳动补习学校、子弟学校、工人俱乐部、图书馆等工人教育机构，向工人宣传革命思想、阐释劳动价值、进行革命教育，培养了一大批工人骨干，壮大了革命力量。此外，党还深入农村，通过建立农会、创办农校等多种形式开展农民教育。在干部培养方面，党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同时，注重开展劳动教育，重视社会实践和实地调研，力图使理论和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以使学生对革命有更加深刻的认识，从而更好地激发他们投身农民运动的决心。

2. 通过劳动教育来发展生产，以支援革命

苏维埃时期，为了发展生产以保护和巩固革命政权，党的教育方针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1932年5月，江西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代表大会上通过的《财政与经济问题的决议案》中指出，要向广大工农群众宣传革命战争的意义，使他们通过提高政治认识而努力发展生产。^[9]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支援前线、打倒日本侵略者，中共中央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方针政策，其中就包括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实行生产劳动”。这一方面是坚持抗战的需要，为获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提供充分的精神和物质保障，

另一方面也是对青年进行教育的需要，帮助他们了解农村实际生活，增强抗战的信念和使命感。1939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各界青年纪念五四运动20周年大会上指出，“延安的青年运动的方向是正确的”^[6]，不仅因为延安的青年们是统一的、团结的，更是因为“他们在实行生产劳动，开发了千亩万亩的荒地”^[7]。一时间，来自全国各地的进步青年纷纷响应“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号召，与根据地军民一道开展生产自救，积极投身边区大生产运动，支援物质条件极端困难的根据地建设和前线战斗，并从中得到了锻炼，磨练了革命意志，为夺取革命胜利奠定了重要基础。

3. 令普通劳动者都能享有教育，以壮大革命力量

为打破以往社会有贵贱上下、劳心与劳力、治人与被治种种差别的阶级教育，^[8]1921年8月，中国共产党创办了湖南自修大学，旨在力除学术为少数“学阀”垄断的旧弊，实现平民读大学的理想，为革新社会做准备。1922年5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教育运动的议决案》，提出在教育运动上要努力为一般无产者的子女争取普遍的义务教育^[9]，以“普遍的启发一般青年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斗争能力”^[10]，使之成为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发展，早期平民教育运动逐渐发展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的工农教育。党的工农教育围绕提高工农政治觉悟和知识水平的目标展开，教育内容丰富，教育形式因地制宜、灵活多样，成为壮大革命队伍的有效途径。从1921年秋到1925年，邓中夏、毛泽东、李立三、刘少奇等一批共产党员深入工矿企业创办工人学校，开展工人教育，极大地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斗争能力，发展了工运事业，壮大了革命队伍。与此同时，党还深入农村地区，开办农民学校，向农民宣传革命道理、教授文化和生产生活知识，使农民成为一支有力的革命队伍，这也为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劳动报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党对劳动教育的探索（1949—1978年）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异常艰难和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为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奠定了坚实基础。这一时期的劳动教育主要为激发全体民众建设新中国的劳动热情，以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建设，基本生产技术教育成为劳动教育的重要内容，并明确提出了“培养劳动者”的教育目的。

1. 劳动教育服务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生产建设

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的施政纲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中明确提出，要“注重技术教育，加强劳动者的业余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给青年知识分子和旧知识分子以革命的政治教育，以应革命工作和国家建设工作的广泛需要”^[1]。针对当时我国的基本国情，钱俊瑞在《当前教育建设的方针》中明确指出，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中心方针是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2]一方面要求教育向广大工农群众打开大门，另一方面强调教育要服务于国民经济恢复和各项生产建设。一时间，全国范围内兴起了学校办工厂、工厂办学校、勤工俭学、半工半读等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热潮。

这一时期，教育除了注重传授建设新中国所需的科学文化知识外，也强调要沿袭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阶级斗争服务的革命经验，劳动教育表现出较强的政治性。1958年，国家针对当时存在的忽视政治、忽视党的领导的错误偏向，以及由此导致的教育与实际相脱节、与生产劳动相脱节的现象，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指出“党的教育工作方针，是教育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为实现这个方针，教育工作必须由党来领导”^[3]，明确了党的教育方针及其政治属性，成为当时开展教育工作的重要指南。

2. 基本生产技术教育成为劳动教育的重要内容

新中国成立之初，主要学习苏联的教育理论，开展综合技术教育，后改称为基本生产技术教育。综合技术教育的内涵，是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和生产部门变迁，以及当时社会经济条件的实际情况而不断变化的。^[4]这一时期，我国效仿苏联，关注学生劳动能力和劳动技巧的培养，并开始通过课程来规范劳动教育的内容。^[5]综合这一时期出台的各项教育文件可知，劳动教育的内容主要包括手工制作、生产实习、生产知识等，其中，生产知识主要以工农业科学技术知识为主。

1955年5月，全国文化教育工作会议正式决定在全国中小学有步骤地实施基本生产技术教育；9月，教育部颁发《关于小学课外活动的规定的通知》，基本生产技术教育开始成为劳动教育的重要内容；10月，中央教育部制定师范院校《教育学试行教学大纲》，根据当时社会情况，把综合技术教育改称为基本生产技术教育，并指出其任务一是传授学生现代生产科学技术知识，二是培养学生使用简单劳动工具的技能 and 技巧。^[6]在此后20余年的时间里，我国的教育理论和实践中一直沿用了“基本生产技术教育”这一概念。

3. 明确提出“培养劳动者”的教育目的

为更好地完成新中国成立后恢复国民经济、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等一系列重要任务，保持教育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协调一致，1957年，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7]，明确提出了我国的教育要培养“劳动者”。195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进一步指出，“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是全国统一的，违反这个统一性，就破坏社会主义教育的根本原则”^[8]，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对教育目的的第一次明确表述。“培养劳动者”这一规定，既体现了我国教育的社会主义属性，又指出了我国教育的人才

培养目标,即“国家的主人,社会主义的劳动者、建设人才”^[19]。这一规定也表明,劳动是社会主义国家公民的光荣职责,只有辛勤劳动,个人才能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参与者、推动者、见证者,才能在社会发展中实现个人理想。

三、劳动富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党对劳动教育的探索(1978—2012年)

改革开放以来,围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和“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时代主题,党中央一方面继续贯彻落实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方针,另一方面与社会各方面的飞速发展相适应,劳动教育的内容和方式也发生了深刻变化,在新中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征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1. 劳动教育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

早在1978年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就明确了新时期的教育任务,指出“我们的学校是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的地方”^[20],并强调“教育事业必须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21]。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了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奋斗目标,并提出“党和国家工作的重点必须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22],统一了社会各界的思想认识,使各项社会事业都围绕这一中心目标展开;在教育方面,强调要“努力提高教育科学文化在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肯定知识分子同工人、农民一样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依靠力量”^[23]。198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中开宗明义地提出“教育必须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社会主义建设必须依靠教育”^[24],从而完成了教育从“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到“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方针转变。

对于在新的条件下如何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更好地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邓小平提出五点主张:第一,为适应现代

经济和技术的迅速发展,教育与生产劳动结合的内容、方法上要不断有新的发展;第二,对学生参加劳动的具体安排要与未来所从事的职业相适应;第三,要根据当前及未来需求有计划地培养社会主义建设的专家和劳动后备军;第四,要合理设置各级各类学校的比例,扩大农业中学、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第五,要增加新的行业,服务于四个现代化,教育规划要与国家的劳动计划结合起来。^[25]1982年,教育部颁发《关于普通中学开设劳动技术教育课的试行意见》,正式提出“劳动技术教育”这一概念,指出开设劳动技术教育课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26]自20世纪90年代起,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进入了新阶段,要求教育工作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强调“各级各类学校都要把劳动教育列入教学计划,逐步做到制度化、系列化”^[27],劳动教育开始走上制度化的轨道。

2. 劳动教育的内容得到丰富和扩展

我国劳动教育的内容是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产业结构的变化,以及各个阶段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的实际情况而发展变化的。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各方面建设的不断推进,党对劳动教育的探索坚持与时俱进,不断拓展吸纳新的领域,以丰富劳动教育的内容体系。劳动教育除了教授工农业生产技术知识之外,还加入了第三产业知识技能、信息技术技能、职业技能等内容,并从劳动知识、劳动技能、劳动观点、劳动态度、劳动习惯、劳动情感等不同方面来开展,使劳动教育由简单的传授生产知识技能,发展到能够在知识、技能、情感、态度、价值观等方面全方位培养学生。

教育部颁布的《关于普通中学开设劳动技术教育课的试行意见》中规定,“中学劳动技术教育课的内容,包括工农业生产、服务性劳动及公益劳动等”^[28]。具体来说,一是要进行劳动观点的教育,使学生认识到劳动光荣,自觉养

成劳动习惯，形成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二是要进行劳动品质的教育，使学生增强集体观念，自觉遵守纪律，爱护公共财物，珍惜劳动成果，具有勤劳俭朴、艰苦奋斗的精神；三是要进行劳动纪律的教育，使学生严格遵守劳动规程，确保劳动安全。^[29] 2001年，教育部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规定“从小学至高中设置综合实践活动并作为必修课程”，内容包括“信息技术教育、研究性学习、社区服务与社会实践以及劳动与技术教育”，^[30] 将信息技术和职业技能融入劳动教育，加快了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从而更好地帮助学生通过劳动教育适应社会发展。

3. 劳动教育成为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

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教育事业取得了极大的成就，但应试教育的影响根深蒂固，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仍然存在，许多学校只重视智育，忽视其他方面的教育，难以应对世界范围内日趋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规定“中小学要由‘应试教育’转向全面提高国民素质的轨道”，“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31] 特别指出劳动技能是国民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1998年，《关于加强普通中学劳动技术教育管理的若干意见》中明确指出，劳动技术教育是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途径。^[32]

1999年，《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发布，为如何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指明了方向，并对如何使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以培养全面发展人才作出了具体说明，为通过劳动教育提高学生素质提供了可行方式。进入21世纪，为适应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创新型国家的需要，党和国家把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位置，推动我国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从人力资源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在此目标下，教育被赋予“开发人力资源”的新任务，“促进学生健康成长”成为学校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明确了“坚持以人为本，在教育工作中的重要着眼点是全面提高国民素质”^[33]，教育的

“人本性”得到重视和彰显。

四、劳动圆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对劳动教育的探索（2012年至今）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承并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提出了“以劳动托起中国梦”的历史使命。基于“实干兴邦”的治国理念，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围绕劳动、劳动者、劳动精神等内容进行深刻阐述，倡导要靠脚踏实地劳动开创美好未来，在全社会营造起一种崇尚劳动的文化氛围。劳动被赋予了全新的时代内涵，劳动教育也与德智体美并驾齐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

1. 劳动教育正式成为我国人才培养体系的组成部分

2018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大会上明确提出，“要努力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形成更高水平的人才培养体系”^[34]，凸显了劳动教育的独立性和重要性，使我国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更为完整。为贯彻落实这一目标，2020年，我国先后发布了《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和《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两个重要文件，开启了对具有中国特色的劳动教育模式的积极探索和全面部署，并对劳动教育的总体目标、主要内容、实施途径等作出了具体规定，为新时代如何加强劳动教育提供了可行方案。

我国教育方针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人的全面发展，是人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也是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和最终目的。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一直是我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的根本性原则，教育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基本手段，“德智体美劳”五育与个体发展的不同维度相对应，五育之间既有密切联系又有不同功能，而劳动教育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是推进我国教育现代化的必然路径。

2. 劳动教育与劳动文化双向促进

教育具有文化功能,通过教育活动,不仅可以保存、传递、选择文化,促进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还可以更新、创造文化,生长出与时代发展和社会变迁相适应的新文化,以促进人类自身和社会的不断发展。反之,优秀的文化也可以促进教育内容的丰富和扩展,从而提高教育质量,更好地促进个体和社会的发展。劳动教育的实施,一方面能够更好地促进个体在体力、智力、精神上的提升,另一方面也可以在全社会形成一种积极的劳动文化氛围,并最终促进个体劳动素养的提高。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围绕劳动发表重要论述,逐渐形成新时代的劳动文化体系,主要包括:第一,在劳动态度方面,要崇尚劳动、尊重劳动、热爱劳动;第二,在劳动品德方面,要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第三,在劳动目的方面,要培养爱劳动、会劳动、懂劳动的时代新人;第四,在劳动观念方面,要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最崇高、最伟大、最美丽的观念;第五,在对待劳动者方面,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第六,在劳动精神方面,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发挥劳模作用。^[35]通过实施劳动教育,可以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增强对劳动人民的感情,更好地理解劳动的意义和价值。在这个过程中,也会创造出关于劳动的新认识、新思想、新观点,从而持续丰富劳动文化的内容体系,使劳动教育理论不断焕发出新的生机,并引领劳动教育走向更宽的领域。

3. 关注创造性劳动能力培养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中明确指出,劳动教育要“培养科学精神,提高创造性劳动能力”^[36],反映了新时代对劳动教育提出的新要求。随着时代发展和国内外环境的深刻变化,推动社会进步已不能仅仅停留于简单的生产劳动,加快科技创新成为我国发展面临的迫切需求,这也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即“要把教育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注重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37]。这就要求新时代

的劳动教育应结合产业新业态、劳动新形态,通过日常生活劳动、生产劳动和服务性劳动等劳动教育内容,增强创新意识、培养创新思维,提高学生的创造性劳动能力,以培养能够适应未来社会发展变化的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高素质劳动者,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智造”“中国创造”转变,促进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五、中国共产党对劳动教育百年探索的经验启示

1. 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实现劳动教育的政治功能

建党百年以来,劳动教育一直与党的各项事业紧密相连,它从来就不只是教育系统内部的事情,而是一项涉及党和国家事业全局的战略性工作,具有重要的政治功能。中国共产党作为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石的政党,始终坚持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劳动教育从为革命斗争服务,到为新中国生产建设服务,再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一脉相承,与各个时期的国情和发展实际相适应,凸显了劳动教育于国之大计、党之大计的重要意义,是教育领域讲政治、顾大局的重要体现,也是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具体要求,更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应有之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各种重要讲话中表达了“实干兴邦”“崇尚劳动”的治国理念,发出用奋斗点燃新时代、以劳动托起中国梦的时代强音,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继承与发展,也凸显了教育服务于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政治作用,再次彰显了劳动教育对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大价值。

2. 在推动社会发展、实现富国强民中发挥劳动教育的经济功能

劳动创造价值,创造财富。建党百年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提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使我国从“一穷二白”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不仅体现了劳动对于社会进步、经

济发展、民族振兴的巨大贡献，而且展示了劳动教育通过人力资源开发来服务国家建设和发展，从而实现富国强民的经济功能。进入新时代，为破解我国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难题，急需切实提高广大劳动者的劳动素养和劳动能力，特别是创造性劳动能力，这对主动适应科技发展和产业变革新趋势，推动“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强国转变，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复兴路上可能遇到的各种挑战，都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长远的战略意义。

3. 在不断完善党的教育方针中彰显劳动教育的育人功能

党的教育方针从强调德智体全面发展，到德智体美全面发展，再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劳动教育具有了与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同等重要的地位，体现了劳动教育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制度中的独特价值。同时，从通过劳动教育唤起工农大众革命意识的觉醒，到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再到全面提高国民素质、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对受教育者的素质要求由政治素质拓展到文化素质，进而再提升到全面发展，体现出对受教育者素质要求的不断完善，劳动素养成为受教育者个人素质的重要方面，表明劳动教育对提高国民素质、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具有重要的育人功能。可以看出，党的教育方针不断修改和完善的过程，就是党对劳动教育认识不断加深的过程，也是劳动教育的育人功能不断彰显的过程。

六、中国共产党推进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未来展望

1. 确保劳动教育的政治性，坚持劳动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

推进新时代劳动教育，首先就要确保劳动教育的政治性，坚持党对劳动教育的全面领导，坚持劳动教育的社会主义性质，使劳动教育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党的治国理政目标。劳动教育

的实施成效决定着我国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人才培养质量和水平，决定着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劳动观念、劳动素养和劳动能力。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应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和劳动教育的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中央关于加强劳动教育的各项部署，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加强对劳动教育的组织领导，发挥统筹协调作用，制定和完善劳动教育的相关政策措施，推动建立全面实施劳动教育的长效机制。

2. 把握劳动教育的时代性，及时更新劳动教育要素

纵观党对劳动教育的百年探索历程可知，不同时期劳动教育的目的、形式、内容等方面都是与当时社会各方面发展状况相适应的，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新时代是创新发展的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代的劳动在辛勤劳动、诚实劳动的基础上更加强调创造性劳动。这就要求劳动教育应与时俱进，及时更新劳动教育内容、改进劳动教育方式、丰富劳动教育手段，精准灵活地运用各种现代科学技术手段来拓展劳动教育的范畴，提升劳动教育的效果，使学生树立起正确的劳动价值观，提高创造性劳动能力，形成全面系统的劳动素养，成为能够适应、支撑和引领未来社会发展的专业型、复合型、创新型人才。

3. 强调劳动教育的融合性，努力构建“大劳育”实施体系

劳动教育在“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中，既具有其他四育不可替代的独特育人价值，又具有树德、增智、强体、育美的综合育人价值。劳动教育要想真正落到实处，就需要融入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社会实践教育各环节，与“德智体美”四育相结合，建构起融合的“大劳育”实施体系。例如，大学生劳动教育中可通过“五个劳育”来实现这一理念：一是“思政劳育”，即劳动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相结合；二是“专业劳育”，即劳动教育与专业教育相结合；三是“实践劳育”，即劳动教育与第二课堂活动相结合；四是“课程劳

育”，即独立开设劳动教育课程；五是“学术劳育”，即加强关于劳动教育的科学研究与学科建设。“五个劳育”合力推进，从而建构起动态平衡、融合互动的“大劳育”实施体系。

4. 注重劳动教育的协同性，加大统筹力度形成共育合力

教育是一项复杂而系统的工程，需要多方共同参与。健全家庭学校社会协同育人机制，是我国教育发展的长期方略，也是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系统思维的重要体现。在此要求下，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指出家庭、学校、社会三方协同是实施劳动教育的重要途径；同年，教育部印发《大中小学劳动教育指导纲要（试行）》，进一步强调要建立劳动教育的协同实施机制，形成共育合力。可见，深入推进劳动教育，必然要求统筹家庭学校社会各方资源和力量，以家庭劳动教育为基础进行日常化教育，以学校劳动教育为主导进行规范化教育，以社会劳动教育为支持进行多样化教育，形成育人合力，切实推动劳动教育系统化、科学化、常态化开展，将劳动教育的育人任务落到实处，从而更好地实现劳动教育的育人目标。

5. 加强劳动教育的规范性，建立健全劳动教育评价机制

劳动教育历经百年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取得了显著的成果，但我们还需要清醒地认识到，劳动教育仍是“五育”中最为明显的短板，劳动教育整体处于“慢热”起步、分散探索的阶段，在实践中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劳动教育从顶层设计到督导评价的完整流程急需规范化。建立健全劳动教育评价机制是加强劳动教育规范性的重要手段，其中，对学生的评价可通过平时表现评价和学段综合评价来进行，对学校 and 地区的评价可通过建立劳动素养监测档案，以及考核在教师、课程、场地、经费等方面的投入和效果来进行，关键在于要构建起科学、合理的劳动教育评价指标体系。劳动教育评价指标体系是衡量劳动教育效果的重要标尺，是劳动教育开展的行动指南，缺少评价，

劳动教育就有可能流于形式、浮于表面，在正确评价指标体系的指引下，劳动教育的开展才能科学化、规范化、常态化。

党对劳动教育的百年探索历程充分说明，劳动教育不仅仅是一项促进人全面发展的教育活动，它还具有明确的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功能，以及促进国家生产建设的经济功能。加强新时代劳动教育，需要充分吸收建党百年以来推进劳动教育的历史经验，全面把握劳动教育的政治性、时代性、融合性、协同性和规范性，将劳动教育更好地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贯穿家庭、学校、社会各方面，与德智体美相融合，以在劳动中体知真善美为生命之根、以“五育”有机融合为生命之壤、以培养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为生命之干，逐步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和内在生命力的高质量劳动教育体系，^[38]从而推动我国劳动教育向更高层次、更高水平迈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同全国劳动模范代表座谈并发表重要讲话 [J]. 中国职工教育, 2013 (9): 4.
- [2] 李大钊. 庶民的胜利 [M] // 李大钊. 李大钊选集.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59.
- [3] 李大钊. 李大钊文集: 下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834.
- [4] 人民网.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EB/OL]. (2011-03-30) [2021-06-20]. <http://www.hntzb.org.cn/zl/sdxd/wjzl/28274.shtml>.
- [5] 中国共产党江西省委党史教研室. 中央革命根据地史料选编 [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2: 578.
- [6] [7] 毛泽东. 青年运动的方向 [M] //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 第2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561-569.
- [8] 孙培青. 中国教育史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399-400.
- [9] [10] 关于教育运动的议决案 [EB/OL]. (2006-12-11) [2021-06-20]. <http://www.gqt>.

org.cn/history/congress/documents/200612/t20061211_5518.htm.

[11]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 [J]. 江西政报, 1949 (3): 16-20.

[12] 何东昌. 中华人民共和国重要教育文献: 1949—1975 [M]. 海口: 海南出版社, 1998: 17.

[13] [18] 新华社.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 [J]. 安徽教育, 1958 (10): 8-9.

[14] [19] 王道俊, 王汉澜. 教育学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9: 464. 110.

[15] 曾天山, 顾建军. 劳动教育论 [M]. 北京: 教育科学出版社, 2020: 175.

[16]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师范学院、师范专科学校教育学试行教学大纲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1956: 18.

[17] 中共中央文献编辑委员会. 毛泽东著作选读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6: 781.

[20] [21] [25] 邓小平.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上的讲话 [EB/OL]. (2016-11-09) [2021-06-20]. http://www.jyb.cn/zyk/jyzcfg/200602/t20060227_55358.html.

[22] [23] 央视网.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 [EB/OL]. [2021-06-20]. <http://www.cctv.com/special/733/-1/47008.html>.

[24]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 [J]. 江苏教育, 1985 (22): 6-12.

[26] [28] [29] 教育部关于普通中学开设劳

动技术教育课的试行意见 [J]. 人民教育, 1983 (1): 27-28.

[27] [31] 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 [J]. 江苏教育, 1994 (Z1): 14-22.

[30]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印发《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的通知 [J].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 2002 (12): 28-31.

[32] 教育部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普通中学劳动技术教育管理的若干意见 [J]. 教育部政报, 1998 (Z2): 325-327.

[33] 胡锦涛. 在全国教育工作会上的讲话 [EB/OL]. (2010-09-08) [2021-06-20]. http://www.gov.cn/lhdh/2010-09/08/content_1698579.htm.

[34]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编写组. 习近平总书记教育重要论述讲义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59.

[35]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M]. 北京: 外文出版社, 2014: 44-48.

[36]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 [J]. 教育科学论坛, 2020 (15): 3-6.

[37] 习近平. 在科学家座谈会上的讲话 [EB/OL]. (2020-09-11) [2021-06-20]. https://www.ccps.gov.cn/xsxxk/zyls/202009/t20200911_143356.shtml.

[38] 李珂, 曲霞. 1949年以来劳动教育在党的教育方针中的历史演变与省思 [J]. 教育学报, 2018 (5): 63-72.

(责任编辑 刘红)

Explor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in the 10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iu Xiangbing Zhang Qingyu

Abstract: In the 100 years since its founding,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has gone through the period of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the period of socialist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the new period of reform, opening up and socialist modernization, and ushered in a new era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this great course of struggle, labor education has always been closely connected with the party's undertakings. The party's explor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has also experienced an important stage from labor awakening to serving the country, from serving the country to enriching the country, and then from enriching the country to fulfilling the dream, which fully shows the political, economic and educational functions of labor education. To strengthen labor education in the new era, we need to comprehensively grasp the political, contemporary, integrated, collaborative and normative nature of labor education, and gradually build a high-quality labor education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abor; Labor education

党的百年教育研究

(上接第 16 页)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and Reform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Based on Systematic Thinking --On the Systematic Thinking of Cultivating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Lu Xiaozhong

Abstract: High 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not only refers to the high quality of each subsystem and all aspects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but also emphasizes and highlights the high quality of the whole education system. A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must be an overall pattern in which Systematicity is highly valued, differences are duly respected and personality is greatly publicized. The systematic thinking of cultivating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is reflected in the consistency of Systematicity, integrity and synergy, the integration of teaching and scientific research, the unity of innovative thinking and social practice, the combination of science and humanities, and the simultaneous development of autonomy, choice and diversity. Educational evaluation is not only a guide and guarante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but also an indispensable key link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The leading role of educational evaluation is mainly realized through its own value, Systematicity and scientificity.

Key words: High 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Systematicity;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Education evaluation

劳动教育如何融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施永川

(温州大学, 浙江 温州 325035)

摘要: 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是高校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的发展趋势与必然要求。劳动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之间具有共生性, 在本质和教育目标上具有很强的内在一致性, 在形式和教育过程上具有明显的交互共通性, 并产生统一的教育结果。同时, 两者存在良性的互动关系, 劳动教育是创新创业教育的逻辑起点和本质, 创新创业教育是劳动教育的高阶形式。劳动教育融入创新创业教育更加符合新时代教育体系的特征和要求, 要以更新创新创业理念、激发创新创业热情、提升创新创业动力三个维度为目标, 通过改进劳动教育方式、完善实践育人机制、深化产教融合改革来推进劳动教育融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关键词: 劳动教育; 创新创业教育; 融合发展; 人才培养

中图分类号: G64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7-0038-08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新时代大中小学劳动教育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指出, 要把劳动教育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 构建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是推动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抓手, 对落实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教育方针、推动人才培养范式改革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劳动教育是创新创业教育的逻辑起点和本质, 创新创业教育是劳动教育的高阶形式。因此, 把握两者内在关联、探索劳动教育融入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路径, 是当前高校创新创业教育面临的重要任务之一。有些高校尝试并探索劳动教育模式, 在实践育人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积累了基础经验, 但也存在劳动教育价值的异化和弱化、劳动教育实施过程的形式化等问题。

现在部分大学生有不愿劳动、不会劳动、不爱劳动的心理和行为, 片面地将劳动简单理解为体力劳动, 直接忽略了创造性劳动和脑力劳动, 这与培养社会主义现代化创新型人才的教育目标不相符合。近年来, 我国高校创新创业教育不断推进, 但受到教育理念窄化、教学和课程体系不健全、学科交叉融合不足、师资队伍不健全、改革创新缓慢等因素的影响, 其教育价值得不到有效体现。如何从教育层面增强大学生的创新意识、提升创造性劳动能力, 已经成为关乎人才培养体系和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重大问题。本文在梳理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劳动教育发展现状的基础上, 厘清两者的关系和作用, 并从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角度出发, 探讨劳动教育融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发展的必要性及

收稿日期: 2021-06-07

基金项目: 2019年度浙江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大学生公益创业的支持体系构建研究”(2019C35013)

作者简介: 施永川, 男, 教授, 温州大学创新创业学院院长, 主要从事创新创业教育研究。

其可行路径。

一、劳动教育与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发展现状

进入 21 世纪以来,创新创业已经成为加速经济增长的驱动力、推动科技创新的加速仪和促进社会就业的扩容器。当前,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是推动高等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抓手,对落实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教育方针、促进高等教育健康发展、推进社会就业与经济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从创新创业教育理论体系的构建上来看,研究人员主要从创新创业教育与人才培养体系、专业教育融合,或是从微观的课程设置、师资建设、评价指标等角度开展研究并提出有效的发展建议。例如,李家华和卢晓东强调创新创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体系,要清除观念性障碍、制度性障碍和资源性障碍,重新审视创新创业教育的本质和价值;^[1]黄兆信等人提出我国高校的创业教育需要分层分类、区分地区差异和高校差异,建立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融合机制,构建适应大学生特点的创业教育体系;^[2]也有许多学者开展实证研究,调查分析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实施效果^[3]、在校大学生对创新创业教育政策满意度^[4]、以及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师资建设情况^[5]等。

劳动教育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制度的重要内容,是“五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劳动可以树德、增智、强体、育美,具有不可替代的独特功能和育人价值。2019 年 7 月颁布的《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将劳动教育纳入全面培养的教育体系,大大强化了劳动教育的地位。劳动教育不仅要适应时代发展的特点,及时更新形态,同时还要依据城乡劳动教育资源分布、不同年龄段学生特点,提高针对性和有效性。近年来,劳动教育逐渐成为一个重要的研究热点,研究主要集中在劳动价值观、劳动技能、劳动实施路径等若干主题。曲霞等人解析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新内涵时,指出要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劳动的重要论述的时代

意蕴,从形成正确劳动价值观和培育积极劳动态度等多个方面赋予大学生全面发展新动能。^[6]檀传宝认为劳动教育重在劳动价值观的培养,并指出当前学校劳动教育的问题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劳动教育的弱化,学校对劳动教育的态度不够积极,开展的劳动教育内容无足轻重;二是劳动教育的异化,劳动教育畸变为才艺展示,或为休闲方式,抑或是惩罚手段。^[7]张应强认为在当前应试教育体系框架下实施劳动教育面临两难选择,开展劳动评价,其结果作不作为升学评优的参考依据直接影响学生参与的积极性、学校和教师的态度和作为,一系列的结果都与劳动教育初衷的实践程度相关联。^[8]徐长发率先明确提出要确立劳动教育的独立学科地位和课程地位;^[9]张海生提出高校劳动教育的内容应多元化,应考虑高等教育本质特征,增加创造性劳动教育的内容(具有社会公益性质的志愿性活动)、具有专业性质的服务性劳动(如运用专业知识为普通群众提供专业咨询与服务等)。^[10]

当前,劳动教育研究在立德树人理念的指导下,逐步完善人才培养体系的科学化理论论述。但与其他研究领域相比,关于劳动教育与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融合的探讨较为匮乏,暂未形成完整性的理论支撑、系统化的科学指导。《意见》指出普通高等学校劳动教育的要求,要使形成马克思主义劳动观,提高创造性劳动能力;注重围绕创新创业,结合学科专业开展生产劳动和新型服务性劳动。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是高校创新创业型人才培养的发展趋势与必然要求,那么,两者融合的理论如何建构?两者有没有上位层次的教育、教育目标、教育工具的区分?到底如何融合才是科学的、合理的?对这些问题的深思和两者之间关系的剖析,对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的实施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二、劳动教育与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互动关系

中小学劳动教育主要表现为日常性劳动,

旨在教育学生形成健康的劳动意识和基本生活技能,养成良好的劳动习惯。不同于未成年人所接受的基础教育,大学生作为高等教育的受教育者不仅需要强调基础的劳动体验,更要通过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以积极的创新精神应对未来世界的挑战。习近平总书记经常提到“青年最富有朝气,最富有梦想,是未来的领导者和建设者”^[11],对青年一代赋予厚望。如果大学生在校时没有形成良好的劳动观念或者不具备应有的劳动技能,进入工作岗位后就有可能出现消极怠工的状态,甚至失去奋斗目标,无法实现个人的理想价值。而高校以育人为主业,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科学研究精神,注重学生实践能力的提升,为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两者的融合提供了最有利的环境。

劳动教育顺应新时代社会进步和劳动形态变化发展的趋势,能够使学生增强劳动意识,学会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并积累职业经验,提升就业创业能力。创新创业教育是一种培养兼具创新素质和创业素质的复合型人才的教育活动。周光礼认为,高等教育向创业转移是劳动教育的内在要求,应实现教育“向内”与“向外”统一,不仅要塑造学生的身体、精神和灵魂,也要培养学生的核心技能和劳动技能。^[12]虽然劳动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的核心目标与侧重点有所不同,表现出不同的形态,但两者作为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共同体现了立德树人的育人理念。要想深度挖掘两者融合的价值意义,需要明晰两者在教育目标、教育过程、教育结果等方面的内在关联。

1. 教育目标具有内在一致性

从高校劳动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的教育目标来看,都是为了更新和改革教育理念与教育模式,解决高等教育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不匹配等问题;都是为了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高素质人才,构建更加全面的人才培养体系,在本质上具有很强的内在一致性。

培育企业家精神是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核心目标之一,是企业良性发展不可缺少的企业伦理文化的基础支撑。^[13]当前,我国高校创新创业

教育普遍重视大学生创业知识、创业技能等显性指标的培养与传授,但创业伦理等隐性指标的内容却被忽略。无论是教育目标、教育内容还是教育载体,几乎没有涉及创业伦理教育的维度,对创业人才的伦理道德教育缺乏切实有效的抓手。^[14]绝大多数大学生把创新创业理解为培养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以实现个人价值,意识不到其包含着社会伦理和责任感的企业家精神才是学习和领悟的重中之重。这样的创新创业教育有可能培养出只为名利的生意人,却很难培养出真正具有儒商精神的企业家。

2020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再次表达了对劳动的高度尊崇、对劳动者的高度尊重。《意见》提出要“牢固树立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观念”,这既是劳动教育的目标,也是培育企业家精神的前提。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是以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为基础建立起来的,所体现出来的劳动价值体认、劳动情感熏陶、劳动品格塑造与企业家精神的勤劳、奉献、守法、担当的内核一致。^[15]当面临危机或陷入伦理困境时,真正具有企业家精神的创业者能够作出正确的价值判断和价值选择。大学生要树立正确的创业价值观,提升价值判断的能力,首先要做到崇尚劳动、尊重劳动,诚实守信、尊重他人劳动成果,努力成为乐于与合作者分享成果、共同追求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企业家。同时,企业家所需具备的创新精神更是新时代创造性劳动的一种典型表现。^[16]推动创新创业教育与劳动教育融合,要引导学生在创新创业中感受劳动之艰、体味劳动之美,弘扬劳动精神,造就艰苦奋斗、锲而不舍的进取精神和爱岗敬业、精益求精的职业操守,努力成为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的有为青年。

2. 教育过程具有交互共通性

从高校开展劳动教育和创新创业教育的过程来看,都是培养大学生核心素养和良好心理品质的体现,都坚持在实践中检验真知的方法论,这使两者在形式上具有明显的交互共通性。劳动教育既是目的也是手段,注重劳动过程中的教学性和教育性。^[17]劳动教育并不强调劳动一

定能够带来什么样的功利化目标，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在于学生通过劳动能够感受到个人价值的实现与提升。劳动过程实践性体现在专门课程和特定活动中，虽然十分强调体验和实践，但并不意味着这种实践性学习只是简单的形式化劳动体验，其思想定位必然要高于实践。创新创业教育强调理论和实践课程的系统性和适配性，着重培养学生的创新意识和辩证思维、创新能力以及实践能力。这与劳动教育的开展十分相近，两者皆强调在课程实践性的基础上注重意识和观念的形成。

劳动教育是高校实现德智体美劳“五育”并举，培养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高校开展劳动教育时还存在一些急需解决的问题。首先，劳动概念混淆，劳动教育定位不清晰。劳动教育的多样性特点及其与“五育”的关系决定了人才培养体系中的“劳”并不等于“综合实践活动”。劳动教育是上位概念、学科概念，“综合实践活动”则是教学方式概念、课程概念，两者在战略地位上有着较大差别。其次，劳动观念落后，劳动教育发展状况不均衡。某些高校师生的思想较为传统，片面地认为劳动教育仅仅是义务教育阶段的内容，与高校毫不相关；或认识不到劳动教育的价值，对“劳动教育是人生第一教育”“劳动教育是创造生活的幸福教育”的认识还不到位，甚至错误地认为劳动教育是惩罚学生的手段。这就导致劳动教育在教学实践中未得到高校的重视和落实，缺少其应有的实践地位。^[18]

党的教育方针明确强调了劳动教育是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内容和关键环节，明确了劳动教育的目标是培育学生的劳动观念、提高学生的劳动技能、提升学生的劳动素养，从而培养全面发展的人。^[19]因此，高校要转变观念，确立新时代劳动教育价值观，并创新劳动教育过程中的教学模式、课程设置、评价机制等要素，构建具有新时代内涵的劳动教育体系。

3. 教育结果具有高度统一性

高等教育已有近千年的发展历史，在历史长河中，无数学者因为人才培养问题，即高等

教育应该培养“思想家”还是“实干家”而争论不休。习近平总书记曾勉励青年要志存高远、脚踏实地。这与劳动教育强调“知行合一”、亲历劳动过程、体会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过程别无二致。同时，有许多人对创新创业教育的开展还存在误解。首先，创新创业教育的目的并不是鼓励每个学生都去自主创业，创业只是促进就业的一种方式。学生在大学里接受了创新创业教育，既更加清晰地认知未来职业生涯，又积累了一定的创业知识与技能，从根本上来看是有利于人才培养的。从创新创业教育的哲学基础来看，即倾向于实用主义，践行高等教育的“政治论”哲学；^[20]其次，创新创业教育不是纸上谈兵，更不是简单地搞形式化的活动和比赛，其本质上强调的是实干兴邦，只有让大学生真正做到脚踏实地地付出努力，才能促使其在实践中获得真实思考和创新想法。这与劳动教育的价值倾向殊途同归。

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需要有适应并改变社会的勇气和能力。我国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之后，必须根据未来世界的不确定性来“重新定义高等教育”。^[21]当面对突发事件，如重大疫情、自然灾害等，一些大学生及时调整生涯规划，主动到艰苦地区或特殊行业工作，体现了大学生身上特有的奋斗精神和奉献精神。高等教育向社会证明了其优异的人才培养能力和水平。新时代高校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将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让学生把家国情怀融入不懈的奋斗中，转化为每个人的行动，以更好地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培养新时代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

劳动教育和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在教育目标上的内在一致性、在实施教育过程中的交互共通性，最终呈现的教育结果具有高度统一性，说明两者具有深度契合的理论基础以及融合发展的可能性。要让新时代的大学生在创新创业教育中增强获得感和幸福感，树立正确的创业观，磨炼大学生艰苦创业、砥砺前行的意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因

此,要积极探索劳动教育融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路径,将劳动精神融入创新创业核心素养,塑造大学生创新创业心理品质;将劳动内容融入创新创业课程体系,引导大学生树立正确的择业观和创业观;将劳动活动融入创新创业实践,推动大学生在创业实践中检验真知。

三、劳动教育与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融合发展的内在逻辑

劳动教育和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具有很强的 consistency 目标、共通性教育过程,以及高度统一性的教育结果,决定了两者在实践过程中必将走向融合发展之路,这一融合也将进一步完善新时代培养全面发展人才的教育体系。在认同劳动教育和高校创新创业教育具有深度融合可能性的前提下,相关学者提出了两者融合的路径、对策与建议。例如,提倡以新兴科技为手段,创新传统劳动项目,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与创造能力;^[22] 搭建创新创业与劳动教育融合平台,推动多方协同合力;^[23] 将劳动教育融入大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青年红色筑梦之旅等实践活动,^[24] 为两者的融合发展提供了多种思路。但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前提是,需要厘清劳动与创新创业的关联性,进一步探讨劳动教育与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辩证关系,进而为两者的健康发展构建清晰的理论框架。

1. 劳动教育是创新创业教育的逻辑起点和本质

劳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存在方式。马克思主义理论深刻阐述了劳动的内涵,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新时代背景下,人们更加强调劳动是创新创造的基础,人在劳动中获得全面发展,从而促进整个社会的全面进步。创新创业教育的逻辑起点是“做中学”,这一教育理念对创业创新教育与教育实践相结合、与生产劳动相结合作出了根本要求。1989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次提出了“创业教育”的概念,指出“创业能力完全是从做中学来的,而不是依靠听讲,因此必须改变学习方式”。劳动教育的实施更加体现了“做中学”的基本原则,因

此可以这样理解,劳动教育是创新创业教育的逻辑起点,学生在劳动中产生创造、传承劳动精神和创新精神。

陈国维根据不同的标准将劳动划分为五类对应关系,分别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简单劳动和复杂劳动、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以及常规劳动和创新劳动。^[25] 按照《意见》的要求,劳动活动包括生产劳动、日常生活劳动和服务性劳动。王飞等人调查了六省共 12 693 名大学生的三类劳动活动开展情况,发现开展生产劳动的高校比例低、日常生活劳动范围较狭窄,以及服务性劳动严重缺位等问题。^[26] 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就是要达到人的智力、体力发展的统一。因此,如何既有劳动又有教育?如何正确开发劳动的教育价值?仍值得深入探索。

劳动教育是创新创业教育的基石,劳动本身的元教育特质承载了人的创造性活动的本质,劳动教育本质上也是创新创业教育。^[27] 新时期劳动教育的定位应该是更新学生的劳动价值观,培养相应的劳动和生活技能,从而提升劳动素养。^[28] 因此,通过劳动教育课程的实践,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相结合,需要将数字劳动融入传统的劳动项目,真正做到“以劳创新”。

2. 创新创业教育是劳动教育的高阶形式

创新始于劳动,创业忠于劳动。创新创业教育是劳动教育的高阶形式,体现为知识、能力、素质的有机融合,培养学生解决复杂问题的综合能力和高阶思维。人的创造性表现在满足自身的创新需要,创造一个全新的自我。《意见》明确指出,劳动教育要体现时代特征,“提高创造性劳动能力”,创造性劳动的结果是创新。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人的“第一个历史活动”亦即人生存和发展的“第一个前提”是“生产物质生活本身”,也就是劳动,而作为主体的人的“劳动是积极的、创造性的活动”。^[29] 正是通过创造性劳动,人开始和动物区别开来,从而创造自己的生活。创造性劳动就是创新劳动,即通过人的脑力劳动产生技术、知识、思维的革新,从而高效提升劳动效率、创造社会财富或成果的劳动。^[30] 创新创业教育旨在培养学

生的创新精神、创业能力和社会责任感，通过创造性劳动的开展与实施，鼓励学生为社会创造更大的经济与社会价值。

劳动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建设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教育实践中体现了德智体美劳全面培养的思想和定位。2010年，《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将创新创业教育定义为“适应经济社会和国家发展战略需要而产生的一种教学理念与模式”，明确了创新创业教育面向全体学生，结合专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的教育价值定位。开展劳动教育是推动大学生创新创业的重要途径，尤其是创造性劳动体现了劳动教育的创新性和高阶性，同时创新创业能够践行劳动育人的理念，达到促进社会发展的目的。

四、劳动教育融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路径

现代社会的竞争就是知识的竞争、人才的竞争，知识就是社会的中心，而高校作为知识的传授地，必然成为培养学生参与脑力劳动、创造性劳动的天然场所。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双向互动关系和共通内在逻辑，决定了劳动教育融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更加符合新时代教育体系的内涵和要求。因此，要以更新创新创业理念、激发创新创业热情、提升创新创业动力三个维度为目标，通过改进劳动教育方式、完善实践育人机制、深化产教融合改革来推进劳动教育融入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1. 改进劳动教育方式，更新创新创业理念

高校要不断改进劳动教育方式，体现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内涵与价值。首先，高等学校要积极组织学生参与新型服务性劳动。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将服务性劳动划分为生产性服务劳动、社会性服务劳动、科学综合服务性劳动和公共服务性劳动。^[31] 新型服务性劳动更加侧重科学综合服务性劳动和公共服务性劳动，鼓励学生参与文教、卫生、科学研究、技术研究的应用，以及引导学生主动关爱和照顾弱势群体的活动。公益劳动、志愿服务作为服务性劳动的

组成部分，对学生形成社会责任意识和奉献精神具有重要作用，因此要通过搭建劳动平台来支持学生参与社区治理，强化大学生群体的责任意识。其次，加大新时代劳动教育的智力劳动、脑力劳动的比重，着重培养学生的创造性劳动能力。当今社会的劳动形态正持续变革，以智力劳动为核心的劳动形态占劳动市场的比重越来越大。生产技术、知识、信息等资源复杂化，推动劳动形态呈现多样化的特点。^[32] 要积极引导大学生到基层创业就业，鼓励学生面向数字经济、生命健康、人工智能和新材料等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创新创业，在社会实践中受教育、长才干、作贡献。

鼓励和支持高校的专业教师参与劳动和管理实践，发挥校内外指导教师各自的优势，促进校企合作、产学研一体化发展。邀请各行业领域的科研人员、劳动模范、成功创业者、优秀企业家等各类新时代劳动精英走进校园，发挥行业精英的示范引领作用，帮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价值观，培养他们的创新精神与创业能力，发扬和传承企业家精神，夯实创新创业人才的思想根基和综合能力。

2. 完善实践育人机制，激发创新创业热情

激发大学生的创新创业教育热情，高校不仅要增强学生文明素养，更要培养社会责任意识，以实践促本领。首先，通过暑期社会实践、青年红色筑梦之旅、新青年下乡等活动，不断完善实践育人机制，引导大学生在仰望星空的同时更要脚踏实地，力争在实践中不断激发青年学生的创新创业热情，强化创业内驱力。其次，高校要为大学生提供创业支持和帮扶平台，帮助树立正确的学习目标和劳动价值观，引导他们将传统被动的就业导向转变为主动的创业导向，积极寻找组织机构中的“内部创业”机会，注重培养岗位意识与岗位综合能力，努力成为岗位创业者。

高校要开展“学业、就业、创业、事业”为主题的大讨论，培育新时代青年对国家和民族的理想与担当，开展有目的、有计划的创新创业培训，引导大学生到西部去、到基层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锻炼他们的实干精神、

坚毅品格,提升综合素质、执行能力,将劳动观和个人价值的实现结合起来,为将来开展创新创业实践打下坚实的基础。

3. 深化产教融合改革,提升创新创业动力

要深化产教融合理念与实践,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构建高等教育新发展格局。首先,高校要与行业骨干企业、高新企业、中小微企业紧密协同,与企业共建深度合作的实习实训基地,通过校企合作产教融合项目、企业导师进课堂等方式联合培养人才^[33],创建、联建或共享劳动实践基地^[34]。其次,建立完整的专业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机制,鼓励学生结合自身专业优势开展创新创业活动,不断提升创新创业动力,为社会创造更大的价值。

高校要依据党中央对劳动教育的新要求、新思路,将“三全育人”、“五育”并举落实到各教育环节,改进人才培养方式。通过大力发展新工科、新医科、新农科、新文科,推动全国高校掀起一场“质量革命”,推进以新技术改造、提升、交叉融合传统学科,培养超越现有专业局限与学科局限、专业素养高、综合实力强、有创造视野的高素质创新创业人才。结合专业人才培养目标,实施有针对性的教学策略,转变教学理念,更新教学方法,特别要重视新知识、新技术、新工艺、新方法的应用,提高大学生创造性地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提升教学质量。

参考文献:

- [1] 李家华,卢旭东.把创新创业教育融入高校人才培养体系[J].中国高等教育,2010(12):9-11.
- [2] 黄兆信,王志强.论高校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的融合[J].教育研究,2013(12):59-67.
- [3] 胡玲,杨博.高校创新创业教育效果的影响因素研究——基于2016—2018年我国150所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的数据[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20(12):64-75.

[4] 潘炳如.创新创业教育政策满意度分析[J].中国高等教育,2017(12):43-45.

[5] 马永斌,柏喆.大学创新创业教育的实践模式研究与探索[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5(6):99-103.

[6] 曲霞,刘向兵.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的内涵辨析与体系建构[J].中国高教研究,2019(2):73-77.

[7] 檀传宝.加强和改进劳动教育是当务之急——当前我国劳动教育存在的问题、原因及对策[J].人民教育,2018(20):30-31.

[8] 张应强.新时代学校劳动教育的定性和定位[J].重庆高教研究,2020(4):5-10.

[9] [18] [27] 徐长发.新时代劳动教育再发展的逻辑[J].教育研究,2018(11):12-17.

[10] 张海生.高校劳动教育的意涵、价值与实践——一种本体论、价值论和方法论的解析[J].大学教育科学,2021(1):53-59.

[11] 习近平致词祝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九届青年论坛开幕[N].人民日报,2015-10-27(1).

[12] [21] 周光礼.劳动教育 高水平人才培养体系的重要一环[N].光明日报,2020-07-28(14).

[13] 熊胜绪,黄昊宇.企业伦理文化与企业管理[J].经济管理,2007(4):4-12.

[14] [16] 施永川.创业伦理教育应成为高校创新创业教育的“第一课”[N].中国青年报,2021-01-26(11).

[15] 吕艳娇,姜君.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价值、困境与路径[J].当代教育论坛,2021(4):116-124.

[17] 刘燧,张辉蓉.建党百年来劳动教育的历史变迁与反思展望——基于教育方针分析的视角[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4):18-25.

[19] 胡君进,檀传宝.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观与劳动教育观——经典文献的研析[J].教育研究,2018(5):9-15.

[20] 布鲁贝克.高等教育哲学[M].王承绪,郑继伟,张维平,等译.杭州:浙江教育出

版社, 2001: 13-30.

[22] [28] 林克松, 熊晴. 走向跨界融合: 新时代劳动教育课程建设的价值、认识与实践 [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 2020 (2): 57-63.

[23] 许涛, 刘丽红. 新时代高校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融合机制探析 [J]. 创新与创业教育, 2020 (3): 27-32.

[24] 于兴业, 张迪, 李德丽. 劳动教育与创新创业教育的深度融合 [J]. 东北农业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2): 65-69, 85.

[25] 陈国维. 大学生劳动教育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0: 8.

[26] 王飞, 车丽娜, 孙宽宁. 我国高校劳动教育现状及反思 [J]. 中国大学教学, 2020 (9): 75-79, 85.

[2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

集: 第8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77.

[30] 艾君. 时代需要创新劳动 [J]. 工会博览, 2011 (5): 1.

[31] 章猷才. 论服务性劳动的性质与价值创造 [A]. 社会主义社会劳动和劳动价值理论探析. 陕西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2002: 9.

[32] 班建武. “新”劳动教育的内涵特征与实践路径 [J]. 教育研究, 2019 (1): 21-26.

[33] 刘耀东. 产教融合过程中企业逻辑和学校逻辑的冲突与调适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9 (10): 45-50, 95.

[34] 潘玉驹, 陈文远. 新时代大学生劳动教育改革的实现路径 [N]. 光明日报, 2019-06-06 (5).

(责任编辑 吴潇剑)

How to Integrate Labor Education into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i Yongchuan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the development trend and inevitable requirement of the cultivation of innovative and entrepreneurial talent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Firstly, there is symbiosis between labor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which has strong internal consistency in essence and educational objectives, obvious interaction and commonality in form and educational process, and produces unified educational results. Secondly, there is a benign interactiv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two. Labor education is the logical starting point and essence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a high-level form of labor education. The integr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into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s more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requirements of the education system in the new era. It is necessary to promote the integr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into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by improving labor education methods, improving practical education mechanism and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industry education integration.

Key words: Labor educatio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tegrated development; Innovation

创造性智慧赋能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内涵与维度

詹青龙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天津 300222)

摘要: 快速变革的智能技术为劳动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未来的劳动者将越来越多地从事创造性劳动, 因此, 劳动教育的深度发展迫切需要革新和转型。在智能时代, 创造性智慧是未来劳动者最理想的文化素养, 创造性智慧赋能的劳动教育则应培养具有创造性智慧的人才, 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通过界定创造性智慧的概念, 厘清我国劳动教育在每个历史阶段的制高点, 分析智能时代劳动的核心驱动力, 明确创造性智慧为劳动增智、为劳动教育赋能的时代选择和必要原因, 进而分别从五个方面和四个向度阐述创造性智慧赋能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内涵和维度, 为劳动教育的新发展提供理论参照和实践指向。

关键词: 智能时代; 劳动教育; 创造性智慧; 智慧劳动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7-0046-09

快速变革的智能技术为劳动提供了新的机遇和挑战, 不仅表现为建立新的劳动世界, 改变劳动的性质和技能, 而且颠覆现有的劳动过程和方式, 挑战现有的劳动规则。技术变革继续催生对受过良好教育的创造性劳动人才的需求, 同时缩减中等技能性劳动的可获得性。人工智能作为机器智能, 重在技术性和过程能力。未来的重复性劳动、中等技能性劳动将越来越多地被智能技术及机器所取代, 而需要社交技能、创造性智慧或从事高质量个人服务的职业则不会被取代,^[1] 未来的劳动者将越来越多地从事创造性劳动, 打破简单性、重复性劳动的藩篱。^[2] 因应此境, 我国坚定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力图跻身创新型国家的前列, 从“制造”大国向

“智造”强国前进。因此, 创造性智慧是未来劳动者最理想的文化素养, 劳动教育则需要培养富有创造性智慧的人才, 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将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作为自觉行为”, 显然, 劳动教育的深入革新和转型发展迫在眉睫。机器智能因其存在的局限性, 始终无法承担创造性的劳动, 故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必须着眼于追求个体创造性智慧的发展。

一、创造性智慧的概念界定

(一) 创造性

为了适应智能时代的劳动生存, 创造性将

收稿日期: 2021-06-18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数字时代的劳动教育理论重构与实践向度研究”(20YJAZH125)

作者简介: 詹青龙, 男, 教授,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信息技术工程学院, 主要从事教育信息化和数字劳动教育研究。

成为人的普遍属性。创造性是指个体利用已有知识和经验产生满足现实世界需求的、新颖独特的想法、概念或制品的能力，是一种可以通过实践不断得到增强的技能。

对创造性的理解，不同时期、不同学科领域则各不相同。在启蒙运动时代，创造性指向人类具有的洞察力、独创性和感觉的主观性。后来，创造性引起了心理、社会、教育、艺术、神经科学等领域的广泛关注。在心理学领域，行为主义重视对奖励独创性反应和结果的条件，精神分析强调无意识的动机和过程，个性传统研究则聚焦创造性个体的个性和气质特征。神经科学试图通过创造性行为中大脑的活动来理解创造性。在社会学领域，其研究旨在探索个体在创造过程中与其所处的文化及环境互动的现象，并受到日常互动和社会情境的塑造。在教育领域，对创造性的研究主要受到认知的推动，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通过量化发散思维来衡量创造性的特征，寻求培养创造性的实用技巧，如头脑风暴和提问；二是侧重于心理模型，通常是通过创造性思维的特征来计算；三是对顶尖创造者的案例研究；四是从更宽泛的情境看待创造性，如组织氛围、文化和各种形式的合作。而在艺术领域，创造性的表达和发明则被认为在个体生活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创造性不是与生俱来的，它有着不同的类别，也存在着不同的发展层次。博登 (Boden) 认为，创造性有组合、探索和变革之分。^[9] 考夫曼 (Kaufman) 和贝格托 (Beghetto) 提出了创造性的 4C 模型，将创造性由低到高分微创造 (mini-C)、小创造 (little-C)、专业创造 (pro-C)、大创造 (big-C)，旨在跟踪不同个体和生命阶段中存在的不同形式的创新、学习和发现。^[10]

创造性已从高不可攀的视野，“逐渐转变为促进在家庭和工作中的日常创造”^[5]，也成为世界各种教育政策文本中的高频词，彰显了创造的重要性、普遍性和普及性。OECD 在《教育研究与创新》报告中提出，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化、自动化的时代，创造性和审慎思维在劳动力市场日益重要，学校需要强化学生的创造性和审慎思维，帮助他们从不同的视角看待事

物，理解自己和他人观点的局限性，并通过“探究—想象—实做—反思”来帮助学生把想法转换成创新的解决方案，最终形成新的产品和服务。^[6] 印度的《2020 年国家教育政策》指出，学校迫切需要发展每个学生的创造性，让创造性成为学习的基石，让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产生创造性和创新性。^[7]

(二) 智慧

智慧是人类特有的，它由知识、经验驱动并且可以学习和测量，^[8] 因而在劳动教育中需要发展学生的智慧而不仅仅是知识。智慧是为复杂的问题找到实用的、情境适合的、在情感上令人满意的创造性解决问题的能力。按照斯滕伯格 (Sternberg) 的智慧平衡理论 (balance theory of wisdom)^[9]，智慧是个体以价值观为中介，运用智力、创造力和知识，通过短期和长期的时间来平衡内在的、人际的和外在的利益，从而更好地适应环境、改造环境和选择环境，把行动导向共同善 (common good) 的过程。智慧由认知 (知识、经验)、情感 (同理心、平和)、反思 (内省、直觉) 三个部分组成，^[10] 而米克斯 (Meeks) 和杰斯特 (Jeste) 则认为智慧包括生活和社会决策的一般知识、情绪调节、同情和同理心等亲社会行为、洞察力或自我反省、接受不同的价值体系、决断力、灵性和对新经验的开放性。^[11]

智慧与观察力在复杂情境或大场景中看待事物的能力、灵活性、考虑各种观点的能力、自我反思和深思熟虑等因素有关。智慧作为一个具身和嵌入的过程，它将认知、经验和情感结合在一起，形成连续统一体。统一体的一端是认知能力，另一端是认知与情感或其他主观认知形式的高度整合，^[12] 促使个体和社会层面作出明智的行动。

(三) 创造性智慧

智能时代“应该将创造性与人类其他美德尤其是与智慧结合起来”^[13]，未来的劳动者需要融合创造和智慧各个方面，主动生成意义，关联创造性投入，平衡原创性和功能性，明智地应用创造性。创造性智慧是指超越自己所了解的事物，并运用开放性、意愿性和好奇心不断挑战现状和突破界限，产生具有社会价值的

创造性实践能力的总和。创造性智慧是人类独有的、基于想象力的理解、解释和行动的能力。^[14]创造性智慧作为关联生活意义和行为的基本问题的专业知识系统,使人类能多视角考虑合适的行动过程,强调知识、脑力和美德或良好习惯的综合。^[15]

创造性智慧涵盖创造性思维和创造性问题解决。创造性思维涉及产生原创想法和解决问题的独特方法。创造性问题解决涉及许多可能解决方案的筛选问题,以及如何在给定不同变量的环境下确定最佳推进方式。

二、智能时代劳动教育转向创造性智慧的原因分析

(一) 创造性智慧是劳动教育历史发展的制高点

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劳动教育制高点。劳动教育的制高点是人们对劳动教育价值给予的时代新期盼,是劳动教育在不同时期所发挥的最大优势,反映了人类物质文化的发展进程,推动着人才培养方向的变革。这可从我国劳动教育的发展历程得以管窥,如图1所示。

从体力劳动到知识劳动,从技能型劳动到创造性劳动,历史上劳动教育的价值取向随着社会的发展需要不断突破其原有的制高点。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亟待恢复,通过劳动教育培养生产型体力劳动者投身到祖国的生产服务中。在社会主义十年探索建设时期,劳动教育旨在培养“有文化的劳动者”、有学识的社会青年劳动者。“文革”时期,由于过分强调“阶级斗争”的政治色彩,劳动教育将体力劳动者与脑力劳动者的培养分割开来,致使国民经济未能预见性增长。而后的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劳动教育的性质出现了质的飞跃,面向现代化的劳动岗位需要填充大量的过程性技能劳动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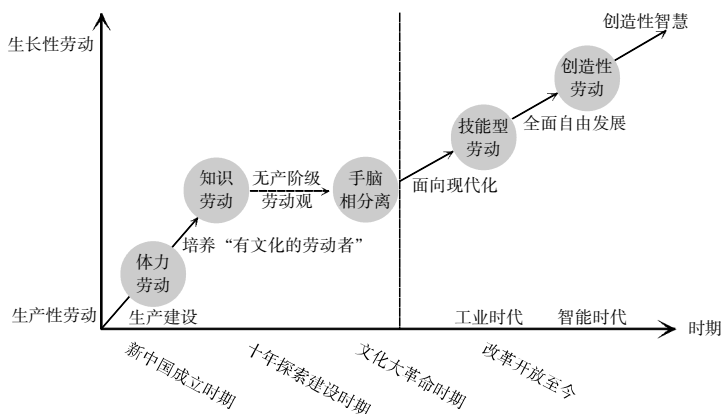


图1 不同时代的劳动教育制高点

如今,基于人类全面自由发展和机器协同发展的智能时代,人工智能试图模拟所有人类智能,劳动将被重新定义和分类,创造性智慧成为新时代劳动教育的制高点。为了确保学生在不确定的未来取得成功,劳动教育需要专注于保持和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智慧,以便他们直面日益复杂的、人机协同的世界所带来的发展挑战,满足社会对具有复杂技能的创造性劳动力的缺口。

(二) 创造性智慧是智能时代劳动的核心驱动力

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对劳动产生了深刻的影响,都同样映射为人才培养的生长点和劳动教育的拟合点,并逐步丰富劳动教育课程的内容。在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时代,39%的人正在考虑AI对未来技能需求的影响,未来人类和机器将不可避免地更加紧密地协作。^[16]80%的CEO表示,在未来20年中,大约有50%的工作任务可能会由自动化替代,并且创造性智慧和问题解决方面的技能差距使招聘变得困难。^[17]要确保学生的技能具有未来竞争力,创造性智慧显得尤为重要,俨然成为智能时代劳动的核心驱动力。智能时代的劳动具有非过程性、非常规、灵活而非预先决定、工作组取向、具体情境而非标准化、聚焦价值创造等特征,而这些特征恰恰是创造性智慧所孕育的。

在网络化、数字化和智能化联动融合发展的新时代,“没有什么比创造性智慧更独特、更

有趣、令人愉悦和在智力上更有意义”^[18]。智能技术促使劳动形式与劳动内容不断演变，逐步取代程序性、标准性和拥有明确清晰知识等简单领域的大多数劳动或工作任务，如常规性劳动、技术改进等标准化工作。那些需要主动性、创造性和共情性等以创造性智慧为特征的劳动并不容易被标准化，它们往往是被机器“剩下”的。创造性智慧劳动是指建立在智能技术基础上，利用大脑、身体和劳动工具，通过发现探索、分析理解和反思批判来创造新生事物的劳动。这里的新事物可以是物理世界的实体，也可以是虚拟世界的产物，或者是新的思想、新的神经网络等。对马克思而言，劳动还是一个创造性的过程，人类可以通过该过程激活概念性思维，改变自然，并进而改变人类自身。^[19]

创造性智慧劳动是那些通常发生于复杂的工作环境、具有高度关联性并需要人类高度关注和利用独有智慧完成的任务。完成的最佳方式是不断探索环境并测试新兴劳动实践。新兴劳动实践依赖于各层级劳动者的创造性合作以及知识的灵活流动。随着这类劳动的价值和所发生的环境变得越来越复杂，劳动教育的教学环境发生了很多变化，而“环境可以通过‘反馈机制’检验并影响个体的认识过程，人的认识也正是在个体与环境的交互式反馈过程中逐渐被建立”^[20]。劳动教育环境的智能化更新与劳动效果之间形成了相互检验的关系，只要循环体处于良性状态，学生的智慧便可以得到正向启迪，促进作为新型劳动者的学生获得劳动价值的跃升。劳动过程中，学生不仅可以在物理世界或现实环境中进行劳动活动，完成手脑结合的劳动实践，也可以在混合现实的场景里进行劳动创造，还可以在未知场景中使用虚拟工具或具有想象功能的劳动工具来应对变化多端的复杂性劳动问题。

三、创造性智慧赋能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内涵

赋能就是赋予人、组织、事物或环境某种能力和力量，使不可能变成可能，使小能变成

大能。创造性智慧赋能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就是基于智能时代的劳动特征，借由创造性智慧提供的新的思维、方法、手段、场景、技术和路径，提升劳动教育的整体能力，推进创造性智慧作为智能时代劳动文化素养的达成，实现劳动教育的创新性发展。

（一）创造是智慧的劳动教育手段

创造是智慧的劳动手段，它通过劳动与资源、环境的无限互动，寻求更好的方式来丰富和发展智慧。高品质的劳动教育需要把创造作为手段，把智慧作为目的，形成劳动教育的社会建构性、投入性、合道德性和智慧性。智慧抽身缺乏创造性的劳动环境，寻找有意义的方法和模型，培养学生的劳动精神，发展学生的劳动知识、智慧、洞察力和各种技能。

（二）创造性智慧是智能时代的劳动文化素养

智能时代的劳动唤起人的创造性智慧。创造性智慧作为一种新的劳动文化素养，是问题解决、推动创新和激发创业的有力手段，是关于劳动创造美好生活的、基本的、实用的专业知识。创造性智慧可以对复杂而不确定的劳动活动提供非凡见解、判断和建议。它包括5个方面：人性和人类劳动生活过程中丰富的事实性知识；涉及劳动生活问题的可能的丰富的程序性知识；生命期情境主义，即在并发的时间段以及整个生命期中对生活的多种情境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价值宽容和相对主义，即了解个体、群体之间的差异以及更广泛的社会/文化价值观和优先事项；不确定性知识的处理，包括个人知识、集体知识和整个世界知识的局限性。^[21]一般来说，生活经验和知识越少，对想象力的限制就越少，创造的潜力就越大，但如果没有相关劳动经验和知识将其结合起来，这些想法很可能缺乏实际的应用价值和有效性。

（三）创造性智慧是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思维方式

创造性智慧是一种思维方式，是人们看待智能时代劳动方式的根本转变。在劳动中潜意识出现的某种事物，很可能触动劳动者以不同的方式思考问题，以新的方式解决问题，并找

到更好的做事方式。创造性智慧提供一种劳动教育思维，帮助学生在劳动教育实践中激发新的思维，识别和消除阻碍新思维的认知偏见和假设，保持对未知事物的开放性，接受更多的可能性，以新的思维方式解决劳动教育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挑战。创造性智慧作为创造性、策略性变革的思维，可以帮助学生在不了解所有信息时策略性地思考某个劳动主题，在预测未来时相信自己的直觉，结果将在观察世界的思维上、在与劳动互动的思维上产生本源性变革。

（四）创造性智慧是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方法论

创造性智慧是一种在新奇性、不确定性、不稳定性、复杂性和模棱两可性的世界里高效、快速迭代的方法论，是一种大胆采用测试和学习来解决问题的组合方法论。在智能时代，对劳动教育活动采用迭代、测试和学习的方法，学生可以获得各种应用和提高劳动能力的机会。创造性智慧聚焦劳动教育情境的推理和条件性知识，可使学生变得更加敏捷，降低劳动决策过程的风险，增加获得成功的机会。创造性智慧强调把劳动活动中重要的“点”以新颖的、不同的方式联系起来，迁移到独特的领域并产生富有想象力或创新性的问题解决方法，确保创造性。创造性智慧扬弃劳动模仿的方法，采用智慧的框架和特定的信息处理方式，成功挖掘有意义的劳动知识并揭示重要的模式，展示导向新方法的可能途径。

（五）创造性智慧是智能时代的关键劳动能力

创造性智慧是人类认识与完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关键能力。^[23] 成功适应复杂的、智能化的劳动需要创造性，需要从全新的角度处理问题并思考任何领域的解决方案。创造性智慧可以帮助学生：以事物的本能（可以是什么）而不是本质（它们是什么）来审视劳动；^[23] 在新的劳动场景下展示智力的灵活性和行动的创新性；对劳动过程中遇到的新问题能提出新想法，设计新颖的、独特的解决方案，并依据劳动教育环境而付诸行动；发现智能时代劳动对象和劳动工具的新联系；获得有关创造性思想在智

能世界的劳动中如何运作的完整图景，延伸和挑战传统惯例以创造新事物的价值。在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中，发展学生的创造性智慧虽没有既定的模板或明确的方程式，但可以通过复杂性劳动和智能技术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的价值性、有效性和创造性，在获得创新知识的同时发展获得创造性智慧的特定知识和经验的能力。

四、创造性智慧赋能智能时代劳动教育的维度

劳动教育的有效实施，涉及目标、内容、形态、场所四个基本维度。创造性智慧赋能的智能时代劳动教育，在上述四个维度上产生了新的、根本性的变化。在劳动教育目标上，旨在通达劳动幸福，使劳动教育成为有温度的教育和幸福的教育；在劳动教育内容上，围绕第四次工业革命涉及的新型技术进行重组和调整，赋予劳动内容更强的灵活性和智慧性，产生更大的劳动教育价值；在劳动教育形态上，智慧劳动打破了机械性、简单性、重复性劳动的藩篱，提升了劳动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在劳动教育场所上，智慧劳动空间为劳动教育提供灵活的数字化或实体劳动设施、开放共享的空间和协作互动的创造，以实现真正的智能、赋能、创新和联通。

（一）劳动教育目标的新温度：劳动幸福

劳动旨在创造幸福和追求幸福生活。习近平总书记曾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说过，“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24] 劳动创造的过程就是奋斗的历程，如果缺乏求知欲，人就失去了动手动脑的欲望，那么任何劳动都是被动的、无意义的。创造性智慧为人们的劳动带来了奋斗、欢乐、意义和目标。专注于创造性智慧不仅是经济上的重要考量，也是实现人类成就的重要途径和世界变得更加人性化的机会。由此，在这般开放灵活的智能时代，只有创造性智慧才能激发劳动教育的无限生命和活力，成为有温度的教育和幸福的教育。

劳动的幸福程度与生产力和科技发展以及社会制度是相关联的。^[25] 智能时代的劳动教育需

要发挥学生作为劳动主体的创造性，利用创造性智慧的方法和手段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来通达劳动幸福。在创造性智慧赋能的劳动教育中，审慎思维和问题解决能力可以使学生永葆求知欲，激发探寻智慧的强烈欲望，触动学生的好奇心、想象力、知觉、创造性、热情和情感。劳动创造的过程就是不断发现问题和运用发散思维来解决问题的过程，如此进行有关个人效能的行为和实践的劳动循环往复，产生许多新的制品和思想。学生在这个劳动过程中会使自己作为创造性的人的本质得到确证，产生深层次的愉悦体验、快乐和激励，从而激发自己的劳动获得感和自我效能感，提升劳动教育的情怀和劳动的幸福程度，为劳动创造的生命增添幸福指数。创造性智慧也是学生在劳动过程中累积的知识和经验的产物，它们在劳动教育过程中发挥的协调作用及其被有意识地使用，同样能增进学生的幸福感。创造性智慧和劳动教育的双向赋能，学生自由自觉的劳动得以实现，从而回应了马克思所说的“自由自觉的劳动既是幸福的价值旨归，又是人类获得幸福的唯一源泉”^[26]。

（二）劳动教育内容的新深度：创新性技术

技术进步是促进人的发展的重要杠杆。^[27] 劳动教育的深度是指劳动教育内容的技术前沿程度，它决定了学生的劳动追求、劳动创造理念和劳动所产生的价值，包含着劳动教育、数字环境、智能时代和劳动力市场之间紧密联系的思维逻辑，引领着劳动教育在智能时代的发展方向。劳动教育需要“内容转型”，综合、全面地转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需求和挑战。

生物、数字和物理三个世界的技术融合催生了第四次工业革命。第四次工业革命模糊了物理、数字和生物领域之间的界限，并涉及人工智能、机器人、物联网、自动驾驶汽车、3D打印、纳米技术、生物技术、材料科学、能量存储、量子计算等领域的新兴技术突破。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基本目标之一是数字制造技术，通过计算设计、增材制造、材料工程和合成生物的不同组合与生物世界相互作用，从而使微生物、身体、产品、基础设施等共生发展。第

四次工业革命的核心驱动思想之一是通过网络使劳动设备等物理对象或组件与环境交互，变得智能和主动。机器、物体和空间的联网创建了物联网，从而将交互的网络物理系统与数字区域联网。

第四次工业革命为劳动带来了大量高新技术和尖端产品，人类正在运用创造性问题解决技能和使用这些技术来装备我们新时代的生存，彻底改变我们对这个世界事物的认知方式。因此，面向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劳动教育关键是让学生在劳动中能够感知、思考和创造性地应用这些新技术，发展学生的审慎思维和现实世界的问题解决能力、建立和使用数字智慧，以满足智慧劳动的要求。

如果学生在劳动中能够借由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技术获得最大化的发展，则需要充分体验其潜力并加以创造性利用。因此，劳动教育的内容需要以创造性智慧为根基，围绕第四次工业革命涉及的新型技术进行重组和调整，基于差异化的结构和创造性复杂性的高技能劳动活动为特征来展开内容设计，赋予劳动内容更强的灵活性和智慧性，从而改变学生的劳动行为、观念和思维，帮助他们适应不断变化的挑战和环境，产生更大的劳动教育价值。创造性智慧有能力帮助学生建立在劳动中体验到的这些新技术的大思想，探索这些技术的可能性应用，突破现有的界限，不断地产生假设，让想象力变得强大，并创造一些可能具有变革性的实用制品，产生多种问题解决的样态和形式，涌现新的劳动范式。

（三）劳动教育形态的新高度：智慧劳动

人工智能和智能机器等先进技术已广泛应用于需要智能和认知能力的劳动活动中，尽管它们不能改变劳动的本质，却产生了智能劳动和智慧劳动两种新的劳动形态。智能劳动是以人工智能技术为手段创造出智能产品或产品中包含人工智能技术的劳动方式。^[28] 智慧劳动作为随着生产力发展不断进步的高级劳动形态和劳动教育的未来新常态，主要是指依赖于人脑智力从事富有复杂性、创造性的智能劳动。智慧劳动作为创造性智慧赋予劳动的产物，可有力

提升劳动教育的高度，实现由机械式劳动向智慧劳动的跃迁，提升劳动的自主性和创造性。因此，重复性机械劳动向创造性智慧劳动演化的过程就是人的本质发展和提升的过程。

智慧劳动是智能时代深化劳动教育的主要形态。人工智能主要是增强而不是取代人类能力，在劳动教育中需要让学生采用全新的方式与智能机器协同劳动，通过在增强环境中的协作来提高学生人机协同劳动的能力和方式。在智慧劳动中，需要让智能机器承担重复的劳动任务和流程，将学生的劳动注意力从完成日常劳动任务转向不重复的、更具创造性、更有意义、更有价值的劳动活动，转向识别和解决未见问题，使他们能够更加专注于未来劳动的需要，发展创造力、同理心、好奇心等能力，从而将学生的焦点从预定义和标准化的劳动任务转移到围绕提高劳动成果的创造新价值上，将学生的要求从具体技能转变为持久的人类能力，帮助学生更快地学习，发展技能和能力以保持相关性的经验和接受挑战，并为未来做好准备，如图2所示。

（四）劳动教育场所的新宽度：智慧劳动空间

劳动教育的宽度就是在迎接智能机器劳动替代的挑战和劳动能力转移之时，为了发展劳

动自身的环境适应性、保持与时俱进的先进活力所拓展的具有吸收力、扩张力和稳定性的韧性维度。创造性智慧作为拓展劳动教育平台宽度的动力引擎，可以模糊劳动教育场所的边界，丰富劳动教育的发生场所——在一切现实生活和虚拟场景里，使劳动教育不断适应社会环境的变化，既不改变劳动的本质和初心，也能调整劳动教育的环境因素，提高劳动教育生态系统的灵活性、开放性和延展性。

1. 劳动空间连续统一体

早期的劳动教育场所主要表现为校园、农场等物理劳动空间。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劳动环境逐步发生变化，产生了数字劳动空间、智慧劳动空间和混合劳动空间，形成了劳动教育空间的生态化架构，大大拓展了劳动教育的宽度。现在的学生普遍具有数字原住民的特点，数字劳动空间会成为劳动教育场所的主流，物理劳动空间则是有益的补充，形成物理劳动空间和数字劳动空间的协同，为数字时代的劳动教育提供了动力。而智能技术的进步和劳动方式的变化，推动了对智慧劳动空间的需求，引发数字劳动空间发生根本性的转变，智慧劳动空间正在涌现。

2. 智慧劳动空间

智慧劳动空间是劳动空间的自然进化，它使用一系列新技术产生更多有效的劳动方式。智慧劳动空间就是学生利用个人物联网设备或可穿戴设备等自带物（Bring Your Own Thing, BYOT），通过与数字化的物理对象互动来实施劳动的场所。智能劳动空间技术包括物联网、数字标牌、集成的劳动空间管理系统、虚拟劳动空间、运动传感器和面部识别。在智慧劳动空间中，学生可以通过互联网、移动技术、云计算、传感器和物联网的结合，虚拟或远程地进行劳动，实现随时随地通信、协作和完成劳动。智慧劳动空间是由学生、数字化设备或物联网性实体设备、空间等构成的网络。

智慧劳动空间能将新技术应用于学生、劳动过程和物理或数字空间，提供无缝的劳动体验、安全环境和创新可能。在劳动教育中，智慧劳动空间应围绕劳动活动设计，为劳动教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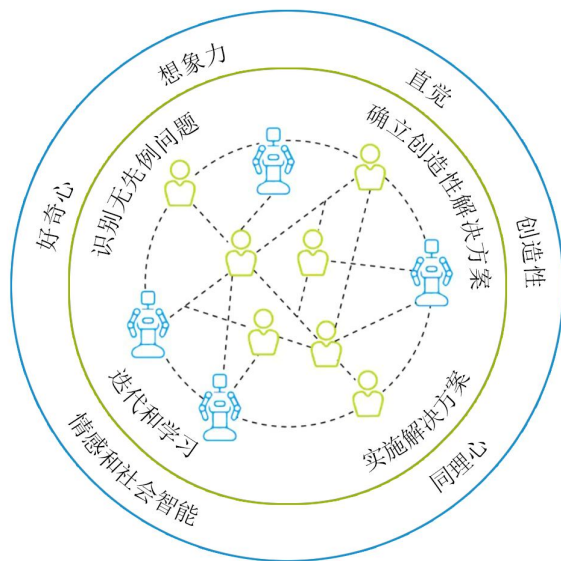


图2 智慧劳动的概念框架

提供灵活的数字化或实体劳动设施、开放共享的空间和协作互动的创造,以实现真正的智能、赋能、创新和联通。

综上,我们生活在一个复杂多变的世界里,5G通信使万物互联的速度愈之加快,大数据、人工智能、区块链等科学技术令无数程序性工作岗位被智能机器重塑或取代,留给人类的劳动任务更具灵活性、复杂性、情境性和定制性,因此,劳动教育不再只是培养服从、勤奋、有知识的青年劳工,而是更关注于人们积极、自主、创造、激情、活力、智慧的才能。

将创造性智慧赋能劳动教育是人工智能时代的明智之策。其一,创造性智慧是创造+智慧,它不等同于创造性思维,不仅是新奇独特的想法,还要有实践行为的能力,把想法变成切实可行之举,为创造赋予了科学性,为智慧赋予了创新性。其二,劳动形式的历史演变将劳动教育推向了一个新的制高点,为确保学生在未来的劳动力市场具有智能技术无法取代的竞争地位,创造性劳动所追求的创造性智慧成了新时代劳动的核心驱动力。其三,创造是智慧的劳动教育工具,创造性智慧是智能时代的劳动文化素养和关键劳动能力,更是劳动教育的一种思维方式和方法论。其四,创造性智慧孕育着智慧劳动,深化了劳动教育的形态;不断拓展劳动教育的宽度,扩大劳动教育的场所;提升劳动教育的技术深度,使学生的劳动过程变成具有“含金量”的创造性劳动。其五,创造性智慧为劳动教育升温,让学生在劳动创造的过程中增添自我认同感,提升幸福感,获得劳动价值,推动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

(感谢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信息技术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汤紫玄同学对本论文的贡献!)

参考文献:

[1] WARTENBERG A.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the future of human labor [EB/OL]. [2021-04-06]. [https://www.readitquik.com/articles/cloud-](https://www.readitquik.com/articles/cloud-3/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the-future-of-human-labor/)

[3/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the-future-of-human-labor/](https://www.readitquik.com/articles/cloud-3/artificial-intelligence-and-the-future-of-human-labor/).

[2] 让一切创造性劳动的活力竞相迸发 [EB/OL]. [2021-03-08]. <http://news.eastday.com/eastday/13news/auto/news/china/20201126/u7ai9615910.html>.

[3] BODEN M. The creative mind: myths and mechanisms [M].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4] KAUFMAN J, BEGHETTO R. Beyond big and little: the four C model of creativity [J]. Review of general psychology, 2009, 13 (1): 1-12.

[5] CRAFT A. Creativity in schools: tensions and dilemmas [M]. England: Routledge, 2005.

[6] OECD. Fostering students' creativity and critical thinking: what it means in school, educational research and innovation [EB/OL]. [2021-05-04]. <https://www.oecd.org/education/fostering-students-creativity-and-critical-thinking-62212c37-en.htm>.

[7] MINISTRY OF HUMAN RESOURCE DEVELOPMENT. National Education Policy 2020 [EB/OL]. [2021-05-20]. https://www.education.gov.in/sites/upload_files/mhrd/files/NEP_Final_English_0.pdf.

[8] JESTE D, LEE E. The emerging empirical science of wisdom: definition, measurement, neuro-biology, longevity, and interventions [J]. Harvard review of psychiatry, 2019, 27 (3): 127-140.

[9] STERNBERG R. Implicit theories of intelligence, creativity, and wisdom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5, 49 (3): 607-627.

[10] CLAYTON V, BIRREN J. The development of wisdom across the life-span: a re-examination of an ancient topic [C]// BALTES P, BRIM O. Life-span development and behavior. New York: Academic, 1980.

[11] MEEKS T, JESTE D. Neurobiology of wisdom: a literature overview [J]. Archives of general psychiatry, 2009, 66 (4): 355-365.

[12] HIGGS J. Appreciating practice wisdom

[EB/OL]. [2021-04-09]. <https://brill.com/view/book/edcoll/9789004410497/BP000009.xml>.

[13] STERNBERG R. Wisdom, intelligence, and creativity synthesized [M].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3.

[14] [18] Do you have creative intelligence [EB/OL]. [2021-04-27]. <https://medium.com/creative-intelligence/do-you-have-creative-intelligence-9c6e1feaabc>.

[15] BALTES P, KUNZMANN U. The two faces of wisdom: wisdom as a general theory of knowledge and judgment about excellence in mind and virtue vs. wisdom as everyday realization in people and products [J]. Human development, 2004, 47 (5): 290-299.

[16] In the age of the machine, people matter more than ever [EB/OL]. [2021-05-18]. <https://www.pwc.com/ca/en/services/consulting/perspective-hr-function-transformation/in-the-age-of-the-machines-people-matter-more-than-ever.html>.

[17] MCGOWAN H. What if the future of work starts with high school? [EB/OL]. [2021-05-24]. <https://www.forbes.com/sites/heathermcgowan/2019/04/03/what-if-the-future-of-work-starts-with-high-school/?sh=78ce63a59645>.

[19] VALLAS S, KOVALAINEN A. Work and labor in the digital age [M]. Bingley: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 2019.

[20] 皮亚杰. 皮亚杰教育论著选 [M]. 卢

濬, 选译.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5.

[21] BALTES P, STANGE A. 2005. Wisdom: the integration of mind and virtue [EB/OL]. [2021-04-15]. http://www.mpib-berlin.mpg.de/en/forschung/lip/pdfs/research_project_6.pdf.

[22] 丁峻. 创造性智慧的审美心态 [J]. 浙江师大学报, 1991 (3): 107-110.

[23] Creative intelligence can be a superpower to thrive in the future [EB/OL]. [2021-05-12]. <https://www.educationtimes.com/article/editors-pick/78161279/creative-intelligence-can-be-a-superpower-to-thrive-in-the-future>.

[24] 中国政府网. 习近平在 2018 年春节团拜会上的讲话 [EB/OL]. (2018-02-14) [2021-03-09]. http://www.gov.cn/xinwen/2018-02/14/content_5266872.htm.

[25] 何云峰, 张荆京, 苏长恒, 等. 劳动教育何以在智能时代增进劳动幸福? [J]. 东华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1 (1): 1-6.

[26]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1 卷 [M].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编译.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27] 武文凤, 何自力. 马克思论技术进步与人的发展 [J]. 当代经济研究, 2013 (4): 11-15.

[28] 何玉长, 宗素娟. 人工智能、智能经济与智能劳动价值——基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思考 [J]. 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2017 (10): 36-43.

(责任编辑 刘红)

(下转第 83 页)

政策受众视角下 教育政策精准性提升的路径分析

曲正伟

(东北师范大学,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 从政策受众的视角检视教育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 应成为教育政策精准性问题研究的重要路径。充分发挥政策受众在教育政策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 关注政策受众在教育政策实施后的问题解决和利益调整, 对保障教育政策议程设置的科学性、政策执行的忠实度以及政策绩效评估的全面性, 提升教育政策的精准性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在实践中, 对政策受众的精准瞄准存在技术困难、政策受众参与机会缺失、可行能力差异等方面的原因, 使得政策受众对教育政策精准性的促进作用有限。因此, 要基于政策受众的视角审视和重新设计教育政策系统, 需要从转变政策认知、精准靶向瞄准、系统夯实能力和优化利益调整等多方面进行综合改进。

关键词: 教育政策; 精准; 政策受众; 瞄准机制; 可行能力

中图分类号: G64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7-0055-09

教育政策与制度研究

我们对一项教育政策实施效果的评估, 既要看政策预定价值目标的实现程度以及对社会带来的影响, 也要关注各政策行动者在教育政策过程中的互动关系, 强调政策受众对教育政策利益的调整和获得程度。在公共政策走向“精准性时代”的背景下, 如何实现教育政策利益分配从“大水漫灌”转向“精准滴灌”, 使政策受众实现利益获得的“增量”和实际问题的解决, 已经成为我们考量教育政策精准性的重要指标。因为如果忽视了政策受众的作用和价值, 单纯政策数量的增加并不能有效解决现实问题, 甚至会出现政策无效甚至政策本身“制造问题”的客观事实。^[1]

教育政策是政府对公共教育利益的一种权

威性分配。^[2] 政策受众是指一项教育政策目标所指向的、与政策利益分配相关联的群体。这种被分配的教育利益既可以是直接利益, 也可以是间接利益; 既可能是当前利益, 也可能是未来长远利益。正是由于政策受众具有政策利益相关性的特征, 政策受众在整个教育政策过程中就不再仅是旁观者或者被动接受者, 而是具有主观能动性的政策参与者、执行者和评估者, 贯穿于整个教育政策过程的始终。但长期以来, 政策受众的角色和地位往往是被忽视的、缺失的。在研究层面, 政策受众更多地被看成是受教育政策规范、管制、调节和制约的社会成员, 被理解成为既定的、具有内部一致性和被动的群体, 而忽视其自身的能动性和内部的复杂性

收稿日期: 2021-05-21

基金项目: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虐童事件背景下幼儿教师专业伦理规范建设研究”(18YJA880066)

作者简介: 曲正伟, 男, 副教授, 东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 主要从事教育政策法律研究。

在实践层面，我们更倾向用政策执行结果和政策文本目标的对应程度来评估教育政策实施的效果，更强调政策规定的量化指标实现，但“这些抽象准则或有限的‘数数字’指标能否全面刻画利益相关者（政策受众，或者称政策目标群体）对政策执行过程及效果的体验，存在疑问”^[3]。因此，从政策受众的视角检视教育政策过程的各个环节，应成为教育政策精准性问题研究的重要路径。本文首先对政策受众对教育政策精准性提升的价值和影响进行解释，然后对政策受众促进教育政策精准性的现实问题进行分析，最后形成基于政策受众的教育政策设计框架，对未来教育政策精准性的提升提出可能的路径建议。

一、政策受众对提升教育政策精准性的价值

我们对教育政策的精准性要求，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的动因。一是来自教育政策实施属性的内在诉求。任何一项教育政策的出台，都是“为了解决某一公共教育问题或实现某一教育理想目标”^[4]，“决策者在多大程度上成功地抓住如下问题：是否能正确地设计以应对他们宣称要解决的”^[5]，是对教育政策进行评估的最重要指标。无论是一项教育政策议程“从哪里来”、政策实施“要依靠谁”，还是评估过程“根据什么标准”，整个教育政策的“生命周期”都要围绕这一目标形成系统闭环，如果失去了对目标问题和目标群体的精准性，教育政策就失去了其作用价值。二是来自教育治理效能提升的外在推动。随着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进入新时代，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教育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之间的矛盾突出，利益主体分化和利益诉求多元都使得教育政策问题日益复杂模糊，实施过程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日益增大。因此，要提升教育治理的效能，就必须提升教育政策的精准程度，回应人民群众的教育需求，才能将我国的制度优势转化成为教育治理的效能。

精准是针对粗放而言的。教育政策精准就

是通过教育政策过程的精准化设计，达成对教育政策问题的精准化解决和利益调整的精准化实现。这其中包括教育政策过程的形式精准（如对政策问题的精准界定、对政策议程的精准设计、对政策内容的精准执行、对政策实效的精准评估等）和教育政策目标的结果精准（如公共教育问题的解决和实际利益的获得等）两个层次。这两个层次互为依托，没有形式上精准的政策过程，就无法保障政策结果的精准；同样，没有目标上的结果精准，政策过程上的精准也会流于形式。大量的文献已经对教育政策在议程设置、执行、评估等环节中存在的粗放现象做了丰富的研究，但仅仅从政策过程完整性的角度、从政策制定者的角度出发，忽视政策受众的实际利益调整，忽视政策受众的现实需要和内在动力，教育政策过程各环节出现粗放现象也就成为必然。因此，将政策受众的立场贯穿于教育政策的全过程，关注政策受众的真实需求、可行能力以及利益获得情况，对教育政策精准性的提升有着重要的价值。

首先，政策受众影响教育政策议程的精准设置。教育政策客体是教育政策系统中的重要一环，界定明确的政策客体是提升教育政策精准性的前提工作。因为“政策客体的界定是整个政策活动的立足点，政策客体行为及状态的预期改变是整个政策活动的出发点，而政策客体行为的现实改变及由此带来的社会状态的改变则是整个政策活动的落脚点”^[6]。政策受众作为教育政策作用和影响的人或者群体，也是教育政策客体研究的重要对象。公共政策客体分类长期以来有“人事两分”^[7]的传统，即“从‘事’（政策所要处理的社会公共问题）和‘人’（政策发生作用的对象，即社会成员）两个角度来认识公共政策客体”^[8]。但是，在实际教育政策议程的设置过程中，教育政策问题和政策受众群体往往是捆绑在一起的，无法孤立地区别对待“人”与“事”。比如农村教师队伍建设问题，我们既无法脱离农村这一具体的场域泛化教师队伍建设的问题，同样也不能忽视教师队伍建设的独特性，将农村场域因素强加复制于问题解决之中。因此，教育政策议程要精准设

置,首先就是要确定将“谁的什么问题”放在政策议程诊断、评估和形成的整个环节之中。

其次,政策受众影响教育政策的精准执行。政策受众是教育政策执行的主要参与力量,充分发挥政策受众的主体地位,是教育政策精准执行的重要保障。长期以来,教育政策受众群体一直处于被动接受教育政策措施的客体地位。但是,“政策的效果不仅取决于决策者选择了什么样的政策,也取决于决策者是如何选择并实施政策的。政策制定和政策实施均涉及不同行动者之间的谈判”^[9]。从这个意义上说,政策决策者和执行者构成的战略群体和政策受众群体共同组成了一个政策共同体,而非二元对立的主客体关系。我们将政策受众提升到教育政策执行主体的地位,一方面,政策受众通过平等的互动和谈判,充分表达自身的教育利益诉求和政策建议,使教育政策主体封闭造成的执行偏差得到纠正。因为,政策主体的单一性容易造成教育政策受众主体的价值期望和利益诉求得不到充分的表达,最终可能使教育政策执行结果的代表性和针对性差。另一方面,政策受众通过充分的意愿表达和意见接纳,可以增加对教育政策的理解和认同感,形成对教育政策执行的“心理解冻”效应,减少政策受众对教育政策内容的误解和执行阻力。因此,尊重政策受众在教育政策执行中的能动性,提升政策受众的内在动力和可行能力,对教育政策的精准执行有保障和促进作用。

最后,政策受众影响教育政策的精准评估。对教育政策效果的评估,国内外学者基于不同的标准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评估类型。这些不同类型之间的主要分歧在于是更关注基于事实判断的数字目标达成,比如生产力标准、效率标准等,还是更关注基于价值判断的社会效果实现,比如公平标准、适应性标准等。我国教育政策的评估主要基于自上而下的视角,从决策者或执行者设定的抽象准则或量化指标出发,进行对照性或者验证性政策评估,而忽略了受众的利益获得和社会影响效应的相关评估。因此,教育政策评估过程在考量政策量化目标实现的同时,更要加入教育政策对政策受众本身

的利益调整和对社会问题解决的现实影响,这也就是所谓第四代评估中强调的“政策回应性”。政策回应性是指一项政策在实施之后对于特定政策受众利益需求的客观达成程度和主观满足程度。这一标准考虑的问题是“效益、效率、充分性、公平性等标准是否真正反映了特定群体的需要”^[10]。如果政策受众认为一项教育政策满足了其利益需求,就会对教育政策表现出积极的态度和行动,这时的政策回应度就高;反之,即便是教育政策能够符合效率或者公平的标准,政策受众对这项教育政策的回应度也会很低。在这个意义上,一项教育政策是否能够通过政策受众的利益进行影响和调整,并进而产生正向积极的社会效应,是判断教育政策实施实效的重要指标。

二、政策受众在提升教育政策精准性过程中的现实阻碍问题

政策受众对教育政策精准性提升有着重要的价值。充分发挥政策受众的主体性和能动性,着眼其政策实施后的利益调整和获得感,对保障政策议程设置的科学性、政策议案执行的忠实度以及政策绩效评估的全面性,实现教育政策的精准性提升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但是,对政策受众的瞄准偏差、参与机会缺失以及可行能力上的差异,使得政策受众在促进教育政策精准性提升过程中的作用受到阻碍。

1. 对政策受众的精准瞄准存在技术困难

正如前面提到的,教育政策精准性的前提是要真实把握政策受众的范围,精确瞄准目标群体,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将教育政策利益和资源分配给真正有需要的群体。但是在教育政策实践过程中,把政策利益毫无偏差地分配给真正有需要的人往往很难实现,经常会出现“符合政策标准却未收益”和“不符合政策标准却收益”的情况。究其原因,教育政策价值的实现过程往往是通过设定一定的瞄准机制对受益对象进行筛选和利益调整的过程,但瞄准机制本身的概括性和简约性与现实世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使得对教育政策受众的瞄准偏差成为

普遍的现象。现实中,我国教育政策对政策受众普遍采用的瞄准机制可以分成以下三种基本形式。一是基于个体/家庭的政策受众瞄准机制,即通过政策实施将资源和利益直接分配给政策受众个人或者家庭。比如,在教育扶贫过程中普遍使用的贫困户建档立卡政策,就是通过对贫困户的精准识别,将教育扶贫资金“精准到人”或“精确到户”。二是基于类型的政策受众瞄准机制,即将教育政策调整的对象直接指向某一类型群体或行为,或者将教育政策实施的资源和利益重点分配给某一类型的群体。实践中区分类型的标准有很多,比如有基于主体类型的区分(农村留守儿童、0—3岁儿童等)、基于教育类型的区分(学前教育、职业教育等)、基于学校类型的区分(民办学校、农村小规模学校、农村寄宿制学校等)和基于行为类型的区分(择校行为、乱收费、减负等)。三是基于区域的政策受众瞄准机制,即教育政策利益分配在不同区域空间范围内进行倾斜性分配。比如加快中西部教育发展、优先发展农村教育事业等相关的政策。

这三种瞄准的机制都有其面向教育政策受众的针对性,但是基于“纯净模型”之下的政策受众认定,将面对教育政策实践中精准瞄准的技术难题。首先,三种瞄准机制的精准实现需要技术支撑。比如个体/家庭机制中对贫困户的建档立卡,需要有科学的贫困户测量标准、动态完整的家庭情况数据作为支撑。但在实际基层工作中,往往是在无法准确统计家庭收入的情况下,采用民主评议的方式认定贫困户,而且在民主评议中除了将家庭收入作为标准以外,身体健康、家庭负担甚至人际关系都可能成为认定贫困户的标准。比如类型机制中对不同类型群体、教育、行为的治理,可能会因类型之间的竞争排他,出现在利益分配中的顾此失彼;区域机制虽然瞄准教育发展的不同区域空间,但却无法控制区域内部的异质分层,而且具体到某一区域之后又会面临个体机制相同的甄别难题。其次,三种瞄准机制之间的交叉影响会产生叠加效应,增加了对教育政策受众精准瞄准的难度。实践中,三种瞄准机制可能

会衍生出“区域+个体”“区域+类型”“类型+个体”“区域+类型+个体”等不同的组合方式,这都使得教育政策对政策受众的精准瞄准以及政策利益的精准传递变得更加困难。最后,解决精准瞄准的技术困难可能会带来行政成本的增加。教育政策的精准瞄准需要动用大量的行政成本、人力资源和专业力量,“在有限的行政资源约束下,资源是用于精准瞄准的实现还是用于政策受众的利益增加,是一个价值选择的问题”^[11]。

2. 政策受众在教育政策过程中参与机会存在缺失

政策受众对教育政策的有序参与,将推动教育决策的科学化和民主化过程,也将对教育政策的精准性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但在具体的教育政策实践过程中,政策受众的实际政策参与机会是缺失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主体上的失位。作为一项公共政策,教育政策过程一直伴随着行政权与公民权之间的平衡和分配。我国教育政策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采取的是“凝闭性”政策体制,^[12]教育政策议程的提出和形成主要采用的是一种单向度政府选择的“内部循环论证模式”,教育政策执行很多时候表现为一种自上而下的行政过程,教育政策评估更多地采用数量达标式的评估方式。在这个过程中,教育政策受众参与机会的主体地位是被忽视的,“在政策过程中扮演较小并且仅仅是间接的角色”^[13]。但是,政策受众的地位不应被忽视或者旁落,在整个教育过程中应当把加强顶层设计和坚持问计于民统一起来,要积极听取民声、汇聚民意,把教育政策聚焦于政策受众的切身利益和迫切需求的事项上来。

二是过程上的失语。这主要表现为以下两个问题。首先是“被代表的社会”。政策受众对政策参与程度和影响是不同的,一些更接近教育决策中心、更愿意参与教育政策过程的政策受众,往往会成为教育政策受众的代表者,成为政策辩论场域中政策受众诉求输入的主要力量。但他们作为代表者自身对公共教育问题的理解程度、价值判断与利益衡量,以及被代表者的利益多元诉求,都可能使“被代表的社会”

成为“被掩盖的社会”。如果大多数政策受众的真实意愿无法得到表达,则纳入教育政策窗口的受众诉求就会产生偏差,政策受众对教育政策的认同度低,受众个体就会采取各自的对策化行为对政策利益进行争夺。其次是“声音的碎片化”。“政策受众群体的组织和制度化程度是公共政策执行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之一”,^[14]政策受众的组织化是提升参与能力和有效性的重要内容。但由于政策受众受教育政策影响的程度不同、内部类型的多样性以及个体诉求之间的差异等,政策受众对教育政策过程的参与往往处于孤立的个体或者少数人聚合的分散状态,缺少组织化的表达。这种分散的碎片化的利益诉求要么难以形成真正的发声,要么难以进入政策之窗形成教育决策。

三是路径上的失序。政策受众对教育政策过程的参与除了要“有机会”“有能力”,还要“有路径”去参与。有学者在受众组织性基础上提出了“结构化”^[15]的概念,即政策受众利益表达的内容是否在政治系统中有相应的输入结构予以接纳,转化成政策议题并形成相应的政策。按照这样的分类来看,“有结构”是一种制度化的利益表达途径。由于是在制度框架内表达,政策受众的表达成本和系统的接受成本都会降低。在教育政策实施过程中,由于制度化利益表达途径,比如教育政策研制、听证、调研等,在实践中会受到资格、资源和条件的限制,机会往往集中于某些精英成员身上,大量的政策受众会转向采用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方式。“无结构”就是非制度化的利益表达途径,比如通过有组织形式的教育行业组织或者教育公益组织来表达利益诉求,或者通过网络表达、群体性行为等形式进行非组织化的表达。这种非制度化的教育诉求表达方式由于缺少固定的利益诉求接收结构和机制,使得政策受众的教育利益表达方向不明、整合程度低、政策回应性差,效果也很难预测。

3. 政策受众对教育政策利益调整的能力存在差异

如果说教育政策受众的参与机会更多地强调起点的公平,那么能力则直接影响实际教育

政策利益的获得结果。如果没有能力的支撑,参与机会只会成为“浮在上面”的民主假象,使教育政策目标和价值无法顺利实现,也不会给教育政策受众实际的利益获得,最终成为只顾“面子”、不要“里子”的花架子。政策受众促进教育政策利益调整实现过程中的能力差异,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政策受众对教育政策待分配的资源存在争夺能力上的差异。一项教育政策待分配的资源,需要在教育受众层面进行“第二次分配”,而在这次分配中,政策受众对政策信息的掌握、与相关部门间的沟通等方面的能力就显得尤为重要。在实际教育政策场域中,政策受众根据能力的差异可以表现出三种现象:一是资源分配的排他性,即政策受众缺少进入教育政策瞄准的机会,也就难以获得相应的资源和服务;二是资源分配的俘获性,即有影响力的政策受众“俘获”教育政策并使政策服务于自身利益;三是资源分配的庇护性,即政府只会对发挥较大影响力或者利益相关的教育受众进行积极响应,并进行资源与权力之间的交易。正是基于政策受众自身利益争夺能力的差异,在教育政策实施过程中才有可能出现政策目标背离和受益群体偏差的现象。

二是政策受众将所获得教育政策资源转化成实际利益的能力存有差异。按照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的理论,即便资源能够在每个人之间平等分配,个人“在将资源转化为利益的过程中存在很大的差异性”^[16],这是因为人际的差异性会给教育政策受众带来可行能力上的差异。我们在对一项学前教育政策实施效果进行调查时发现了“中间凹陷”的现象,即中部地区相比于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政策受众对政策效果的认同度最低;镇区相比于城市和乡村,政策受众对政策效果的认同度最低。当我们对这一问题进行解释时,除了政策在基层执行过程中的种种漏洞等常规原因之外,政策受众在政策利益分配中的可行能力差异是造成这类问题出现中的重要原因之一。因为即便同为政策关注的目标受众群体,处于不同社会结构、地位的个体,对教育政策的制定、执行以及评估

的认知和行动都是存在差异的。这种差异会反作用于整个政策的实施过程，从而大大掩盖和削减教育政策实施的整体效果。

三、基于政策受众的教育政策精准性的提升路径

基于政策受众对教育政策精准性提升的价值和现实阻碍因素，我们要提升教育政策的精准性，一方面要将政策受众纳入教育政策全过程，做到理念上重视、制度上保障和行动上支持；另一方面还要提升政策受众对教育政策过程全程介入的意愿和能力，实现其对教育政策精准性的有效促进。因此，基于政策受众的视角审视和重新设计教育政策系统，需要从转变政策认知、精准靶向瞄准、系统夯实能力和优化利益调整等多个方面进行综合改进。

1. 转变政策认知，凸显政策受众的主体价值

要将政策受众纳入教育政策系统的全过程、转变政策认知是一项前提性的工作。因为只有从认识层面确认政策受众的地位、重视政策受众的价值、明晰政策受众的作用，政策受众才能有效融入教育政策全过程，才能对教育政策的精准性起到促进和保障作用。要做到政策认知的转变，应做好以下三个方面。首先，在教育政策理念上，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立场，从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出发，将政策受众的现实问题解决和实际利益需求满足作为教育政策研判、执行和评估等环节的逻辑起点和政治前提。因此，任何宏观的教育改革和具体的教育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都不应也不能成为“人的空场”，要把群众满不满意、答不答应、高不高兴作为教育政策评估的根本标准，着力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教育重点难点问题。其次，在教育政策设计时，要结合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人民群众对美好教育生活的期待，将政策受众的利益需求纳入公共教育政策议程之中。掌握教育政策受众之间在教育需求类型、方向、强度等方面的不同，做到利益均衡化政策设计。虽然对政策利益的共享无法达成完全均等，但是一项科学规范的教育政策必将调整

政策目标群体的利益结构，使各主体都具有借力发展的可行能力，共享教育政策的改革实施成果，而不应使弱势群体始终承担改革影响的全部成本。最后，在教育政策执行和评估中，要贯穿政策受众的利益需求主线，时刻将“他们有什么需求”“如何更好地满足这些需求”作为确定政策目标、选择政策工具、推进政策执行以及考量政策评估标准的重要依据。同时，充分发挥政策受众在教育政策实施和评估过程中的主体地位和能动作用，在教育政策网络之中为政策受众赋权增能，提升其可为、能为和有为的空间、资源和条件。

2. 精准靶向瞄准，切中政策受众的真实诉求

对政策受众群体的精准瞄准，是政策受众提升教育政策精准性作用发挥的基础性工作。如果没有对政策受众的精准瞄准，教育政策的整个过程就没有政策议程设置的重要发起者，就失去了政策执行的主要支撑力量，也就忽视了政策利益调整后的实际享用者和承载者。受资源、技术等方面的限制，现实中对教育政策受众的精准瞄准还有诸多困难，这就需要我们多方借力实现对政策受众精准靶向瞄准的可能。首先，要向外脑借力。由于政府行政资源的有限性，决策窗口打开存在时间约束，再加之瞄准技术上的局限，这些都使得教育政策决策者对教育政策受众的甄别与瞄准存在现实困难。因此，政府及相关部门要发挥其资源动员和整合能力，一是要借助科研院所、高等学校、教育中介组织，尤其是高端教育智库平台在资源基础、知识累积、研究技术等方面的优势，找准真问题，描述真情况，实现教育智库与教育决策部门之间的有效对接，达成对教育政策受众的精准瞄准；二是要借助政治学、管理学等学科，尤其是心理科学、行为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准确把握教育政策影响下各群体和个体的心理状态与行为规律，为进一步完善研判和定位教育政策受众的需求和行为奠定基础。其次，要向学习借力。“公共政策本质上是对过去政策的延伸，政策制定的过程实际上就是一个不断学习、实验、反馈和调整的过程。”^[17]因此，教育政策的精准实施不可能单凭理性的政

策设计一蹴而就，还需要在教育政策实践过程中不断学习、纠错、移植和创新。这种学习一是要通过对教育政策自身的实施过程和结果进行检视和评估，对执行低效和结果偏离现象分析原因，找出对政策受众认定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纠偏；二是要对其他领域中政策瞄准的有效做法进行有针对性的政策扩展和移植，弥补教育政策瞄准中的短板。比如“精准扶贫”政策的实施，为教育政策的精准瞄准提供了很好的可以借鉴的问题素材和成功样本。最后，要向技术借力。教育政策的精准瞄准需要以客观、完整、可分析的大数据作为支撑。因此，要重视对教育事业宏观发展以及专题工作相关数据的积累和数据库建设，构建对我国教育事业发展长时段、多维度、多因素的综合立体监控平台和数据中心，为教育政策决策提供真实准确的数据支持。同时，要加强教育决策数据的整合力度，使各级政府之间、教育部门与其他职能部门之间的数据联网联通，信息共享，避免出现“信息孤岛”的现象。

3. 系统夯实能力，提升政策受众的有效参与

政策受众的主体能力状况，对发挥促进教育政策精准性的能动作用有着重要的支撑意义。能力欠缺的政策受众缺少有效获得政策信息的途径，无法灵敏感知教育政策变化，在政策利益表达和辩论过程中处于弱势或者被忽视，这些都使得政策受众在教育政策资源获得和利益转化过程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系统提升政策受众的能力，促进其成为教育政策场域中的重要发声力量，是教育政策精准性提升的重要内容。首先，要在宣传教育中培养能力。知是行之始，政策受众能力不足往往与他们在获取政策信息方面的不对称直接相关。他们对获取政策途径的局限以及对政策内容的误读或者漏读，都将使其失去参与公共教育政策活动的机会。因此，在教育政策精准化推进的过程中，相关部门应利用多元灵活的方式，继续提升培训在政策宣传中的主渠道作用和实效性，充分发挥新旧媒体的作用，扩充教育政策获知途径，提高政策受众的政策认知水平；同时，针对政策受众有效参与教育政策过程的制约因素，加大公

共教育力度，重点提升其公民意识、文化水平、综合素质和参与公共教育政策过程的专门能力。因为这些能力对政策受众而言，“具有基础公平涵义，有利于提高政治贫困群体争取和有效利用资源的能力和协商能力”^[18]。其次，要在政策实践中历练能力。民主需要运转起来，政策受众的能力也需要在教育政策实践参与过程中得到历练。要使受教育政策影响的利益相关者尽可能地广泛地参与教育政策全过程，允许不同的声音存在，为他们提供利益诉求表达的途径和平台，使之成为教育政策精准性的纠偏机制。在这样的过程中，教育政策过程中各相关主体在同一政策平台上进行充分的意见表达、观点辩论、利益澄清和共享接纳，在实践中提升参与教育政策过程的能力，也只有通过这样的政策实践过程，他们才更可能接受这一决策，并可能鼓励他人也接受，进而形成认同，增强教育政策的民主性和合法性。最后，要在制度完善中保障能力。政策受众能力的实现需要有完善的制度体系作为保障。要强化教育政策意见采集制度，在继续做好做实教育政策出台前的调研、过程中的听证和出台后的征求意见等常规程序外，还要创新对政策受众意见和诉求的反馈通道，充分借助网络信息技术，将以往未纳入政策接受系统的社情民意进行甄别、筛选，力图从多层面、多角度了解教育政策全过程的受众反馈；要完善教育政策进展报告制度，一方面要做好重大教育政策在实施前的公示制度，另一方面要对政策受众普遍关注的问题、尚有争议的问题以及有代表性的问题，在教育政策内容和未来工作安排中进行重点说明；要健全教育政策评估制度，将政策受众纳入政策评估主体行列，将政策受众的问题解决和利益获得作为评估政策实效的重要内容和指标，以及作为教育政策执行监督和决策责任追究的依据。

4. 优化利益调整，实现政策受众的利益增值

通过对政策受众的利益调整实现对教育公共问题的解决，是教育政策精准性的直接表现和重要绩效指标。由于人际的相异性、群体之间的异质性以及区域之间的不平衡性等方面的影响，一项教育政策对政策受众的利益调整存

在着价值共识和实践操作上的双重困难。因此,如何形成新的教育政策利益分配秩序,整合政策受众之间不同的利益需求,尤其是对政策受众的生存性利益与发展性利益、局部利益与整体利益、当前利益与未来利益的差异和对比进行价值思考和政策衡量,形成政策受众利益调整的制度供给框架,是实现教育政策精准性最终达成的关键所在。首先,规制利益秩序。任何教育政策都是通过对教育利益的调整和分配达成新的教育利益结构和教育秩序,一方面教育政策通过利益的增减实现对教育实际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这种利益调整和分配又要求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体现出主体上的均衡性、互动上的规则性和行动上的可预测性。因为即便对于同一个教育政策,不同层次和类型的教育政策受众都不可能完全一致的利益倾向和行动逻辑,为了谋求和实现他们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政策制定者与执行者、政策执行者与政策受众以及不同政策受众之间都会产生利益上的冲突与争夺。所以,要将不同政策受众的利益需求和诉求表达框定在一定的制度范围内,确定教育利益调整的规则,每一个政策受众的利益诉求在其中都能得到充分表达、澄清和尊重,使教育政策利益的调整和分配变得有序、有规、可预测。只有这样,教育政策的精准推进才更可能成为一种集体行动。其次,满足利益分层。对教育政策待分配利益的争夺是很难超越的,这就需要我们明晰利益分配的价值标准和工作重点。要从国家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的高度去思考和谋划教育政策利益的调整和分配格局,瞄准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难点问题,补短板、强弱项,做好底部攻坚,优先解决好发展中的生存性问题;同时,协同教育事业发展中的弱项与强项、短板与优长,不能削峰填谷,稀释教育发展的整体质量,拉低教育发展的速度,要通过“放管服”等措施落实赋权增能,充分发挥发达地区、优势教育类型等在教育问题解决和体制机制创新等方面的示范和引领作用。最后,引领利益期待。政策受众的利益需求不仅需要被满足,更需要被引领和创造。教育政策不应总走在教育实践的后

面进行问题应急式的回应,教育政策更应具有前瞻性,根据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未来趋势,引领和创造新的政策利益需求,形成新的价值共识。只有向前看,走在前,教育政策的精准性才更具未来感和预测性,才能更经得住历史和时间的考验。

参考文献:

- [1] 王春城. 政策精准性与精准性政策——“精准时代”的一个重要公共政策走向 [J]. 中国行政管理, 2018 (1): 51-57.
- [2] [4] 陈学飞. 教育政策研究基础 [M]. 北京: 人民教育出版社, 2011: 47. 139.
- [3] 李明. 受众视角下的公共政策执行及其效果——基于中国村民村委会选举参与的分析 [J]. 学术月刊, 2016 (7): 45-58.
- [5] 希尔, 休普. 执行公共政策 [M]. 黄健荣,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1: 13.
- [6] 王春城. 公共政策客体层次论及其对政策绩效评估的规定 [J]. 江苏社会科学, 2019 (1): 104-113.
- [7] 张玉强. 对目标群体政策客体地位批判与主体地位的构建 [J]. 中共宁波市委党校学报, 2013 (4): 43-46.
- [8] 宁骝. 公共政策学 [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3: 234.
- [9] 世界银行. 2017 年世界发展报告: 治理与法律 [M]. 胡光宇, 赵冰, 译.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8: 8.
- [10] 谢明. 公共政策导论 [M]. 4 版.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15: 241.
- [11] 李棉管. 技术难题、政治过程与文化结果——“瞄准偏差”的三种研究视角及其对中国“精准扶贫”的启示 [J]. 社会学研究, 2017 (1): 217-241, 246.
- [12] 杨志军, 靳永翥. “凝闭型”政策体制下地方治理的现代化——以公共事件的地方治理为视角 [J]. 吉首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4 (6): 46-54.

[13] 吴逊, 饶墨仕, 豪利特. 公共政策过程: 制定、实施与管理 [M]. 叶林, 等译. 上海: 格致出版社和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6: 26.

[14] 金太军, 钱再见, 张方华, 等. 公共政策执行梗阻与消解 [M]. 广州: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05: 212.

[15] 汤森, 沃马克. 中国政治 [M]. 董方, 顾速, 译.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5: 175.

[16] 高景柱. 超越平等的资源主义与福利

主义分析路径: 基于阿玛蒂亚·森的可行能力平等的分析 [J]. 人文杂志, 2013 (1): 26-39.

[17] 胡红霞, 杨家莲. 公共政策分析模型分类重构研究 [J]. 云南行政学院学报, 2012 (1): 56-68.

[18] 吴春梅, 翟军亮. 可行能力匮乏与协商民主中的政治贫困 [J]. 前沿, 2010 (19): 13-17.

(责任编辑 刘 红)

Analysis of Policy Target Audienc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ccuracy of Educational Policy

Qu Zhengwei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target audience, it should be an important way to study the accuracy of education policy. Giving full play to the dominant position and dynamic role of policy audience and paying attention to the problem-solving and interest adjustment of policy audience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education policy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ensuring the scientificity of education policy agenda setting scientifically, the faithfulness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 and the comprehensiveness of policy performance evaluation, and improving the accuracy of education policy. However, in practice, there are technical difficulties in accurately targeting the policy audience, lack of participation opportunities for the policy audience, differences in feasible abilities and other reasons, which makes the promotion effect of the policy audience on the accuracy of education policy limited. Therefore, in order to examine and redesign the education policy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olicy audience, we need to make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from many aspects, such as changing policy cognition, accurate targeting, strengthening the ability of the system and optimizing interest adjustment.

Key words: Education policy; Precision; Policy target audience; Targeting mechanism; Feasible ability

组织公平感何以影响大学教师组织公民行为?

——组织信任的中介作用

迟景明 何志程 陈晓光

(大连理工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24)

摘要: 公平的组织环境能够激发教师的积极情感, 并进一步促进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以大学教师为研究对象, 引入中介变量组织信任, 构建大学情境下组织公平感与组织公民行为的研究模型, 探索组织公平对教师行为的影响机制。研究发现, 组织公平感对大学教师组织公民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组织信任在二者之间起中介作用。但是, 具体到各变量的二级维度, 又呈现差异化效应: 在利学校行为和个体主动行为方面, 程序公平感比分配公平感有更强的解释力; 而在助人行为方面, 分配公平感却比程序公平感有更强的解释力。组织信任在程序公平感与利学校行为、助人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而在其他各维度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大学应从资源分配、沟通机制、微观层面的行为三个方面完善治理机制, 为大学教师创造一个公平的组织环境。

关键词: 大学教师; 组织公平感; 组织信任; 组织公民行为

中图分类号: G645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7-0064-12

教师作为大学主体和第一资源, 其行为关乎教育教学质量和科研质量以及大学组织效能。组织公民行为是一种遵从内心驱动、未被正式奖惩体系确认但对组织有益的行为。^[1] 自愿、未被正式奖惩体系确认、有益于组织效能提升是组织公民行为的基本特征。大学教师组织公民行为是指大学教师自发地表现出的一种未被正式奖惩体系确认、能够维持和改善学校的组织环境、有利于大学效能提升的行为。它对形成良好的校园文化、维护人际和谐、增强教师对学校的认同和归属感以及提高学校的社会声誉

有着积极的作用。^[2] 大学教师职业特殊性决定了大学教师行为需要更多地遵从内心驱动, 而不是受更多的外在规范制约。教育的基本规律和知识生产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大学教师职业需要更多的自主性和时间弹性去进行科学研究和教学工作。而组织公民行为是遵从内心的积极行为, 与教师自主工作相辅相成, 是教师情感和责任的行为表现。因此, 组织公民行为对大学和教师都有重要的意义, 大学也需要更多关注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

如何激发大学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 组织

收稿日期: 2021-05-28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产学研协同创新生态系统演化及治理研究”(18BGL271)

作者简介: 迟景明, 男, 教授, 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 主要从事组织管理与创新管理研究; 何志程, 男, 大连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博士研究生, 主要从事组织行为和教育管理研究; 陈晓光, 男,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部编辑, 主要从事大学治理与教育管理研究。

公平感是预测组织公民行为的重要变量。组织公平感是对管理行为的伦理和道德地位的个人评价,^[8] 强调的是一种符合外在道德标准和内在期望的主观感受。具体情境中,组织公平感是个体在组织中所体验到的与个人利益相关的决策、制度和相关措施等的公平感受,^[9] 涉及资源分配的过程和结果两个方面。大学教师组织公平感是指大学教师对学校资源分配过程与结果公平性的个人评价。已有研究表明,公平的组织场景更有利于个体组织公民行为的产生^[5],组织公平显著影响组织公民行为。^[6] 关于组织公平与教师组织公民行为关系,潘孝富等人研究发现,程序公平能够正向预测教师组织公民行为。^[7]

组织公平感如何影响大学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组织公平能够提升成员的认知水平和行为质量,改善成员与组织的关系。^[8] 进言之,组织公平对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路径是通过影响个体的情感认知进一步影响组织公民行为。而组织信任作为情感态度变量,是教师与大学之间社会交换关系的桥梁。信任的本质是信任者对被信任者行为的一种心理预期,当一方认为另一方具有好的意图或正面预期的行为时,就会愿意承担一定的不确定性所带来的风险,从而产生信任关系。^[9] 有研究将组织信任定义为成员之间互动产生的信任和成员对组织整体的信任。^[10] 大学教师组织信任是指教师对所在学校、领导以及同事之间的一种正面的心理预期,并愿意承担这种心理预期产生的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已有研究证明,组织公平对大学教师组织信任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11],而组织信任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也有着显著关系^[12]。也就是说,大学组织公平实践对于大学教师来说是一种正面的预期的行为,会增加教师对大学的信任水平和行为质量。

综上所述,探寻组织公平感与大学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然而,学界对于组织公平、组织公民行为在大学中的应用及相关机理的研究关注度不够,需要进一步探索。为此,文章基于公平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研究组织公平感对大学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机制,并引入认知因素即组织信任,

探讨其在这个过程中中的作用。

一、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和公平理论,公平的组织环境有利于唤起成员的积极情感认知,从而促进成员组织公民行为的发生。而不公平的组织环境说明成员的利益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障,会引发成员消极的情绪反应,从而减少组织公民行为的发生。当组织公平对待、尊重和关心成员时,成员就可能产生正面的认知和积极的情感,并基于互惠性原则回报类似的行为。从社会交换角度来看,如果教师在资源分配上被公平对待,他们会感到自己的付出得到了回报,他们就会作出积极有益于组织的行为来回应。^[13] 进言之,教师与大学之间这一交换过程沿着“感知—态度—行为”的逻辑路径进行,具体可解释为:教师对大学管理行为进行主观价值判断形成公平感知,而公平的感知会促使教师对学校有一个情感态度生成,在此基础上教师会表现出相应的行为。

(一) 组织公平感与大学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

关于组织公平感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可以通过公平理论与社会交换理论来解释。基于公平理论,不公平的待遇会引起个体的不适感,这会促使个体改变其态度行为来缓解这种不适感。^[14] 换言之,当个体被组织公平对待,会产生积极的组织公民行为以回报组织,反之,则会产生消极行为以应对不公平。从社会交换理论来看,人们之所以追求公平,是因为人作为“社会人”,在社会生活中需要一定的人际合作,在这个基础上,个人付出时间、精力和劳动,通过社会交换,获得相应的经济利益和社会情感利益。^[15] 教师与大学之间存在着社会交换关系,可以说,教师和大学通过社会交换来进行互动进而实现价值共生,这种个体与组织、与其他个体的互动共生表现为以利学校行为、主动行为和助人行为为基本特征的对学校积极有益的行为。在社会交换的过程中,如果教师感受到资源分配程序或者结果不公平,其工作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就会受到挫伤,就很有可能选择中断交换关系,以期平衡内心紧张的心理状态。如果教师在学校资源分配过程和结果上感受到自己被尊重和公平对待,并获得所期望的资源,那么会有可能表现出对学校积极有益的组织公民行为,包括利学校行为、主动行为和助人行为。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1: 组织公平感对大学教师组织公民行为有正向影响作用。

H1-1a: 分配公平感对利学校行为有正向影响作用。

H1-1b: 分配公平感对助人行为有正向影响作用。

H1-1c: 分配公平感对个体主动行为有正向影响作用。

H1-2a: 程序公平感对利学校行为有正向影响作用。

H1-2b: 程序公平感对助人行为有正向影响作用。

H1-2c: 程序公平感对个体主动行为有正向影响作用。

(二) 组织公平感与大学教师组织信任的关系

组织信任实质是成员对组织整体及其内部成员认知的一种积极的心理状态。目前,大多数研究信任的前因变量,均建立在被信任者的特性上,而从组织公平视角探讨个人感知对信任的形成,对于组织场景建设有着积极的意义。已有研究发现,信任是通过对公平的感知而产生的,如果感到公平,就容易产生信任的心理状态;反之,会产生不信任的心理状态。^[16]从组织公平的具体维度来说,分配公平和程序公平都会对组织信任产生影响,相对来说,程序公平比分配公平对组织信任的解释力更强。^[17]在教师与大学交换过程中,教师对大学的管理行为会有自己的体验和认知,如果认为学校资源分配的过程和结果符合其预期,那么会对学校抱有积极正面的期待,并对学校产生信任的心理状态。大学客观公平地对待大学教师,可强化教师的自我价值,让教师感到自己的权利和尊严被尊重,使其对双方的关系产生信心,产生

信任关系。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2: 组织公平感对大学教师组织信任有正向影响作用。

H2-1a: 分配公平感对组织信任有正向影响作用。

H2-2a: 程序公平感对组织信任有正向影响作用。

(三) 组织信任与大学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

组织信任与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关系是社会交换关系的一种体现。当成员与组织之间建立起信任,就会对组织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个人就比较容易表现出组织公民行为,如积极努力、维护好人际关系、关心组织的发展等。换言之,信任能增加成员对组织不确定性的承担,减少成员与领导之间的隔阂,增加成员的积极行为表现。有研究认为信任是成员产生组织公民行为的基础。^[18]只有当信任存在时,大学教师才能充分合作,且愿意在不确定的情境之下,对学校保持正面积极的信念,并承担相信所带来的风险,表现出主动行为、有益于他人和学校的行为。已有研究发现,组织信任对教师组织公民行为有着显著的影响,并且对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不同维度有着差异化影响。其中,组织信任对教师利他行为的影响效应最高。^[19]基于此,本文认为在大学情境下,教师与学校之间一旦建立信任关系,教师就会较容易产生组织公民行为,降低学校的管理成本,促进学校的发展。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设。

H3: 组织信任对大学教师组织公民行为有正向影响作用。

H3-1a: 组织信任对利学校行为有正向影响作用。

H3-1b: 组织信任对助人行为有正向影响作用。

H3-1c: 组织信任对个体主动行为有正向影响作用。

(四) 组织信任的中介作用

信任包含认知和情感的维度,在社会关系中,信任产生的过程是认知判断和情感生成的过程。从教师视角来看,组织信任的产生过程

与大学教师对组织公平感知过程紧密相连。大学教师通过对大学管理行为判断形成对大学公平的整体印象，进而形成教师对大学的认知并产生相应的情感，而积极的情感认知会进一步促使教师作出积极组织行为。可以说，大学与教师之间的关系通过社会交换来实现。在交换过程中，大学资源分配过程及结果的公平性让教师形成自己对组织的主观感知，基于主观感知形成主观认知评价，主观评价进一步影响教师的行为表达。这一过程实质上可以分为三步：第一步，教师对大学管理行为的主观感知，形成初步的公平判断；第二步，基于主观的公平价值判断形成情感认知——组织信任；第三步，在情感认知的基础上进而发生积极组织行为予以回应。如果大学与教师之间这种交换关系是良性互动的，会促使组织与成员之间更多的交换关系发生，并形成一种价值共生的局面；反之，如果这种交换关系是恶性的，那么交换关系往往会中止。而决定这种交换关系能否继续的是教师的主观心理状态，这种主观心理状态所呈现的是对大学行为方式的接受或拒绝，发挥着从大学行为方式到教师行为方式的中介作用。由此，当大学教师感知到被客观公正地对待时，会感到被尊重，对大学产生信任的状态，一旦信任关系产生，就会为大学承担更多的可能性，作出有益于大学的行为。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H4：组织信任在组织公平感与大学教师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H4-1a：组织信任在分配公平感与利学校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H4-1b：组织信任在分配公平感与助人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H4-1c：组织信任在分配公平感与个体主动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H4-2a：组织信任在程序公平感与利学校行

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H4-2b：组织信任在程序公平感与助人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H4-2c：组织信任在程序公平感与个体主动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

根据社会交换理论，教师与大学的关系是建立在组织信任的基础上，以大学的行为表达和教师的认知情感、行为表现为交换物形成的长期社会交换关系。而组织公民行为是一种自我驱动的积极行为，其产生取决于个体的心理认知，^[20] 而心理认知与组织情境因素密切相关，这是组织公民行为产生的逻辑路径，即（情境因素）感知—（心理认知）态度—行为。根据以上各个变量之间的理论分析，结合“感知—态度—行为”的逻辑路径，本研究提出以下研究模型，如图 1 所示，模型主要包括三大模块的变量关系：第一，组织公平感两个维度对组织信任的作用路径；第二，组织信任对组织公民行为三个维度的作用路径；第三，组织公平感两个维度对组织公民行为三个维度的作用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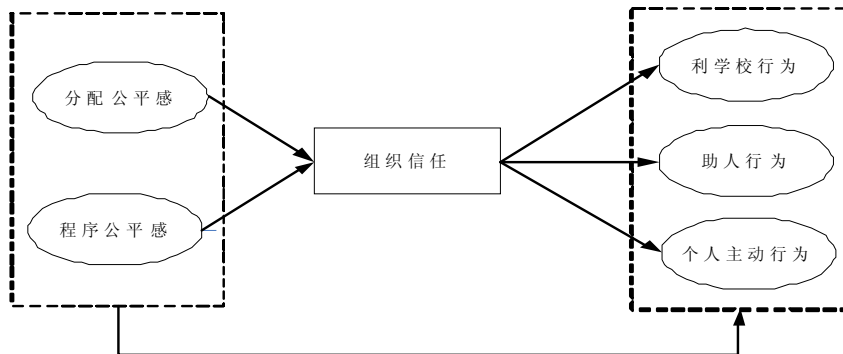


图 1 研究模型

二、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与数据来源

本研究调查对象是大学教师，发放问卷 663 份，剔除无效问卷后，得到有效问卷 503 份，有效回收率为 75.9%。有效样本的基本状况如下：

性别上, 男性占 51.1%, 女性占 48.9%; 工作年限上, 1—5 年占 33.8%, 6—10 年占 26.0%, 11—15 年占 19.5%, 16 年以上占 20.7%; 专业技术职称上, 助教和实习研究员占 6.6%, 讲师和助理研究员占 44.1%, 副教授和副研究员占 30.2%, 教授和研究员占 11.5%, 其他占 7.6%; 办学层次上, 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教师占 18.7%, 世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教师占 11.5%, 非“双一流”高校教师占 69.8%。

(二) 变量与测量

采用李克特 5 级量表的形式, 得分越高, 表明受访者对此题项的表述越持肯定态度。本研究核心变量为组织公平感、组织信任和组织公民行为; 控制变量为性别、工作年限、专业技术职称、办学层次。

1. 组织公平感^①

本研究用分配公平感和程序公平感两个维度对组织公平感进行测量。分配公平感是指教师依据一定的标准对分配的最终结果作出的评价。程序公平感是指教师对分配过程是否公正的主观评价, 关注的是决策过程和分配过程而非结果。借鉴 Gropanzano 等人的量表, 结合大学组织特点和教师职业特点编制组织公平感量表, 题项如与其他同事的工作表现相比, 我的薪酬是公平的; 学校允许教师对分配决策提出质疑或申诉, 等等。

2. 组织信任

本研究用学校信任、领导信任和同事信任三个维度来测量组织信任。量表借鉴 Nyhan 等人编制的量表修改而成, 题项如我跟直接领导能够自在地表达观点和分享感受; 我与同事之

间愿意分享彼此工作生活中的困惑和喜悦; 我在学校工作是有保障的, 等等。

3. 组织公民行为

本研究用利学校行为、助人行为和个体主动行为三个维度来测量组织公民行为。利学校行为是指向学校的行为, 包含维护学校形象、参与集体活动内容。助人行为是指向他人的行为, 包含帮助同事、帮助学生等内容。个体主动行为是指向个人的行为, 包含积极主动、承担额外工作等内容。量表借鉴 Farh 等人编制的以中国文化为背景的组织公民行为量表改编而成, 题项如我会义务宣传和介绍学校的优点、维护学校的形象; 我会主动帮助同事解决工作上的问题; 我会主动承担有挑战性的或新的工作, 等等。

三、实证研究结果及分析

(一) 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 Harman 单因子法检验共同方差。因子分析时, 提取的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贡献率小于 40%, 表明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本研究得到未旋转时第一个主成分贡献率为 30.882%, 小于 40%, 表明本次问卷调查不存在显著共同方差问题。

(二)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检验

本文用 Cronbach's α 系数法检验量表的信度。若 Cronbach's α 值大于 0.7 以上表示信度可靠, 具有较好的内部一致性。验证性因子进行聚合效度检验时, 一般要求因子载荷大于 0.6, 组合信度 CR 值大于 0.7, 平均方差抽取值 AVE

表 1 量表的信度和效度

变量	Cronbach's α	标准化因子载荷	题项数	CR 值	AVE
分配公平感	0.872	0.672—0.786	5	0.867	0.566
程序公平感	0.860	0.706—0.820	4	0.857	0.601
组织信任	0.868	0.640—0.872	12	0.863	0.678
利学校行为	0.839	0.640—0.858	5	0.860	0.554
助人行为	0.844	0.666—0.840	5	0.849	0.531
个体主动行为	0.814	0.698—0.798	4	0.840	0.568

大于 0.5, 表明量表聚合效度良好。在区分效度的判别上, AVE 平方根大于各潜变量相关系数的绝对值, 表明量表区分效度良好。^[21]

从表 1 所示的结果可以看出, 分配公平感、程序公平感、组织信任和利学校行为、助人行为及个体主动行为的 Cronbach's α 值均大于 0.7, 说明量表具有内部的一致性, 其测量题项具有一致性与稳定性。在效度分析上, 首先, 组织公平感、组织信任和利学校行为的测量题项, 在参考国内外成熟量表的基础上, 经过专家意见和预试修正后完成, 这保障了本研究量表的内容效度。其次, 表 1 中, 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载荷大于 0.6, CR 值大于 0.7, AVE 值大于 0.5, 表明量表具有良好的聚合效度。

另外, 由表 2 可以看出, 对角线处各因子 AVE 平方根均大于潜变量的相关系数的绝对值, 表明量表区分效度良好。^[22]

(三) 假设检验

本文运用层级回归对研究假设进行验证, 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3、表 4、表 5 所示。为了检验假设, 本研究以个体主动行为、助人行为和利学校行为为因变量, 依次引入控制变量、分配公平感、程序公平感、组织信任为自变量建立回归模型。

1. 组织公平感对组织公民行为影响作用检验

第一, 如表 3 所示, 模型 4、模型 5 是对分配公平感与个体主动行为之间的直接效应检验。回归结果表明, 分配公平感对个体主动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beta=0.224, p<0.001$)。由此, 假设 H1-1c 得到验证。模型 4、模型 6 是对程序公

平感与个体主动行为之间的直接效应检验, 回归结果显示, 程序公平感对个体主动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beta=0.252, p<0.001$)。由此, 假设 H1-2c 得到验证。

第二, 如表 4 所示, 模型 10、模型 11 是对分配公平感与助人行为之间的直接效应的检验, 回归结果表明分配公平感对助人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beta=0.198, p<0.001$)。由此, 假设 H1-1b 得到验证。同样, 模型 10、模型 12 是对程序公平感与助人行为之间的直接效应检验, 回归结果显示, 程序公平感对助人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beta=0.167, p<0.001$)。由此, 假设 H1-2b 得到验证。

第三, 如表 5 所示, 模型 16、模型 17 是对分配公平感与利学校行为之间的直接效应的检验, 回归结果显示, 分配公平感对利学校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beta=0.425, p<0.001$)。由此, 假设 H1-1a 得到验证。模型 16、模型 18 是对程序公平感与利学校行为之间的直接效应的检验, 回归结果表明, 程序公平感对利学校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 ($\beta=0.477, p<0.001$)。由此, 假设 H1-2a 得到验证。

2. 组织公平感对组织信任影响作用检验

如表 3 所示, 模型 1 分别与模型 2、模型 3 是对分配公平感、程序公平感与组织信任之间的直接效应的检验。回归结果表明, 分配公平感对组织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 ($\beta=0.6, p<0.001$), 假设 H2-1a 得到验证; 程序公平感对组织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 ($\beta=0.623, p<0.001$), 假设 H2-2a 得到验证。

表 2 潜变量相关系数与 AVE 的平方根

	分配公平感	程序公平感	利学校行为	助人行为	个体主动行为	组织信任
分配公平感	0.752					
程序公平感	0.692**	0.775				
利学校行为	0.400**	0.456**	0.743			
助人行为	0.160**	0.168**	0.492**	0.729		
个体主动行为	0.204**	0.245**	0.466**	0.546**	0.754	
组织信任	0.569**	0.610**	0.638**	0.404**	0.457**	0.823

注: N=503, 对角线上的数字是各因子 AVE 平方根; ** 表示 p 在 0.01 水平显著, * 表示 p 在 0.05 水平显著

表3 组织信任、个体主动行为回归分析结果

	组织信任			个体主动行为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性别	0.085	0.085	0.049	0.077	0.077	0.063	0.039	0.035	0.039
工作年限	0.026	0.044	0.085	0.204	0.21	0.228	0.192	0.188	0.186
职称	-0.009	-0.025	-0.029	-0.071	-0.077	-0.079	-0.067	-0.065	-0.065
办学层次	-0.040	-0.001	-0.025	0.006	0.02	0.012	0.024	0.021	0.024
分配公平感		0.6***			0.224***			-0.074	
程序公平感			0.623***			0.252***			-0.049
组织信任							0.453***	0.497***	0.483***
R ²	0.009	0.366	0.392	0.044	0.094	0.106	0.247	0.25	0.248
ΔR ²		0.358	0.383		0.05	0.063	0.203	0.206	0.204

注: ***表示 p 在 0.001 水平显著, **表示 p 在 0.01 水平显著, *表示 p 在 0.05 水平显著, 以下相同

表4 助人行为回归分析结果

	助人行为					
	模型 10	模型 11	模型 12	模型 13	模型 14	模型 15
性别	0.089	0.089	0.079	0.055	0.052	0.056
工作年限	0.168**	0.174**	0.184	0.158**	0.155**	0.143
职称	-0.135	-0.14	-0.14	-0.131	-0.129	-0.126
办学层次	-0.013		-0.009	0.003	0.001	0.003
分配公平感		0.198***			-0.064	
程序公平感			0.167***			-0.131*
组织信任				0.397***	0.436***	0.478***
R ²	0.039	0.078	0.066	0.195	0.198	0.206
ΔR ²		0.039	0.028	0.157	0.159	0.167

表5 利学校行为回归分析结果

	利学校行为					
	模型 16	模型 17	模型 18	模型 19	模型 20	模型 21
性别	0.113*	0.113*	0.086	0.060	0.063	0.059
工作年限	0.147**	0.159**	0.192***	0.13**	0.133**	0.145***
职称	-0.029	-0.04	-0.044	-0.023	-0.026	-0.028
办学层次	-0.042	-0.015	-0.03	-0.017	-0.014	-0.017
分配公平感		0.425***			0.072	
程序公平感			0.477***			0.136**
组织信任				0.632***	0.589***	0.548***
R ²	0.029	0.209	0.254	0.425	0.428	0.436
ΔR ²		0.18	0.225	0.396	0.399	0.407

3. 组织信任对教师组织公民行为影响作用检验

如表 3 所示, 模型 4、模型 7 是对组织信任与个体主动行为之间的直接效应检验。回归结果表明, 组织信任对个体主动行为有显著影响作用 ($\beta=0.453, p<0.001$), 假设 H3-1c 得到验证; 如表 4 所示, 模型 10、模型 13 是对组织信任与助人行为之间的直接效应的检验, 回归结果表明, 组织信任对助人行为有着显著影响作用 ($\beta=0.397, p<0.001$), 假设 H3-1b 得到验证; 如表 5 所示, 模型 16、模型 19 是对组织信任与利学校行为之间的直接效应检验, 回归结果显示, 组织信任对利学校行为有着显著影响作用 ($\beta=0.632, p<0.001$), 假设 H3-1a 得到验证。

4. 组织信任中介效应的检验

根据 Baron 和 Kenny 的三步法对组织信任进行中介效应检验。^[23] 如表 3、表 4、表 5 所示, 在已证实直接效应的前提下, 引入组织信任后, 组织公平各维度对组织公民行为各维度影响均变小, 说明组织信任的中介效应成立, 假设 H4 成立。此外, 本文采用了 Bootstrap 中介效应检验方法, 进一步证实了组织信任的中介作用, 结果显示, 组织信任在分配公平感与组织公民行为三个维度之间、在程序公平感与个体主动

行为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 直接效应在 95%置信区间包含 0, 中介效应在 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 而组织信任在程序公平感与助人行为、利学校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直接效应和中介效应在 95%置信区间都不包含 0, 见表 6。

四、研究结论与管理启示

(一) 研究结论

1. 组织公平感对大学教师组织公民行为有着正向影响作用

首先, 分配公平感对大学教师组织公民行为三个维度 (利学校行为、助人行为和个体主动行为) 均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作用。资源分配的结果关乎教师的经济利益, 能够直接影响教师的行为表现。依据社会交换理论, 资源分配的结果是教师与大学之间社会交换的产物, 体现着交换的经济理性。如果资源分配的结果是公平的, 那么会激励教师的组织公民行为; 反之, 则会引起教师的消极心理, 甚至会中断教师与大学之间的社会交换关系。而分配公平保障资源分配结果的合理性, 从而维系着教师与大学之间经济交换的正常运行和经济激励。由此, 当教师感受到资源分配结果的公平时, 就

表 6 中介效应路径检验

效应类型	具体路径	效应值	标准误	t 值	p 值	95%置信区间 CI	
						LLCI	LLCI
直接效应	分配公平感-个体主动行为	-0.049	0.335	-1.433	0.152	-0.115	0.018
中介效应	分配公平感-组织信任-个体主动行为	0.200	0.029	-	-	0.145	0.257
直接效应	分配公平感-助人行为	-0.057	0.032	-1.778	0.076	-0.120	0.006
中介效应	分配公平感-组织信任-助人行为	0.167	0.027	-	-	0.117	0.222
直接效应	分配公平感-利学校行为	0.046	0.030	1.544	0.123	-0.013	0.104
中介效应	分配公平感-组织信任-利学校行为	0.244	0.032	-	-	0.183	0.307
直接效应	程序公平感-个体主动行为	-0.019	0.036	-0.534	0.593	-0.091	0.052
中介效应	程序公平感-组织信任-个体主动行为	0.210	0.033	-	-	0.148	0.276
直接效应	程序公平感-助人行为	-0.070	0.034	-2.000	0.042	-0.137	-0.003
中介效应	程序公平感-组织信任-助人行为	0.190	0.030	-	-	0.135	0.251
直接效应	程序公平感-利学校行为	0.092	0.032	2.898	0.004	0.030	0.154
中介效应	程序公平感-组织信任-利学校行为	0.251	0.034	-	-	0.186	0.319

会回应积极组织行为来参与大学的发展。

其次，程序公平感对大学教师组织公民行为三个维度（利学校行为、助人行为和个体主动行为）均有显著正向影响作用。程序公平在保障资源分配的过程中体现了教师与大学的关系。教师是否参与决策，是否了解决策制定背后的原因，决策的制定是否代表着绝大多数教师的利益，这些程序公平与否的背后都体现着教师与学校之间的关系和地位。换言之，程序公平能让教师在社会比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明晰自我概念，感受到被尊重。大学资源分配过程中，能否体现以教师为中心这一理念，能否让教师感受到被尊重，对于大学教师对学校信任和情感有着积极影响，并进一步影响教师的行为表现。

2. 组织公平感对大学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作用有着差异化效应

纵向比较来看，首先，在教师利学校行为和个体主动行为方面，程序公平感（ $\beta=0.477$ ； $\beta=0.252$ ）比分配公平感（ $\beta=0.425$ ； $\beta=0.224$ ）有更强的解释力；其次，在教师助人行为方面，分配公平感（ $\beta=0.198$ ）却比程序公平感（ $\beta=0.167$ ）有更强的解释力。总体来说，大学教师对程序的关注大于对结果的关注。大学教师是一个高知群体，会更理性地看待分配问题，在保障基本生存型资源的基础上，大学教师更关注自己与大学之间的关系、是否受到尊重以及自我价值实现。因此，大学程序公平的表达，能更好地激发教师认同学校，维护学校利益，也能更好地激发教师个体主动性和积极性，这有利于教师工作绩效和学校效能的提升。而分配公平感对助人行为方面解释力强，则说明资源分配结果的公平更有利于教师之间的和谐关系和利他行为。依据公平理论，分配公平是通过社会比较体现的。也就是说，教师将资源分配结果（薪酬、奖金）与其他教师比较，符合自己的期望，则认为是公平的，会形成积极的认知并促进教师助人行为；反之，通过与他人比较，结果不公平，不仅会让教师对学校的管理行为失望，也会对所比较的教师产生不满、妒忌等心理，不利于教师之间的关系和谐。

3. 组织信任在组织公平感与大学教师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着部分和完全两种中介作用

首先，组织信任在组织公平感和教师组织公民行为三个维度以及程序公平感与主动行为之间起着完全中介作用；其次，组织信任在程序公平感与利学校行为、助人行为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完全中介作用的结论说明大学决策和管理的公平性能够影响教师对大学的信任，并进一步影响教师行为表现；而部分中介作用的结论说明从组织公平到组织公民行为之间存在着另外的中介变量，这为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基础。由此，可以看到组织公平感能够有效预测大学教师组织信任并进一步影响教师的行为表现，这回应了“感知—态度—行为”的作用路径。

（二）管理启示

基于研究结论，为提升教师发展管理水平，调动教师参与学校发展的积极性，应着重完善以下三个方面。

1. 保障教师生存型资源，梯度分类建设考核评价体系

从社会交换关系视角来讲，组织公平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给予和获得之间的一种平衡。大学中的组织资源分配，能让教师感觉到自己的付出劳有所得，教师会对组织形成一个主观的肯定的评价，会对大学产生信任关系和表现出高水平的组织公民行为。因此，良好的资源分配机制是组织有效运转的必要条件。一是建立科学合理的奖惩体系。一方面，提高教师的基础薪酬水平，保障教师生存型资源；另一方面，收入分配上按照公平分配的差异原则，在保障岗位基础薪酬的前提下，增加激励型资源分配。二是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评价体系。大学要根据自身特点，逐步完善绩效评价制度，不能被量化指标绑架。绩效评价要采取多元方式，在公平的基础上，既要参考教师水平业绩又要考虑教师的可行能力。

2. 微观视角重视教师民主参与

教师民主参与是大学程序公平的体现，大学应从以往重视“结构”的视角转向重视“行为”的视角，^[24]完善大学内部治理机制，鼓励

教师参与管理和决策。首先,教师民主参与能够有效监督决策制定和制度实施,促进大学的程序公平;其次,教师民主参与可以使其感受到学校的尊重,对公平有直观的感受;最后,教师民主参与能够改善与领导的关系,增加教师对领导以及学校的信任,使学校的管理更有效可行。因此,大学应关注教师民主参与的意愿和个人体验,从教师的实际出发,建立自下而上的反馈机制,让教师在民主参与过程中遇到问题能够及时有效反馈并解决。同时,在制定和实施组织的分配制度、激励制度、晋升制度和考核制度时,应加大教师的参与度。这有利于教师了解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原则和其中的利弊,减少政策推行实施的阻力,提升学校管理的民主性和学校的运行效率。此外,大学还要进一步完善相应的申诉机制和帮扶机制,为教师的权益提供有效保障。

3. 加强数字化沟通和非正式沟通机制建设

有效的沟通是管理的精髓,可以促进良好人际关系的形成,令教师对学校领导、同事产生信任,进一步使教师与同事和睦共事,形成强大的合力,提升组织的效能。沟通的形式可以是正式的,也可以是非正式的。一是要不断完善正式沟通渠道,建立网络和现实中的沟通渠道。数字化时代,大学应加强数字平台建设,提升沟通的效率。同时,要保持线上和线下管理的有效性,采取定时、实时常态化管理服务,及时收集教师的基本情况和意见建议,了解教师的需求,提升教师对学校管理的信任。二是重视非正式的有效沟通。大学教师由于其工作的特殊性,除了专业范围内的沟通,教师与同事、领导之间的沟通缺失必要的途径,这会影响到教师之间的信任和教师对领导和学校的信任。而非正式沟通往往是打开信任之门的钥匙,要提高教师之间非正式沟通的意识和拓展非正式沟通的方式,特别是大学的管理者,更应该开发多元的非正式沟通渠道,在与教师之间轻松愉快的聊天中了解教师的困惑与所需,这些有助于提升教师工作的人际环境,也有助于提升教师对学校的信任。

综上,基于大学情境,本文研究了组织公

平感与大学教师组织公民行为之间的影响机制。组织公平感能够有效预测教师组织公民行为,并且通过组织信任来影响教师组织公民行为。具体来说,首先,分配公平感、程序公平感能够正向影响教师的利学校行为、助人行为和主动行为。其次,分配公平感和程序公平感对大学教师组织公民行为存在差异性影响效应。总体来说,教师对于程序公平的关注意要高于分配公平。最后,组织信任在组织公平感与大学教师组织公民行为之间起中介作用。基于此,大学应从组织公平和组织信任建设方面采取措施,以激发教师组织公民行为。在组织公平建设上,一方面,大学要梯度分类建设考核评价,以促进教师分配公平感;另一方面,大学要从微观视角重视民主参与,提升教师的程序公平感。在组织信任建设方面,大学要加强沟通机制的建设,建立起教师与大学之间的信任关系。

注释:

①囿于篇幅,正文只列出部分题项。

参考文献:

- [1] ORGAN D W. A restatement of the satisfaction-performance hypothesis [J]. *Journal of management*, 1988 (4): 547-557.
- [2] 曹科岩,龙君伟. 教师组织公民行为: 结构与影响因素的研究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07 (1): 87-92.
- [3] CROPANZANO R, BOWEN D E, GILLILAND S W. The management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J]. *Academy of management perspectives*, 2007 (4): 34-48.
- [4] 马超,薛电芳,毛重琳. 组织公平感对离职意图的影响 [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4 (1): 74-82, 158.
- [5] WHITMAN D S, CALEO S, CARPENTER N C, et al. Fairness at the collective level: a meta-analytic examination of the consequences and boundary conditions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climate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2 (4): 776-791.

- [6] FARH J L, EARLEY P C, LIN S C. Impetus for action: a cultural analysis of justice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in Chinese society [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1997 (3): 421-444
- [7] 潘孝富, 谭小宏, 秦启文, 等. 教师组织公平感与组织公民行为: 工作倦怠的中介作用 [J]. *心理发展与教育*, 2010 (4): 409-415, 444.
- [8] 孙东山. 从“群体正义”到“个体正义”: 组织公平转向的实践逻辑 [J]. *清华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 182-190, 212.
- [9] LI P P. Towards an interdisciplinary conceptualization of trust: a typological approach [J]. *Management and organization review*, 2010 (3): 421-445.
- [10] NYHAN R C, MARLOWE J R, HERBERT A. Development and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organizational trust inventory [J]. *Evaluation review*, 1997 (5): 614-635.
- [11] BIDARIAN S, JAFARI P.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nd organizational trust [J]. *Procedia-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s*, 2012, (1): 1622-1626.
- [12] DIRKS K T, FERRIN D L. Trust in leadership: meta-analytic findings and implications for research and practice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02 (4): 611-628.
- [13] COLQUITT J A, LEPINE J A, PICCOLO R F, et al. Explaining the justice-performance relationship: trust as exchange deepener or trust as uncertainty reducer? [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2012 (1): 1-15.
- [14] ADAMS J S. Inequity in social exchange [J]. *Advances in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 1965 (4): 267-299.
- [15] GREENBERG J. *Advances in organizational justice* [M].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19-151.
- [16] PEARCE J L, BIGLEY G A, BRANYICZKI I. Procedural justice as modernism: placing industrial/organisational psychology in context [J]. *Applied psychology*, 1998 (3): 371-396.
- [17] ELOVAINIO M, LINNA A, VIRTANEN M, et al. Perceived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s a predictor of long-term sickness absence due to diagnosed mental disorders: results from the prospective longitudinal Finnish public sector study [J]. *Social science and medicine*, 2013, 91: 39-47.
- [18] DELUGA R J. Supervisor trust building, leader member exchange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ur [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1994 (4): 315-326.
- [19] 李金泉, 张正平, 许育玮, 等. 中学校长真诚领导与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关系——以教师信任为调节变项 [J]. *教师发展研究*, 2018 (2): 31-38.
- [20] 吴娱. 分布式领导对大学教师组织公民行为的影响——以态度因素为中介 [J]. *教师教育研究*, 2020 (1): 69-77.
- [21] FORNELL C, LARCKER D F. Evaluating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 with unobservable variables and measurement error [J]. *Journal of marketing research*, 1981 (2): 337-346.
- [22] 何伟怡, 张婷婷. 核心企业领导风格与弱稳定性的工程供应链信息共享: 关系质量的中介作用 [J]. *南开管理评论*, 2020 (1): 107-117.
- [23] 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 [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99 (6): 1173-1182.
- [24] 刘爱生. 为什么我国大学教师不太愿意参与治校——基于组织公民行为理论的探讨 [J]. *高教探索*, 2020 (2): 30-35.

(责任编辑 吴潇剑)

How Does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ffect the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f University Teachers? —Medi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Trust

Chi Jingming He Zhicheng Chen Xiaoguang

Abstract: A fair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can stimulate teachers' positive emotions and further promote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Taking university teachers as the research object, this paper introduces the intermediary variable organizational trust, constructs the research model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nd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in university context, and explores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on teachers' behavior. It is found that organizational justice has a significant positive impact on university teachers'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and organizational trust plays an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them. However, specific to the secondary dimension of each variable, it shows differentiation effect: In terms of school behavior and individual initiative behavior, the sense of procedural justice has stronger explanatory power than the sense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In terms of helping behavior, the sense of distributive justice has stronger explanatory power than the sense of procedural justice. Organizational trust plays a partial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the sense of procedural fairness and the behavior of benefiting schools and helping others, while it plays a complete intermediary role between other dimensions. Universities should improve the governance mechanism from three aspects: resource allocation, communication mechanism and micro-level behavior, so as to create a fair organizational environment for university teachers.

Key words: University teachers; Sense of organizational justice; Organizational trust;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新发展格局下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机遇、挑战与对策

李秀坤¹ 尹西明²

(1.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 北京 102617;

2. 北京理工大学, 北京 100081)

摘要: 新发展格局的本质特征是实现更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研究型高校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 是构建新发展格局进而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党的十八大以来,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取得一系列突破性进展; 与此同时, 新发展阶段对其提出了新要求、带来了新机遇。立足构建新发展格局与科技强国建设, 批判性梳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挑战, 并针对性提出新发展阶段建设中国特色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生态系统, 加快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进而构建新发展格局和塑造发展新优势的路径与对策建议。

关键词: 新发展格局; 高质量发展; 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创新

中图分类号: G64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7-0076-08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和“十四五”发展规划提出要“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下, 我国经济呈现出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经济结构优化升级、从要素和投资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等发展特征。我国经济发展由注重速度向注重质量转变, 这样的发展要求与新古典增长理论中将经济发展的源泉归因于技术进步的论述相一致。^[1] 在当下中国, 创新资源如科研人才、设备、经费等大量集中在高校尤其是高水平的研究型大学, 推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无疑是释放高校创新成果的社会经济价值、促进产业技术进步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路径。2021年4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清华大学时指出, “一流大学是基础研究的主力军

和重大科技突破的策源地, 要完善以健康学术生态为基础、以有效学术治理为保障、以产生一流学术成果和培养一流人才为目标的大学创新体系, 勇于攻克‘卡脖子’的关键核心技术, 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 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更凸显了充分认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新机遇、认清新挑战和探究深入推进科技成果转化对策、提升成果转化成效对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意义。

一、新发展格局下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新机遇

新发展格局下, 我国在新型国家创新体系的设计中更加注重科技与经济深度融合, 明确

收稿日期: 2021-02-10

基金项目: 北京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研究”(21LLGLA002)

作者简介: 李秀坤, 男, 助理研究员,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进修部, 主要从事科技政策与创新管理研究; 尹西明(通讯作者), 男, 助理教授, 北京理工大学管理与经济学院, 主要从事创新管理与可持续发展研究。

强调要围绕产业链布局和完善创新链，保障产业安全。换言之，新发展阶段，我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内外部形势发生了新变化，由此产生了新的发展机遇。

1.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相关制度有突破

高校科技成果属职务发明的所有权归国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修订版实施前，其使用权、处置权和收益权（“三权”）都由对应的主管部门决定，审批流程长，反应速度慢，难以满足市场对时效性的要求。2015年10月1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正式颁布实施，“三权”正式下放至高校，极大激发了高校转化科技成果的活力。2020年5月18日，科技部会同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其他八部门联合印发《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实施方案》，从“三权”下放到“所有权”改革，产权制度改革可谓力度空前；并建立了科技成果转化尽职免责机制^①。随后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对部分技术合同条款做了适当修改，区分了技术转让和技术许可，将原来的“四技合同”变成了“五技合同”。同时，不少地方也都在陆续出台技术市场条例。以上法规、政策组合基本突破了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体制机制障碍，为进一步推进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制度性保障。

2. 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管理体系不断完善

目前，我国的科技成果转化管理体系已初步形成了国家、省、市、县四级网络体系，截至2019年年底，我国已建立技术市场管理机构1000多个，技术合同登记机构约1100多个（其中县级登记机构200个），技术合同登记员1800余人，技术市场从业人员50万人；国家技术转移示范机构453家，国家技术转移区域中心11家，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示范区10家，创新驿站92家。^②实践中，我国高校基本都设有负责研发、知识产权、成果转化的管理机构，一般为科学技术研究院、科技处、科技开发部或科技成果与知识产权管理办公室等。基本制度和管理能力的建设，为新发展阶段加快科技成果转化、促进科技经济深度融合提供了基础

保障。

3. 高校科研人员参与成果转化的动力显著提高

科技成果转化激励得到切实保障，科研人员参与成果转化的动力明显提高。一是推行“现金+持股”的成果转化收益分配机制。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国利用财政资金设立的科技项目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其所有权归国家，对职务发明人的物质奖励较低（一般为科研成果净收益的20%），抑制了职务发明人的积极性进而阻碍成果转化。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规定“以转让、许可和作价投资的方式转化职务科技成果的，不低于转让、许可净收入或作价出资获得的股份、出资比例50%作为职务发明人和在科研成果研发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人员的奖励和报酬”，远高于国外对于科研人员30%~40%的分配比例，^③极大提高了技术发明者的收益分配标准。二是切实降低科技成果转化收入税负。2018年，财政部、税务总局和科技部联合发布《关于科技人员取得职务科技成果转化现金奖励有关个人所得税政策的通知》，明确规定“从职务科技成果转化收入中给予科技人员的现金奖励，可减按50%计入科技人员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依法缴纳个人所得税”。三是鼓励科研人员创新创业。2019年，人社部印发《关于进一步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创新创业的指导意见》，对进一步支持和鼓励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创新创业作出了具体部署。随着促进科技成果转化系列政策法规的逐步落实，高校院所科研机构 and 人员参与成果转化的动力显著提高。国际研究也表明，由于高校科技成果往往带有隐性知识，单纯依靠第三方机构进行转化的难度大、周期长，而科研人员的积极参与将会为提高转化速度和质量提供重要人才保障。^④

4.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提供了新的市场需求

高校是科技成果产生的重要源头，终端来自企业创新发展对新知识、新技术的需求。中美贸易战之前，全球化趋势不断加强，国际科技合作与技术转移总体上平稳，中国产业和企

业能够通过开放式创新，以较低成本和较快速度从国外获得创新发展所需要的新知识和新技术，^[5] 相比之下，国内高校的技术供给并不占优势。面对美国对华展开的以科技为核心的全面竞争，以及新冠肺炎疫情对全球经贸和科技合作的全面阻滞，国内企业不得不加大自主创新的力度，对源自高校的高质量科技供给需求日益凸显，^[6] 科技领军企业与高校共建创新联合体的动力也更为强大，从需求牵引的角度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新机遇。

二、新发展格局下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挑战

1. 政策执行推进难、改革措施落地周期长

虽然近年来中国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体制机制障碍取得了重大突破，促进转化的制度和政策框架已基本建立，但具体实践中仍面临着政策执行推进困难、改革措施落地周期长等挑战，集中体现在政出多门导致协调性不足乃至相互冲突、新政策宣传贯彻不足导致政策“真空期”过长和高校自身职能部门之间的协调不足。其中，与高校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相关的不同决策部门所出台的政策协调性不足、文件修订和宣传贯彻不及时，是影响改革政策落地的重要原因。例如，国资属性给科技成果转化带来的隐形体制障碍仍然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国有资产法》对高校科技成果入股造成保值增值压力。保值增值是国资监管的客观要求，虽然国家多个文件明确了尽职免责的相应条款，但很大程度上仍取决于各高校的担当作为意识，总体而言内生动力不足。与此同时，校办产业清理规范政策不够透明和明确，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动力和积极性造成事实上的较大负面影响。

此外，高校自身职能部门之间协同不足。目前，中国高校基本都设有负责研发、技术转移、知识产权的管理机构，但各机构一般由不同的校领导分管，人事关系复杂，工作协同不足，甚至存在多个职能部门“各自为政”和“彼此牵制”的现象，难以适应市场需求和新发

展格局对高校科技创新工作的新要求。

2. 问题驱动型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与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对接不畅

通常认为，普通高校倾向于追求自由开放的学术理念，一般以人才培养和基础研究为核心任务，高校科研也以自由探索为主，对企业的需求关注不足，这种自由探索而非需求驱动的研究传统难以完全满足新发展格局下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需求。在这一传统理念主导下，高校对教师的考核评价往往只看重学术发表而忽视科技成果转化，其常见表现形式包括：能接受的成果转化模式局限在技术许可、专利转让等传统方式，对科技成果拍卖、作价入股和师生共创等新形式关注不足、理解不透更应用不了。在以上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高校科技创新体系与企业技术创新体系往往对接不畅。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讲话中强调，“要加快构建龙头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各创新主体相互协同的创新联合体，发展高效强大的共性技术供给体系，提高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成效”，传统的由问题驱动逻辑主导的高校科技创新体系的转型升级更是迫在眉睫。在实践中，破解该难题的主要方式在于加强高校与市场的对接，通过优化科技创新体制机制，建立学术与市场并重的科研理念，加强科研人员对产业发展的关注与互动。

3. 技术转移机构能力建设和激励机制不能适应成果转化需求

近年来，我国科技服务业快速发展，各地已建立了一定数量的技术市场、技术转移机构、产权交易平台等，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由于信息不对称导致的科研成果“躺在深闺无人识”的现象。^[7] 但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涉及技术开发、法律财务、企业管理、商业谈判等众多专业领域的知识资本化过程，供需信息匹配只是第一步，除此之外还需要具备专业化能力的技术转移机构和团队。从国际经验来看，一流大学普遍建有专门的技术转移机构(TTO)，有数十人组成的技术经理人队伍，在成果转化和校

企合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8] 国内研究也表明, 技术转移中心的市场化能力建设对促进高校与企业需求对接、提升技术转移成效有显著作用。^[9] 然而, 与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不相匹配的是, 我国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和团队的能力建设严重滞后于高校成果转化的实际需求。最后, 对专业化技术转移机构和团队仍然缺乏科学合理和多元化的激励机制, 难以适应新发展格局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对专业化人才和能力建设的新要求。高校的校设机构很难按市场标准吸引、招聘、奖励具有专业化能力的技术经理人。^[10]

4. 中试熟化基地环节支撑能力不足

许多源自高校的科技成果与市场的距离较远, 无法实现工业化生产, 甚至在技术上难以实现。^[11] 这主要是因为从实验室产出的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为实用技术或产品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必须通过中试来验证并解决批量生产过程中的工艺可靠度、质量合格率等问题。而中试风险高、投资大、回报周期长、不确定性高, 高校往往缺乏资金和物理空间, 更缺乏动力去建设中试平台或熟化基地, 而中小企业对技术和工艺没把握不敢中试。这样一来, 从高校实验室生产的科技成果到市场化的产品与服务之间仍然存在“鸿沟”。此外, 由于缺乏有效的引导机制, 社会资本追求“短平快”的现象并未发生根本改变, 中试熟化缺乏资金投入, 不少成果停留在实验室阶段。

5. 面向科技成果转化的科技金融体系亟待健全

金融是科技创新的“血液”, 其对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性早已成学界和业界共识^[12], 围绕产业链布局创新链、资金链和人才链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战略需求^[13]。风险资本的价值不仅仅体现在对转化过程本身的助力上, 更重要的是能否获得风险资本乃至其他社会资本的青睐, 这在某种程度上就意味着该项科技成果是否贴合社会需求、市场需求。一流大学(如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和剑桥大学)均设有校办或控股的风险投资基金, 结合市场需要, 就成果转化过程中的“断裂带”进行引导性投资, 与外部资金共同助推高校科技成果转化跨

越“最后一公里”, 完成价值释放。目前, 我国高校科技成果在跨越“鸿沟”的过程中, 仍缺少持续有效的科技金融支持, 尤其是针对早期项目的风险投资明显不足。科创板、政府母基金等科技金融对成果转化的支持潜力有待发挥, 专门面向成果转化“断裂带”的科技金融支撑体系亟待完善。^[14]

三、新发展格局下加快高校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的对策建议

基于新发展格局下高校科技成果转化面临的新机遇新挑战, 我国应加速构建中国特色新型高校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生态系统。在建设思路方面, 要进一步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优势, 完善高校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相关体制机制, 完善科技评价机制和更加科学的分配与激励机制, 缩短政策落地真空期, 建立执行层面的快速响应机制。高校科技创新体系要以国家科技创新总体战略和整合式创新理论范式为引领, 围绕新发展格局的新要求, 从封闭自主迈向基于自主的开放、协同与整合式创新。社会各界要妥善处理高校科技创新与成果转化过程中多元主体和要素间的关系, 强化成果转化“中间地带”的桥梁支撑能力, 实现成果转化与“双一流”建设的良性互促、整合共创。具体建设路径方面, 需要整合推进五个重点方面的改革创新工作。

1. 发挥新型举国体制优势, 优化科技成果转化的顶层制度设计

一是切实解决政策协调性问题。建议成立国家科技成果转化工作领导小组, 确立部际协同工作机制, 整合相关部门, 研究解决国资监管、知识产权制度改革等涉及多部门的关键制度与法律法规问题; 建议政府部门精减发文频次和篇幅, 尤其减少重复条款, 与此同时着重加大政策宣传和贯彻实施力度。在政策具体执行层面建立快速响应机制, 由各部门具体负责司局或处室负责人组成联合工作组, 针对政策在基层实施过程中的理解偏差、认识分歧进行权威解读和联合发布, 缩减政策落地“真空期”。

二是破解国有资产与科技成果转化的现实矛盾。建议系统梳理《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财政部等部门规章的改革要点，制定出台关于科技成果类国有资产管理的专门法律，建立专门的科技成果类国有资产管理体系，彻底解决长期以来阻碍科技成果转化的思想顾虑和理念问题。具体而言，首先，要简化科技成果类国有资产的管理流程，可按年度、总量对其保值增值进行整体考核，宽容失败；其次，要妥善处理校办企业体制改革与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之间的辩证关系，注重协同推进；最后，要加大对校办产业清理规范政策的宣传与解读力度，研究出台针对科技成果转化企业的政策特区，避免基层单位在执行过程中“一刀切”。

三是引导高校进一步重视科技成果转化工作。教育主管部门要重点抓好完善评价制度等基础改革，坚持以质量、绩效、贡献为核心的评价导向，全面准确反映成果创新水平、转化应用绩效和对社会发展的实际贡献。例如，可将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成效纳入“双一流”建设评价，作为学科评估的重要指标并根据国家战略动态调整；在已有试点基础上，加快推进技术转移研究生学位教育工作，为高校通过高水平成果转化专业人才供给促进自主创新提供制度保障。

2. 重视有组织的科研，建构问题与需求双驱动的新型产学研体系

高校的科研工作需要从传统的问题导向转变为问题和重点需求相结合的综合导向。一是要组建创新团队，平衡好短期功利目标与长期科学目标的关系，促使由教师带学生的科研小组转变为师生与经营管理人才、生产技术人员融合的创新团队。二是促进要素融合，统筹好人才、科技、金融、管理等各种创新要素，从根本上实现科技经济深度融合。这一过程中，高校应将自由探索与有组织的科研有机结合起来，建立研发与成果转化一体化体系。高校发挥学科交叉优势推进前瞻性和基础性研究，实现重大原始创新和引领性成果的突破，一方面从源头提升科技创新质量，另一方面通过需求

导向和市场导向加速“沿途下蛋”式的科技成果转化，为科技自立自强和企业创新能力提升提供源源不断的高质量科技供给。

此外，高校需要创新科技成果转化模式，积极鼓励师生共创，从而全面提升高校学术创业能力与成效。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不是把一项技术卖给某企业，而是要通过多元化的创新活动让技术要素进入企业，服务企业创新成长。实践表明，随着我国“双创”教育的蓬勃发展，基于高校科研成果的创新创业日益成为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的有效方式之一。^[15]普通高等院校的核心任务、使命和比较优势在于培养人才、进行科学研究进而产出原始性创新和高质量科技供给，而实验室的科研成果到市场可用的技术之间通常还有较远的距离，其中粘滞性很强的隐性知识转移较显性知识而言难度更大，无法让对这个领域原本陌生的人在短期内掌握。因此，在新发展阶段，需要进一步加强研究生创新创业教育，鼓励有创业意愿和能力的毕业生，协同社会主体联合创建技术孵化公司，对科技成果进行二次创新并将熟化后的成果转售或推向市场。基于师生和校友共创的科技成果转化模式有望成为普遍的技术要素流通配置方式，全面提升高校学术创业的能力和社会经济成效。

3. 实施技术转移机构专业化能力提升工程，探索新型收益分配机制

一是要实施技术转移机构专业化能力提升工程，全面提升科技成果转化服务能力。首先，要学习科技发达国家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专业机构和团队培育经验，立足中国国情和新发展阶段，借鉴我国在国家技术创新能力工程建设方面的实践经验，实施技术转移机构专业化能力提升工程，强化科技成果转化全过程管理与服务，全面支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新型科技创新生态。其次，需要探索建立面向重要产业、前沿科技成果转化和基于创新的创业跟投机制，允许技术转移机构和技术经理人通过现金投资或提供专业化服务等方式入股成果转化项目，吸引优秀人才从事技术转移。最后，也要扩大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和集聚国际知名技术转移服务机构，面向国内外开展服务和人员培训，

培育熟悉国际技术转移业务规则、专业化、复合型的一流服务人才。参照科技发达国家经验,政府主管的科技成果转化机构和社会化人才猎头机构要建立专门人才资料库,促进全国乃至世界范围内的科技成果转化交流工作。

二是要探索新型收益分配机制,实现科技成果转化过程中的多元主体激励相容和可持续共创。2015年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规定:对职务发明人、在科研成果研发过程中作出重要贡献的人员提高奖励标准,给予不低于转让、许可净收入或作价出资获得的股份、出资比例50%作为奖励和报酬。但实践层面,我国多数高校已将成果转化收益的70%甚至更多给予项目负责人团队,仅为学校、院系和成果转化机构留下不足30%的收益。反观国际上,高校给予成果完成人的收益比例一般在30%~40%之间。由于科研成果在走出实验室之后的转化环节仍然很长,技术和市场风险都很大,如果让成果完成人提取过高比例的收益,则势必会直接影响学校和院系的积极性和资源储备。除此之外,成果转化收益分配不当还会导致学科发展失衡,使基础研究人才进一步流失,从长远来看不利于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因此,简单提高成果完成人的获益比例并非长久之计,高校需要动态优化成果完成人、学校、院系和转化团队之间的成果转化收益比例,形成人才培养、基础研究和重大科技成果转化的良性循环。在此基础上,还可以探索新型收益分配机制,改变片面强调奖励科研人员的政策导向,鼓励将转化收益的部分比例,直接或通过期权方式,奖励给联合实施转化的企业、投资机构,引导社会资本投早、投小,开展中试熟化,跨越科技成果“死亡谷”。

4. 建设完善中试熟化基地平台,打造多元主体融通的新兴研发平台

新发展格局下要想加快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不但需要高校从源头上提高科研成果的质量并建设专业化的技术转移团队,还需要建设和完善公益性与商业性并重的中试熟化基地平台,打造多元主体融通的新型研发平台。一是政府引导探索建立社会资源整合的中试熟化基地平

台,实施以价值共同创造为核心、培育主体产业群,进而形成以产业价值链为延伸的中试服务平台群。二是支持科技领军企业牵头,高校院所支撑,行业上下游企业共建战略联盟式的中试共享基地,开展应用技术开发、中试和规模化生产,形成科技服务链,实施以“共享共创”为核心的产学研用一体化中试平台,探索产业创新共同体模式。三是由高校和地方政府共建研究院式的中试熟化基地和新型研发机构,突破高校物理空间和资金的局限性,优先对高校科研成果进行工程化开发,又可将面向市场和产业前沿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及时有效地反馈给学校,进一步由高校科研工作者回溯和提炼成为科学问题,逆向加快高校基础研究突破。此外,学校还将直接从转化成功的项目中获得收益,反哺从人才培养到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创新闭环”。

5. 围绕创新链优化资本链,完善多层次科技金融服务体系

完善金融支持创新体系是新发展阶段加快科技成果转化的重要环境支撑。一是要切实采取制度创新和政策创新措施,在科创板、创业板等资本市场改革评价体系中纳入对高校科技成果转化的支持性指标,激发社会资本对产学研深度融合、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有力支持。二是要积极鼓励金融机构发展知识产权质押融资、科技保险等科技金融产品,开展科技成果转化贷款风险补偿试点,着力构建以母基金为引领,股权基金、科技众筹、科技保险、科技银行、科技担保、互联网金融等有机结合的多层次科技金融支撑体系。三是要围绕支柱型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对前沿共性技术的需求,打造专业子基金投资链条,以资本链支撑、促进创新链和产业链深度融合,进而整合集聚创新资源,形成跨领域、大协作、高强度的创新基地,持续支持开展产业共性关键技术研发、成果转化及产业化、科技资源共享服务,推动重点领域项目、基地、人才、资金一体化配置,更好发挥产业基金、创业引导基金对支持高校科技成果转化服务科技自立自强的价值。

在此基础上,全面提升国家和区域技术转移平台中资产评估、保险、税收等专业化科技金融服务效能。加快建设概念验证基金、种子基金、引导基金、校企合作基金等高校成果转化金融服务平台,与社会化资本形成协同之势,打造中国特色的多元化、全链条、多层次的科技成果转化金融服务体系,为全面提升国家技术转移体系效能、支持新发展阶段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有力的金融支撑。

注释:

①试点单位领导人员履行勤勉尽职义务,严格执行决策、公示等管理制度,在没有牟取非法利益的前提下,可以免除追究其在科技成果定价、自主决定资产评估以及成果赋权中的相关决策失误责任。

参考文献:

[1] SOLOW R M. A contribution to the theory of economic growth [J].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56 (1): 65-94.

[2] 喻思南. 释放技术市场的巨大能量 [N]. 人民日报, 2020-03-05 (12).

[3] 张胜, 郭英远, 杜焱焱. “拜-杜”法案、权利配置创新与大学职务成果转化——以美国常青藤大学为例 [J]. 科研管理, 2020 (4): 174-183.

[4] CIVERA A, MEOLI M, VISMARA S. Engagement of academics in university technology transfer: opportunity and necessity academic entrepreneurship [J]. European economic review, DOI: 10.1016/j.eurocorev.2020.103376.

[5] 王一鸣. 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

建新发展格局 [J]. 管理世界, 2020 (12): 1-13.

[6] 陈劲, 阳镇, 尹西明. 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科技创新战略 [J]. 当代经济科学, 2021 (1): 1-9.

[7] 于扬清. 科技成果产出难解投资之渴: 呼唤供给侧改革 [N]. 科技日报, 2018-01-19 (1).

[8] TAHVANAINEN A-J, HERMANS R. Making sense of the TTO production function: university technology transfer offices as process catalysts, knowledge converters and impact amplifiers [R/OL]. [2020-04-21]. <http://www.doc88.com/p-387305903898.html>.

[9] 孙玉涛, 刘小萌. 校企研发合作与技术转移关系——技术转移中心的调节作用 [J]. 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 2017 (9): 13-22.

[10] 胡锴, 朱雪忠. 身份与制度建构下的技术转移平台服务创新 [J]. 科学学研究, 2020 (9): 1686-1697.

[11] KIRCHBERGER M A, POHL L.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a literature review of success factors and antecedents across different contexts [J]. The journal of technology transfer, 2016 (5): 1077-1112.

[12] 连平, 周昆平. 科技金融: 驱动国家创新的力量 [M]. 1版. 北京: 中信出版社, 2017.

[13] [14] 陈劲, 尹西明, 阳镇. 新时代科技创新强国建设的战略思考 [J]. 科学与管理, 2020 (6): 1-5.

[15] 新华网. 《中国科技成果转化 2020 年度报告》出炉 [EB/OL]. (2021-04-15) [2021-04-21]. http://www.xinhuanet.com/science/2021-04/15/c_139881268.htm.

(责任编辑 刘红)

Study on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Li Xiukun Yin Ximing

Abstract: The essential feature of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is to achieve a higher level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self-reliance and self-improvement.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strategic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ce, universities play a critical role in promoting the deep integr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with economy through innovation and technology commercialization, which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to build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achiev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ince the 18th CPC National Congress, university technology in China has made a series of breakthroughs, meanwhile,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has put forward new requirements for university technology. This study critically compares the challenges faced by the university technology transfer, and proposes policy suggestions to improve the university technology transfer ecosystem in the new development stage, to help build the innovation powerhouse, and contribute to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s well as new development advantages.

Key words: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Technology transfer;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上接第 54 页)

Creative Wisdom Empowering Labor Education in the Intelligent Era: Connotation and Dimensions

Zhan Qinglong

Abstract: The rapidly changing intelligent technology provides new 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 for labor. In the future, more and more workers will engage in creative labor. Therefore, the in-depth development of labor education urgently needs innov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era of intelligence, creative wisdom is the most ideal cultural literacy for future workers. The labor education enabled by creative wisdom should cultivate talents with creative wisdom in order to promote people's all-round development and social progress. By defining the concept of creative wisdom, clarify the commanding height of China's labor education in each historical stage, analyze the core driving force of labor in the intelligent era, clarify the era choice and necessary reasons for creative wisdom to increase wisdom for labor and empower labor education, and then explain the connotation and dimensions of labor education in the intelligent era of creative wisdom from five aspects and four dimensions respectively, Provide theoretical reference and practical direction for the new development of labor education.

Key words: Intelligent era; Labor education; Creative wisdom; Smart labor

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产生的原因及其启示

李文平

(郑州大学,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 探寻教育信息化绩效产生的缘由, 对从源头总结教育信息化建设经验与理论、更好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带动作用具有积极意义。以入选“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典型案例”的83个区域为绩效优秀地区, 以83个未入选区域为绩效一般地区, 在赋予样本“主体化”视角并进行变量识别的基础上, 通过回归分析、夏普利值分解等方法研究了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产生的原因。结果发现: 地方政府诉求、教育信息化市场诉求、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履历丰富度等因素都在推动着教育信息化绩效的形成, 人民诉求未能显著影响教育信息化绩效。这提醒我们, 教育信息化绩效更多地受政府因素影响, 人民诉求的影响有限。为长远激发教育信息化建设活力, 未来地方政府应更加重视人民诉求, 同时做好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制度、经济和领导保障并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优势。

关键词: 地方政府; 教育信息化绩效; 影响因素; 主体性诉求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4038 (2021) 07-0084-12

教育信息化作为能够打破时空限制、快速复制传播、呈现手段多样的时代利器, 自诞生以来便与教育公平、教育质量、教育现代化等议题休戚相关, 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党的十八大以来, 信息化已成为国家战略,^[1]《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办法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的颁布, 为我国教育信息化事业发展作出了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 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亦成为地方政府评价的重要内容。^[2]

在此背景下, 地方政府积极推进本地教育

信息化事业发展, 教育信息化建设在祖国大地遍地开花, 但是, 各地的教育信息化建设结果却良莠不齐。2016—2019年,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分3批次遴选出83个区域入选“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典型案例”, 这些区域成为我国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标杆。值得注意的是, 在宏观制度环境上这些“典型区域”与未入选区域并无二致, 但为什么它们的教育信息化建设却成效显著? 其原因是什么? 合理解答此问题, 可为人们理解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建设动因, 发挥典型区域示范效应, 更快更好地推动我国教育信息化事业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收稿日期: 2021-06-09

基金项目: 河南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支持计划“高校内部治理现代化研究”(2021-CXTD-05)

作者简介: 李文平, 男, 讲师, 郑州大学教育学院, 主要从事教育政策监测与评价、学生学习与发展研究。

然而, 目前的教育信息化建设评价研究多从结果层面评价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效果、效率和效能, 关注教育信息化绩效评价的价值取向、评估原则、评估方法、指标体系、实践应用等方面, 针对教育信息化绩效生成原因、生成过程的研究相对较少。从结果出发的教育信息化绩效评价, 虽能使人们把握既有建设的成效与不足, 但却无法阐释教育信息化绩效为什么会产生, 无法从源头总结教育信息化建设的经验和理论。有鉴于此, 本研究以“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典型案例”中的区域案例为数据源, 在公开资料的基础上, 通过严谨的实证设计, 尝试解答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产生的原因。

一、解释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生成需要主体化视角

伴随新公共管理运动而兴的政府绩效研究对绩效成因的讨论可分为两种范式。一种是要素分析范式, 即从诸多可能影响政府绩效的因素入手, 描述、阐释政府绩效的成因。这种分析范式又分为两种视角: 一是探索性研究视角, 即从组织内外部环境出发, 演绎并实证政府绩效的成因, 认为政治体制、政府职能、政府战略与规划、政府管理规范化程度、政府行政能力、区域经济水平、社会秩序、公民参与、生态环境等是政府绩效生成的重要影响因素;^[6] 二是验证性研究视角, 即通过理论阐释、搭建分析框架, 归纳并实证框架设定要素对政府绩效的影响, 较为典型的如范柏乃等构建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文化)分析框架。^[7] 另一种是过程分析范式, 借鉴全过程质量管理理念, 从绩效生成的过程来阐释政府绩效的成因, 认为政府绩效是一个客观过程, 包括需求、投入、生产、结果、效果等环节, 其中需求、投入、生产对政府绩效的生成具有决定性作用。^[8]

虽然既有分析框架在形式上对政府绩效成因做了较好解释, 但深入地看, 两种范式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譬如, 第一种范式所讨论的要素(无论是具体要素还是抽象要素)均为投

入类、生产类要素, 缺乏对需求要素的讨论; 第二种范式虽然给出了一个更为全面的框架, 但它却难以区分现实世界中政府绩效的生成是源于内生需求还是源于外生环境改变。要解决这些问题, 挖掘政府绩效生成更为原生的动力, 就需要从主体化视角出发探究政府绩效利益相关者的需求对政府绩效生成的影响。我们知道, 需求是政府行动的诱发剂,^[9] 当公共产出能够满足个体与组织间关系的基本需求时, 政府绩效才能被创造,^[7] 这种创造无法单纯地依靠政府或市场来实现,^[8] 它需要政府、市场与社会的多元合作。所以, 从需求逻辑出发, 探讨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的成因可从三个方面考虑: 一是在对更好的教育、更美好的生活的期盼下, 人民希望政府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 二是为了实现“福祉”最大化, 政府积极主动地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 三是在经济机制的作用下, 市场期望政府开展教育信息化建设。实际上, 这三种内驱力可能是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生成的全视角利益主体。

首先, 人民诉求可能是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产生的重要原因。从江泽民同志提出党要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到胡锦涛同志提出必须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再到习近平同志提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9] 所秉持的一直是遵从人民诉求的制度安排。除此之外, 诸多研究显示, 公众诉求深刻影响和制约着政府绩效, 只有当公共产品为公众承认并接受时, 政府才是有绩效的;^[10] 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府绩效管理有助于法治政府、服务型政府、效能政府、责任政府的建立。^[11] 综合上述分析可认为, 人民诉求是政府绩效生成的“原生需求”, 满足人民群众对更优质教育的向往, 是地方政府推进教育信息化发展中必然考虑的。

其次, 政府自身诉求可能是其积极开展教育信息化建设并取得绩效的原因。作为一种主体身份, 政府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既有推进公共福祉最大化的“公心”, 也有满足自身福祉最大化的“私心”。就公共福祉而言, 亚里士多德

指出,最优良的政体是一个人人尽其能并得以幸福的政治机构,政治机构的一切活动,所追求的永远都是共同的幸福;^[12]在“善治”理论看来,政府的旨趣在于追求人类公共善的最大化,直至帕累托最优。^[13]这些理论鼓励政府为谋求公共福祉最大化而有所作为。在实践中,王学军等人通过对波特兰城市规划案例的研究发现,政府绩效实现的前提是公共政策、项目和行为受到公共价值的约束;^[14]尚虎平等人对172个政府独特绩效案例的研究显示,政府出于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诉求越强烈,其介入社会事务取得优质绩效的可能性越高。^[15]由此来看,作为“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组织,我国政府有极大的内驱力来建设教育信息化,因为它在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实现全民终身学习等公共福祉改善上具有重要的支撑作用。^[16]然而,这只是硬币的一面,政府行动还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另一面。依照新政治经济学的观点,政府是一个由许多理性人构成的组织,其本身会追求个人和组织利益最大化,当教育信息化成为政府评价指标时,政府及其官员为谋求绩效锦标赛的胜出,势必会积极地促进教育信息化绩效生成。

最后,市场诉求可能是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生成的原因。作为政府管理所取得的成效,教育信息化绩效可视为政府向社会提供了一种“准公共物品”,具有效用不可分割,使用上有限竞争、有限排他等特性。然而,生产这种“准公共物品”所需的软硬件设施、数字资源、网络空间等“原材料”却无法由政府提供,政府需通过直接购买(竞价性购买、协商式购买、指定性购买)或间接购买(补助、补贴)等形式,借助市场力量来实现。就市场来说,利润最大化是其最高原则,^[17]在逐利原则驱动下,寻求边际成本降低、市场规模扩大成为企业的自然选择,而且企业越多、规模越大,市场希冀政府大规模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的诉求就愈强烈。于政府而言,市场规模越大、竞争越充分,生产“准公共物品”时的外部环境就越好,也就越有利于优质绩效的生成。这种观点在完全竞争市场研究领域得到了支持,李

良智等人的研究发现,规模经济能够弥补社会福利损失;^[18]完全竞争市场条件下,厂商数目越多,市场竞争越激烈,从而价格越低产出越多,社会福利也将更高。^[19]所以,在市场经济互利逻辑驱动下,市场诉求能有效驱动教育信息化绩效生成也便容易理解。

二、从主体化视角审视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产生的原因

从1991年发布的《国家教委关于在全国建立电化教育综合实验县的通知》开始,到2019年教育部发布的《关于公布2018—2019年度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典型案例名单的通知》,在教育信息化建设近30年的“试点—推广”模式中,我国政府对“试点单位”“典型案例”的推介大多从其制度设计、具体措施、实施成效来描述建设经验,对它们成为典型的原因较少提及。相关文献对其成因的讨论也不充分。要廓清此问题,可从行为发生的先导性条件考虑,从主体需求视角审视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产生的内在需求诱因。

(一) 数据源选择

为探索在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生成中不同主体的需求因素,本研究以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典型案例示范网站公示的2016—2017、2017—2018、2018—2019三个年度83个“区域案例”为数据源,然后将这些典型案例所涉及的人民诉求、政府诉求、市场诉求从“主体人”视角赋予其行为主动性,将它们看作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的利益相关者。通过这种主体化处理,利用公开统计资料,就可判断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在多大程度上受主体性需求的影响。除83个人选案例之外,本研究还依据“极大相似”原则,筛选了83个与入选区域在入选当年人口规模相当、经济体量相称、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相近、基础教育在校生人数相似,并且同处于一个省市、在地域上相邻的未入选区域为对照组,以构建更为稳健的评估模型来评估主体性诉求的作用。在分析过程中,本研究将量化分析方法应用到案例研究中,

以解决个案研究难以克服的“结论适用性局限”等问题。

(二) 变量操作化

1. 自变量与因变量

本文的目标是廓清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的促动因素，故此，教育信息化绩效即为因变量。在操作上，我们将入选典型案例的83个区域视为绩效优秀地区，将筛选出的83个未入选区域视为绩效一般地区，据此区分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的高低。这样就如同借助“典型案例”的评审专家做了一次德尔菲法调查，从而将难以精确测量的教育信息化绩效问题，转化为专家评判的绩效好坏问题，保证了因变量的可信度。

本文的出发点是从主体需求视角审视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的生成是源于人民对优质教育的诉求，还是政府自身的诉求，或是企业扩大教育信息化市场的诉求。自然地，人民诉求、政府诉求、市场诉求便成为本研究的自变量。从人民诉求来看，在“服务型政府”“透明型政府”建设背景下，我国几乎每个地方政府网站都开辟了“政民互动”版块，处理网上留言、网上信箱、网上信访等群众意见，同时，回应群众意见已成为政府职责履行好坏的重要体现。^[20] 这些为群众通过网络表达诉求提供了保障，也为我们管窥人民对教育信息化的需求提供了可能。另外，人民诉求的表达还可通过政府牵头，通过自上而下的民意征集、调查征集等途径来实现。由此，本研究设计了主动留言、民意征集两个变量来衡量人民诉求。从政府诉求来看，其表达可分三种途径：一是颁布具有普遍约束力的政策性文件，如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等；二是发布能够表明官方态度的正式文本，如会议指示、官方媒体申明等；三是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人在公开场合的言论，这种言论虽无系统的文本形成，但在政府公信力较强的“领导责任制”环境中，它意含着政府的行为动向。本研究中，由于83个“典型案例”的建设重点有所不同，如2016—2017年入选的苏州市案例“未来教室推动苏式课堂教学改革与创新”的建设重点为教学改革，而

同年入选的泾源县案例“区域间信息化协作，促进教育均衡发展”的建设重点为教育均衡，所以，本文按照各案例的建设重点，分别搜集了当地政府相应的诉求意见并赋值。从市场诉求来讲，将“蛋糕”做大是其天然诉求，市场天然地希望政府大规模推进教育信息化建设，按照“市场体量越大对蛋糕需求越大”的经济逻辑，本研究使用“上规模”的教育信息化企业数量来衡量市场对政府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需求。

2. 控制变量

上文提及政府绩效除了受需求要素的影响外，还受政治、经济、社会等投入类、生产类要素的影响，这些变量的影响我们通过设置控制变量来控制。控制变量包括中央政策性意见、中央政策性意见的时新程度、地方政府诉求意见的时新程度、常住人口、GDP、主要领导人特征等因素。之所以这样设置，是考虑到在“四个服从”原则指导下，我国中央层面的政策意见往往决定着各级政府的努力方向和工作重点，而且中央政策的约束力不同（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会议指示的约束力依次递减），对地方政府工作的影响也不同。另外，中央政策的时新程度会对地方政府的行为产生影响，政策越时新，影响力越大。^[21] 同样的逻辑，地方政府诉求意见的时新程度也会影响其工作的开展，诉求意见越新，影响力越大。作为衡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重要指标，常住人口数量和GDP既是地方政府绩效生产的“终点线”，也是地方政府绩效再生产的“起跑线”。由于本研究涉及的166个观测样本，其常住人口与GDP相关系数过高（ $r=0.86$ ， $p=0.000$ ），存在较为严重的共线性问题，故使用与常住人口、GDP高度相关且变量之间相关性较低的“基础教育在校生人数”“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予以替换，替换后，两变量的相关性降至0.457（ $p=0.000$ ），能够满足进一步回归需求。^[22] 除上述要素外，一些研究显示地方政府分管领导、企业领导、高校领导的性别、年龄、学历、履历等个体特质会影响其所在部门绩效、下属绩效、个人学术绩效等。参照上述结论，本研究将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人的性别、年龄、学历、

履历等个体特征变量作为控制变量，以控制其对研究结果的扰动。借助公开统计资料，我们对所有变量进行了识别与操作化处理（见表1）。

（三）模型设置

鉴于本研究设定的因变量为二值变量，为使因变量的预测值总是介于 $[0, 1]$ 之间，在给

表1 变量识别与变量操作化

变量	指标 I	指标 II	测量
因变量	教育信息化绩效	是否入选典型案例	按照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典型案例示范网站公示的区域名单来赋值，是=1，否=0
自变量	主体性原因	人民诉求	①主动留言，按照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官网的政民互动等板块，如留言板、来信公示、社会关切问题公示等，公示的群众有关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意见条数赋予 $[0-+\infty]$ 的值 ②民意征集，按照地方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官网的民意征集、调查征集、网上征集等板块，是否进行过教育信息化建设相关民意调查来赋值，是=1，否=0
		地方政府诉求	按照地方政府以地方性法规规定、地方行政规章规定、规范性文件规定、会议指示、政府官方媒体申明、主要领导公开场合言论、无明确诉求，赋予 7-1 的值
		市场诉求	按照当地拥有营业收入 100 万元以上、缴纳社保员工数 10 人以上，以教育信息装备、软件、资源等为主营业务的企业数量来赋值，大于 20000=9，10001-20000=8，5001-10000=7，2001-5000=6，1001-2000=5，501-1000=4，101-500=3，1-100=2，无=1
控制变量	宏观政策环境	中央政策性意见	按照法律=6，行政法规=5，部门行政规章=4，规范性文件=3，会议指示=2，无=1 的方式赋值
	意见的时新程度	中央政策性意见的时新新度	按照距离入选当年的时间间隔赋予 $[1-+\infty]$ 的值
		地方政府诉求意见的时新新度	按照距离入选当年的时间间隔赋予 $[1-+\infty]$ 的值
	区域特征	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	按照入选当年当地的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额度来赋值
		基础教育阶段在校生成数	按照入选当年当地的普通小学、普通中学、普通高中在校生成数来赋值
	地方政府领导人特征	性别	女=0；男=1
		年龄	按照入选当年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人的年龄来赋值
		学历	按照完成相应阶段教育所需年限来赋值，高中=12，专科=15，本科=16，硕士=19，博士=22
履历丰富度		按照入选当年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人曾任职过的地区（部门）数量来赋值	

注：1. 人民诉求、政府诉求、市场诉求相关变量的检索时间范围均设定为入选典型案例当年及之前；2. “主动留言”中，群众关于教育信息化建设的留言大多是指出现有教育信息化建设的不足之处，这种负面的意见表达也包含了群众所期盼的教育信息化图景，能够督促政府改进教育信息化建设，推动教育信息化绩效生成；3. 界定企业数量所使用的 100 万元以上和 10 人以上标准，是国家统计局关于印发《统计上大中小微型企业划分办法（2017）》的通知中衡量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信息传输业小型企业的最低识别标准；4. 地区特征变量赋值的数据来源有 4 种，即地方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地方政府教育经费统计公告，地方教育部门决算说明，地方政府财政经费执行情况；5. 地方政府领导人特征变量是通过搜索引擎检索入选典型案例当年在任的市委（县委书记、区委书记）和市长（县长、区长）姓名，并检索相应人员的官方简介、个人履历来获得信息

定自变量、协变量的情况下，本文使用二项 logistic 模型估计各解释变量的影响。

$$\text{logit}P = \beta_0 + \beta_1 X_i + \beta_2 X_j + \varepsilon_i \quad (1)$$

式 (1) 中 $\text{logit}P$ 与解释变量之间是线性关系。由于本文所评估的 P 与解释变量之间并非线性关系，所以这里使用变形后的回归模式：

$$p = \frac{\exp(\beta_0 + \beta_1 X_i + \beta_2 X_j + \varepsilon_i)}{1 + \exp(\beta_0 + \beta_1 X_i + \beta_2 X_j + \varepsilon_i)} \quad (2)$$

式 (2) 为增长函数模型，其中 p 表示因变量的预测值落在 $[0, 1]$ 的概率， x_i ($i=1-4$) 为自变量， X_j ($j=1-9$) 为控制变量， ε_i 为随机扰动项。

考虑到自变量之间的异质性较大，在检验过程中，本文采用区组回归的方式呈现它们对因变量的影响，具体分为 5 步。第一步，将研究预设的 9 个控制变量作为自变量，将是否入选典型案例作为因变量构建模型 1。因为控制变量属于外生环境性质的影响因素，我们在不考虑内生需求的条件下，首先验证外生环境对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的影响，这是区组回归模型设置的一个逻辑起点。实际上，这是一种理想状态，毕竟不涉及任何主体性诉求的政府活动在真实世界中是不存在的。第二步，将实证研究逐渐引入真实世界中的主体诉求，在控制外生环境因素的前提下，引入主动留言为自变量，并将是否入选典型案例作为因变量构建模型 2。第三步、第四步、第五步与第二步类似，均在前一步的基础上，每次引入一个新的变量作为自变量，同时，将是否入选典型案例作为因变量构建回归模型（模型 3、模型 4、模型 5）。经过这 5 个步骤的检验，就可以寻找到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的促成因素，具体检验使用 stata13.0 完成。

三、影响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的原因

为避免因多重共线性而产生“伪回归”问题，区组回归之前，需要对各解释变量之间的相关性进行检验。从检验结果来看，由 13 个变量构成的 78 对相关关系中，只有基础教育在校生人数与主要领导履历丰富度两个变量的相关

性大于 0.5，其他变量之间的相关性均小于 0.5，整体来说，本研究设定的解释变量能够满足进一步回归要求。^[23]

区组回归结果显示，当只有控制变量作为解释变量时，模型 1 的准 R^2 值为 0.1052，即对数似然函数的实际增加值占最大可能增加值的比重为 10.52%，但 Wald chi2 统计量的概率显著性为 0.3289，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说明模型 1 所有回归系数的联合显著性较低，需对模型做进一步修正。在不断引入自变量主动留言、民意征集、市场诉求、地方政府诉求之后，模型的解释力得到了明显提升，模型 5 的准 R^2 值高达 0.4924，能够解释因变量 49.24% 的方差变异，Wald chi2 统计量在 0.01 的水平上显著，表明所有回归系数的联合显著性较高，模型拟合良好。模型 5 显示，在自变量中，地方政府诉求、市场诉求分别在 0.01 和 0.05 显著性水平上与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呈正相关，主动留言、民意征集与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不具有统计相关性。在控制变量中，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履历丰富度在 0.05 显著性水平上与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呈正相关，中央政策性意见、中央政策性意见的时新程度、地方政府诉求意见的时新程度、基础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人的性别、年龄和学历与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不具有统计相关性（见表 2）。

为更直观地反映不同解释变量对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的影响，研究使用夏普利值分解技术对各个解释变量的贡献率进行测算，测算结果见表 3。根据夏普利值分解结果看，在未引入自变量的控制变量模型中，对因变量贡献率较大的因素为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77.08%）和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履历丰富度（7.13%）。在引入了自变量的全变量模型中，对因变量贡献率较大的前四个因素依次为地方政府诉求（73.61%）、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9.47%）、市场诉求（4.47%）和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履历丰富度（4.06%）。结合夏普利值分解结果和回归结果，便可对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生成原因做合理阐释。

表 2 区组回归结果

	变量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自变量	人民诉求 (主动留言)	-	-0.0964*	-0.0947*	-0.1251**	-0.1129
	人民诉求 (民意征集)	-		-0.3758	-0.2834	0.6623
	市场诉求	-	-	-	0.3543*	0.4340**
	地方政府诉求	-	-	-	-	1.8894***
控制变量	中央政策性意见	0.1606	0.1053	0.1140	0.2438	0.4035
	中央政策性意见的时新程度	-0.0041	-0.0075	-0.0071	-0.0044	-0.0047
	地方政府诉求意见的时新程度	0.1128	0.1391	0.1281	0.1147	-0.1301
	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	0.0363***	0.0376***	0.0381***	0.0339**	0.0176**
	基础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	-0.0099	-0.0076	-0.0078	-0.0106	-0.2725
	政府主要领导性别	-0.1069	-0.2191	-0.2489	-0.2728	0.3409
	政府主要领导年龄	-0.0288	-0.1159	-0.0178	-0.0241	-0.0964
	政府主要领导学历	0.2075*	0.1763	0.1874	0.2488*	0.2172
政府主要领导履历丰富度	0.0247	0.0291	0.0271	0.0462	0.2037**	
	N	166	166	166	166	166
	Wald chi ²	10.27	14.73	14.51	18.13	67.65
	P>chi ²	0.3289	0.1422	0.2059	0.1119	0.000
	Pseudo R ²	0.1052	0.1188	0.1204	0.1385	0.4924

注: *** p<0.01, ** p<0.05, * p<0.1

表 3 夏普利值分解结果

变量	控制变量模型		全变量模型	
	夏普利值	百分比	夏普利值	百分比
人民诉求 (主动留言)	-	-	0.01212	2.46%
人民诉求 (民意征集)	-	-	0.00202	0.41%
市场诉求	-	-	0.02200	4.47%
地方政府诉求	-	-	0.36245	73.61%
中央政策性意见	0.00086	0.82%	0.00176	0.36%
中央政策性意见的时新程度	0.00005	0.05%	0.00007	0.02%
地方政府诉求意见的时新程度	0.00444	4.23%	0.00426	0.87%
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	0.08108	77.08%	0.04662	9.47%
基础教育阶段在校生人数	0.00597	5.68%	0.00871	1.77%
政府主要领导性别	0.00018	0.18%	0.00283	0.57%
政府主要领导年龄	0.00317	3.01%	0.00278	0.56%
政府主要领导学历	0.00193	1.83%	0.00676	1.37%
政府主要领导履历丰富度	0.00750	7.13%	0.01999	4.06%
总计	0.10519	100%	0.49239	100%

（一）地方政府诉求在最大程度上决定着教育信息化绩效

从区组回归结果来看，在引入地方政府诉求变量之前，回归模型所能解释因变量的方差变异最高为 13.85%，在引入地方政府诉求变量之后，回归模型所解释的因变量方差变异达到了 49.24%，可以说地方政府诉求变量贡献了 35.39% 的因变量方差解释。在引入所有变量的第 5 步回归中，地方政府诉求的回归系数为 1.8894，在 0.01 水平上显著，在所有变量中系数值最大，这表示地方政府建设教育信息化的诉求每提升 1 个单位，政府取得优质绩效的几率就增加了 6.616 倍^①。从夏普利值分解结果看，在所有变量组成的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解释模型中，地方政府诉求变量的相对贡献值高达 73.61%，约为其他 12 个变量的相对贡献值之和的 3 倍。这些都表明，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生成背后的决定性原因实际上是政府自身的诉求。这与教育研究领域常提及的“教育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一个堡垒”的判断不谋而合。在基础教育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下，我国各地的基础教育信息化建与不建、建什么、怎么建等问题均由地方政府统筹决策，地方政府在教育信息化事业发展中有着较大的话语权。由此来讲，无论是地方政府因教育信息化在推进教育发展中具有支撑作用而主动发展教育信息化事业，还是地方政府为谋求“私利”而被动推进教育信息化，地方政府在教育信息化事业上积极主动的诉求和作为，才最终形成了一批优质的绩效管理案例。

（二）市场诉求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

从回归结果看，自第 4 步引入市场诉求变量之后，它对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的影响就显著为正，在最终的第 5 步回归中，市场诉求的回归系数为 0.434，在所有通过显著性检验变量中位居第二，且通过了 0.05 显著性水平检验，其含义为地区所拥有的教育信息技术企业数量每提升 1 个等级，地方政府取得优质绩效的几率就增加 1.543 倍。从夏普利值分解结果看，市场诉求对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形成的相对贡

献值为 4.47%，在所有解释变量的相对贡献值中位列第三。这说明，市场诉求是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生成的重要影响因素。这种正向影响关系可从两个方面解释：一是从供需关系的满足来考虑，一般来说，教育信息化市场规模越大，它所能提供的教育信息设备、资源等产品就越丰富，也就能更有针对性地满足各地教育信息化建设的多元需求；二是从竞价市场的优越性来考虑，一个地区的教育信息技术企业越多，市场竞争就越充分，在这种更具竞争性的市场环境中教育信息化产品的价格愈趋于“生产价格”，同时，竞价性更强的市场会在生产、装备、调试、使用、维修等环节提供更为优质的服务。概括地讲，规模愈大、诉求更强的市场会通过种类更多、价格更优、服务更好的教育信息化产品与服务来帮助地方政府产出优质的教育信息化绩效。

（三）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支撑着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的形成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在单一制国家，国家财政用于教育的经费是驱动教育发展的重要支撑力量，本研究的实证结果支持了这种观点。自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变量引入回归模型，它对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的影响就显著为正，在现实情境中（模型 5），其回归系数为 0.0176，且在 0.05 水平上显著。夏普利值分解结果显示，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对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的相对贡献值为 9.47%，为解释变量相对贡献值的第二大变量。这说明，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正向影响、支撑着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的形成。在“预算制”国家治理中，一个项目预算经费的多寡，不仅意味着该项目的相对重要性，也决定着该项目占有资源的绝对数量，较之重要性低、分配资源少的“瘦狗”型项目而言，那些重要性高、资源分配多的“明星”型项目，建成精品项目、产生优质绩效的概率更高。所以，作为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主渠道，^[24] 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的多寡直接影响着地方政府用于教育信息化建设的资源数量，支撑着教育信息化绩效的形成。

（四）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丰富的履职经历促成了教育信息化绩效的产生

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领导干部的交流与培养，认为领导干部跨地区、跨部门、跨团体交流，可提高个人素质和能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25] 实证结果证明了这种事实的存在。从回归模型 1 引入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履历丰富度变量以来，它的回归系数就为正值，在代表真实情境的回归模型 5 中，它的回归系数为 0.2037，在 0.05 水平上显著，这说明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人履职经历越丰富，该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建设成就越好。履职经历是领导干部交流经历的直观体现，诸多研究显示，领导干部交流有利于拓宽视野、丰富经验，担任市委书记市长之前的调动经历可以提高官员能力^[26]，市级主官任现职之前任职过的城市数量与其主政期间的绩效正相关^[27]。就此而言，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任职前的交流越多、履历越丰富，个体的眼界、能力等综合素养就越好，也就更可能整体布局、统筹协调、有序推进教育信息化事业，产生优质绩效。

（五）人民诉求未能显著影响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

从回归结果看，自主动留言变量进入模型，它的回归系数就为负值，在模型 5 中，主动留言的回归系数为 -0.1129，未通过 90% 置信度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主动留言与教育信息化绩效负相关。在夏普利值分解结果中，主动留言对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的相对贡献值为 2.46%，仅为地方政府诉求变量相对贡献值的三十分之一。这些数据反映出地方政府在教育信息化建设中较少考虑自下而上的人民诉求，教育信息化建设多由政府自身诉求决定，当政府自身诉求较低时，即便民众诉求较高，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成效也不甚理想。然而，当政府自身诉求较高时，它又会通过自上而下的民意征集来赋予建设行为合理性，从而推动优质绩效的形成。这个推断从民意征集变量的回归结果中得到了验证。模型 5 中民意征集变量的回归系数为 0.6623，表明有民意征集地区（政府自身诉求也较高， $r=0.17$ ， $\text{sig}=0.03$ ）比无民意征集地区的

教育信息化绩效更高，该结果也从另一方面验证了地方政府诉求对教育信息化绩效的决定性作用。

四、科学理解教育信息化绩效产生的原因并总结其经验

本研究的初衷是从“基础教育信息化应用典型案例”入手，借助实证研究设计来挖掘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的成因，在此基础上为总结教育信息化建设经验、改进政府行为提供资料积累。实证分析结果显示，影响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的原因有四：第一，地方政府诉求是教育信息化绩效产生的首要主体性原因；第二，市场诉求在较大程度上影响了教育信息化绩效产生；第三，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为教育信息化绩效产生提供了重要支撑；第四，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任职前丰富的履历促成了教育信息化绩效产生。四种因素可归为两类：一类为政府自身因素，包括地方政府诉求、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地方政府主要领导丰富的履历；另一类为市场环境因素，主要为教育信息化市场诉求。

实证结论所蕴含的政府行为改进方向是明显的：一方面，可从政府自身入手，提升地方政府的建设诉求，同时增加教育信息化建设经费并提升主要领导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意识和能力；另一方面，可从外在环境入手，充分利用市场力量，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效率优势。概言之，改进策略设计遵循的是一种“供需逻辑”，即先由地方政府形成较强的教育信息化建设需求，再借助市场经济的力量来满足这种需求，在此过程中予以经费支持和领导保障。然而，“人心是最大的政治”^[28]，“以民之所望为施政所向”“努力实现人民对未来生活的期盼”是中国政府的神圣使命^[29]。所以，从“供需逻辑”的源头讲，人民的需求才是驱动教育信息化发展的根本需求，未来教育信息化建设中地方政府应更加重视人民诉求。在上述分析基础上，本研究设计了三条政府行为改进建议，以为他鉴。

（一）增强教育信息化建设意识，做好制度、经济和领导保障

从实证结果看，地方政府之所以能产生优质的教育信息化绩效，最大、最显著的动力来源于政府自身诉求。实证结果还显示，一般公共预算教育经费、地方政府主要领导履历丰富度等由政府自身所决定的因素亦是教育信息化绩效的显著动力因素。这即是说，地方政府自身因素（建设诉求、资金投入、领导能力）在最大程度上影响着教育信息化绩效的好坏。据此来讲，为优化教育信息化建设成效，地方政府在未来教育信息化建设中应增强建设意识，努力做好三个方面的保障：一是提升自身的教育信息化建设诉求，并以约束力更强、法律效力位阶更高的规范性文件来明确政府的建设诉求，形成制度保障；二是增加教育信息化建设经费投入，给优质绩效的产生予以经济保障；三是地区主要领导人应拓宽视野，加强交流与学习，综合协调本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建设，给教育信息化事业发展以领导保障。

（二）充分利用市场，发挥市场在教育信息化资源配置中的优势

本文统计结果表明，由规模型企业数量所表征的市场诉求是影响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产生的重要影响因素。虽然政府自身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育信息化绩效，但市场作为教育信息化产品、服务的生产者与供应者，是教育信息化建设不可或缺的另一面。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指出，“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30]，“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同时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31]。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教育信息化产品与供给市场化的前提下，地方政府应以优质绩效产生的原因为切入点，充分利用市场，发挥市场在教育信息化资源配置中的创造性、竞价性、激励性等优势，从而使市场涌现出种类更多、价格更优、服务更好的教育信息化产品与服务，来支持地方的教育信息化事业发展。同时，地方政府也应面向更广阔的教育信息化市场，避免地方（部门）保护主义；公开采买流程，避

免“寻租”行为发生；加强市场监管，避免价格战、垄断等扰乱市场秩序行为的出现。

（三）尊重人民诉求，将人民诉求作为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要动力

党和政府注重“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落实，指出“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不是一个抽象的、玄奥的概念，不能只停留在口头上、止步于思想环节，而要体现在经济社会发展各个环节”^[32]。我们也相信，地方政府推进教育信息化事业的初衷是为了满足人民对更好的教育、更美好生活的期盼。然而，实证结果却反映出人民诉求对地方政府教育信息化绩效的形成影响微弱。这警示我们，即使出于服务人民、一切为了人民的目的，地方政府在推进教育信息化事业时也不能是“家长式包办”，而应尊重人民诉求，将人民诉求作为教育信息化建设的重要驱动力。具体来说，首先，这要求地方政府厚植“以人民为中心”意识，紧紧依靠人民办教育，^[33]自觉地把人民诉求作为教育信息化建设活动的本源。其次，地方政府应开展广泛的民意调查与征集。研究过程中发现，166个观测样本中，89.8%的政府没有关于教育信息化建设的民意征集，这显然与“以人民为中心”思想的要求相左。要改变这种情况，地方政府在今后教育信息化建设中，应广开言路，充分听取、收集民众诉求，真正做到想民之所想、急民之所急、办民之所需。再次，地方政府可利用数据挖掘与技术分析，获得真正的民意。目前，民众有关教育信息化发展问题的网络留言数量繁多、质量参差不齐，给政府识别与落实真正的民意带来了困难。未来，地方政府需要充分利用统计抽样、网络爬虫、大数据分析、用户画像等技术来提取真实的民意，为推进以人民为导向的教育信息化实践提供人民需求基础。最后，适当调整“地方政府履行教育职责评价办法”。由于目前的“评价办法”侧重于对建设结果的考察，使得地方政府更重视教育信息化基础设施、课程与教学、人才队伍等外显事业的发展，这也是其忽视人民诉求的一个重要原因。为改善地方政府行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国家可考虑将“民意落实度”“人民满意度”等

指标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评体系, 这样便在制度上保障了教育信息化建设中人民诉求的落实。

注释:

①增长函数中回归系数的含义为, 解释变量每增加一个单位, 因变量发生的几率 (odds) 就增加 $\exp(\beta)$ 。以此处回归系数 1.8894 为例, $e^{1.8894}=6.616$, 即为 6.616 倍。全文解释与此处一致。

参考文献:

[1] 教育部网站. 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规划》的通知 [EB/OL]. (2016-06-07) [2020-12-11].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606/t20160622_269367.html.

[2] 中国政府网.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对省级人民政府履行教育职责的评价办法的通知 [EB/OL]. (2017-05-31) [2020-12-11]. 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6/08/content_5200756.htm.

[3] 陈天祥. 新公共管理: 政府再造的理论与实践 [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7: 170.

[4] 范柏乃. 政府绩效评估与管理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107.

[5] BEHN R D. Why measure performance? different purposes require different measures [J].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003 (5): 586-606.

[6] 何文盛, 姜雅婷, 蔡明君. 我国地方政府绩效评估结果偏差探析: 基于 PV-GPG 模型的分析 [J]. 中国行政管理, 2014 (10): 80-83.

[7] 孙斐. 地方政府绩效评价的价值冲突管理 [D]. 兰州: 兰州大学, 2014.

[8] KELLY G, MULGAN G, MUERS S. Creating public value: an analytical framework for public service reform [M]. London: Cabinet Office Strategy Unit, 2002: 1-35.

[9] 人民网.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EB/OL]. (2018-01-22) [2020-12-11].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8/0122/>

c40531-29779412.html.

[10] 胡税根, 王汇宇. 以人民为中心的政府绩效管理研究 [J]. 兰州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8 (4): 121-127.

[11] 芦刚, 李沫. 论地方政府绩效评估与公民参与的内在契合 [J]. 辽宁行政学院学报, 2013 (5): 5-7.

[12]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 [M]. 吴寿彭,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5: 343.

[13] STOKER G. Governance as theory: five propositions [J]. International social science journal, 1998 (155): 17-28.

[14] 王学军, 马翔. 政府绩效生成路径: 新范式下的理论及其解释 [J]. 上海行政学院学报, 2015 (4): 24-32.

[15] 尚虎平, 韩清颖. 我国政府独特绩效产生的原因及其价值 [J]. 政治学研究, 2019 (3): 81-93.

[16] 教育部网站. 教育部关于印发《教育信息化 2.0 行动计划》的通知 [EB/OL]. (2018-04-13) [2020-12-08].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6/s3342/201804/t20180425_334188.html.

[17] 丁荣先. 市场经济与法制建设 [J]. 社会主义研究, 1993 (4): 61-61.

[18] 李良智. 竞争市场与垄断市场: 一个基于福利的分析 [J]. 当代财经, 2003 (8): 5-8.

[19] FRANK C R. Entry in a cournot market [J].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1965 (3): 245-250.

[20] 卢海燕. 我国服务型政府绩效评估的探索 [J]. 行政论坛, 2013 (5): 34-37.

[21] 尚虎平, 黄六招. 新中国农村合作医疗参合率变迁研究 [J]. 中国农村经济, 2020 (7): 99-121.

[22] 刘国旗. 多重共线性的产生原因及其诊断处理 [J]. 合肥工业大学学报 (自然科学版), 2001 (4): 607-610.

[23] 鲁茂. 基于 GMDH 的多重共线性研究 [M]. 天津: 天津大学出版社, 2014: 18.

[24] 肖捷. 国务院关于国家财政教育资金分配和使用情况的报告 [EB/OL]. (2017-12-23) [2020-12-11]. <http://www.npc.gov.cn/npc/>

c30834/201712/8bf37c0e48bb455fb48eaf8c5c0a4a1f.shtml.

[25] 中国政府网. 党政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 [EB/OL]. (2006-08-06) [2020-12-13]. http://www.gov.cn/jrzg/2006-08/06/content_355833.htm.

[26] LI H, ZHOU L A. Political turnover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the incentive role of personnel control in China [J]. *Journal of public economics*, 2003 (9): 1743-1762.

[27] 姚洋, 席天扬, 李力行, 等. 选拔、培养和激励 [J]. *经济学 (季刊)*, 2020 (3): 1017-1040.

[28] 习近平. 在全国政协新年茶话会上的讲话[N]. *新华每日电讯*, 2018-12-30 (2).

[29] 人民网. 李克强: 政府工作新理念 [EB/OL]. (2013-04-10) [2020-12-11]. <http://>

theory.people.com.cn/n/2013/0410/c49150-21079926.html.

[30] 习近平. 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的说明 [J]. *前线*, 2013 (12): 22-30.

[31] 中国政府网. 习近平: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不能回到计划经济的老路上去 [EB/OL]. (2020-05-20) [2020-12-11]. http://www.gov.cn/xinwen/2020-05/23/content_5514220.htm.

[32] 习近平.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6: 24-25.

[33] 钟贞山. 以人民为中心的教育现代化: 理论、实践与内涵实现 [J].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 2018 (1): 56-61.

(责任编辑 刘红)

The Causes of Local Government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ir Inspiration

Li Wenping

Abstract: Exploring the causes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performance has positive significance to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construction from the source and play the exemplary role of advanced models. This paper treats 83 regions selected from “Typical Cases of Basic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Application” as excellent performance regions and 83 unselected regions as general performance regions. On the basis of giving the sample a “subjective” perspective and identifying variable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Sharply value decomposition results show that local government demands, market demands, general public budget education funds, and the rich experience of leaders are all driving the formation of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performance, and people’s demands have no significant impact. It reminds us that the performance of educational informatization is more affected by the government. In the future, the government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people’s demands, do a good job in institutional security, economic security and leadership security, and give full play to the advantages of the market in allocating resources.

Key words: Local government;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performance; Influencing factors; Subjective demand

Journal of National Academy of Education Administration

Vol. 283 No. 7 2021

Monthl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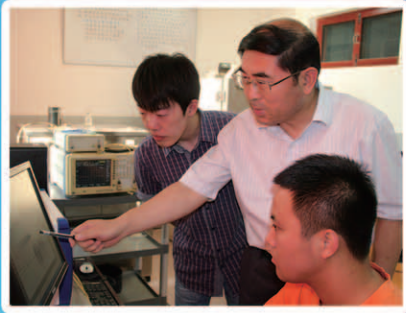
CONTENTS

- On the Historic Roles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Sciences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Ren Shaobo** (3)
-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and Reform of Education
Evaluation Based on Systematic Thinking
--On the Systematic Thinking of Cultivating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Lu Xiaozhong** (9)
- The System Concept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 Probe into System Establishment **Yu Guoliang** (17)
- Exploration of Labor Education in the 100 Year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iu Xiangbing & Zhang Qingyu** (28)
- How to Integrate Labor Education into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hi Yongchuan** (38)
- Creative Wisdom Empowering Labor Education in the Intellegent Era:
Connotation and Dimensions **Zhan Qinglong** (46)
- Analysis of Policy Target Audience and the Improvement of the Accuracy
of Educational Policy **Qu Zhengwei** (55)
- How Does Organizational Justice Affect the 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 of University Teachers?
--Mediating Role of Organizational Trust **Chi Jingming et al.** (64)
- Study on Transformation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Achievements in Chinese
Universities under the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Li Xiukun & Yin Ximing** (76)
- The Causes of Local Government Education Informatization
Performance and Their Inspiration **Li Wenping** (84)



石家莊鐵道大學

Shijiazhuang Tiedao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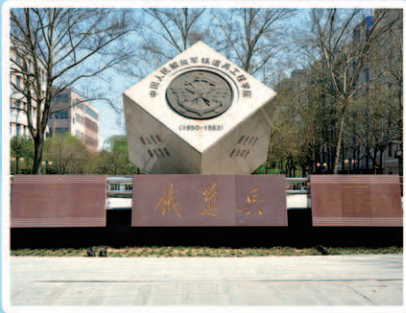
中國工程院院士杜彥良指導研究生



學校參研的“彩雲號”盾構機



學校具有獨立知識產權的SLJ900架橋機正在作業



學校八零廣場



省部共建國家重點實驗室



“慎思明辨、知行合一”校訓石



龍山校區體育場

慎思明辨 知行合一

石家庄铁道大学前身为创建于1950年的铁道兵工程学院，1984年转属铁道部，2000年划转河北省，2015年被河北省、国家铁路局、教育部批准为共建高校，现为河北省重点骨干大学和重点支持的“双一流”建设高校。

经过70多年的风雨兼程和历史积淀，学校形成了“慎思明辨、知行合一”的校训、“严谨治学、勇于创新、精心育人、志在四方”的优良校风和“军魂永驻、校企结合、育艰苦创业人”的鲜明办学特色。学校建有2个国家级教学团队，1个教育部创新团队，3个河北省“巨人计划”创新创业团队，10个国家级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有中国工程院院士2人，“973”首席科学家、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国家级教学名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等省部级以上专家称号194人。本科毕业生就业率连续保持省属骨重点干大学前列。

学校长期坚持服务国家及地方重大工程需要，建有“省部共建交通工程结构力学行为与系统安全国家重点实验室”“大型基础设施性能与安全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2个国家级科研平台。工程学学科进入ESI排名全球前1%。近年来，主持承担国家“973”计划、“863”计划、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及重点项目、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等900余项。获国家、军队和省部级科技成果奖276项。其中，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2项、一等奖2项、二等奖9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二等奖2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中国卓越研究奖1项。



统一刊号：ISSN1672-4038
CN11-5047/D

国内邮发代号：82-484 国内定价：15.00元
国外发行代号：M2076 国外定价：\$11.00元

广告发布登记编号：京大工商广登字20170005号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

